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孙中山谋略大全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前 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卓越领袖，是与形形色色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不怕挫折和失败的无畏战士，是中国 20 世纪初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人物。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2 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早年即有志反清。1894 年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 10 月在香港设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1900 年派人至惠州（今广东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1905 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当时中国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 年（宣统三年）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2 月 29 日，被 17 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就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2 月 13 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大总统职。3 月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 年 3 月因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讨袁，但党内意见分歧，在袁出兵进攻时仓促应战，旋即失败。1914 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6 年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 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他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 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至上海，次年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 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 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屡经失败，陷入绝望境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他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 年他在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年 11 月，他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哲学上，提出“知难行易”说，批判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保守思想。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1956 年为纪念其 90 诞辰，出版了《孙中山选集》。

孙中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的光辉业绩已为举世公认，他的画像永远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他的灵柩永远置放在建筑宏大庄严的南京中山陵，供世代的人们去瞻仰，缅怀。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已不是孙中山曾经取得了多少成功，而是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孙中山一生都把自己交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一句名言，

叫“天下为公”。这就使他的政治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正如他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开创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但却感召了整整一代人，亿万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甚至按他喜欢的着装去着装（中山装），在 20 世纪初，他是中国第一个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领袖人物。

在孙中山的故乡，常常见到不少相信风水舆论的人们，对产生孙中山的原因作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如什么“二龙戏珠”，什么“皇帝田”等等。但是，孙中山绝对不是什么“神”，他从翠亨村童趋于时代巨人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文环境，是他所身处的一个急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孙中山的政治天赋和非凡活动能力，造就了他的博大和高远。随着革命的逐步兴起，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传播的革命真理；孙中山的智慧不仅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比如，孙中山晚年，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又重新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从长期革命的挫折中吸取沉痛的教训，而重新作出的正确选择。

孙中山是位天才的外交家。他与外国建立的众多关系，大多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是所谓的民间外交，有的甚至是纯粹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这就使我们研究孙中山外交谋略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与美、英等国首脑的交往，使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他与外国记者交往，使他的国际形象迅速通过英文报刊反映出来；他与外国商人、金融家交往，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中国革命巨大帮助，而且也在政治上给予声援和支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学习孙中山外交谋略，对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国内外市场，引进更多外资，都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孙中山被中国人尊为“国父”，除了他的伟大功绩，还在于他的崇高的品格，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孙中山的“人生谋略”，“教育谋略”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代伟人的孙中山对自我要求是严格的。他一生检朴，无私无畏，道德高尚，在个人生活方面与中国 20 世纪中后期伟人周恩来有相似之处。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对守护身边的同志说：“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甚瞑目。”最后，孙中山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遂不能复言。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5 年孙中山逝世，曾经使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伤之中，国民党通电全体党员左臂缠黑纱 7 日，停止宴会 7 日，以示哀悼。北京几十万民众含泪自发走上街头，为他灵柩送行。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尊敬和爱戴！

今天，一部《孙中山谋略大全》，将引导你向这位中国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巨人靠近，再靠近……

“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耳边永远响彻他的声音！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孙中山谋略大全

孙中山政治谋略（上篇）

必须唤起民众

孙中山是从革命目的那儿寻找革命力量和革命途径的。孙中山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打倒皇帝，永远不再需要什么皇帝，革命胜利后，建立合众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

这一革命目的意味着对满洲贵族所享受的各种特权的伤害，必将遭到贵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反对，所以革命必须流血。孙中山认为别的国家要获得真立宪，都要以流血为代价；在封建专制极为严重的中国，要实行革命就更无法避免要流血了。所以革命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这是孙中山就采取何种革命途径的认识和确定。

孙中山对以流血夺得革命的真胜利充满了信心，早在 1904 年，他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说：“中国现今正处于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1900 年义和团起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用两倍或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毫无疑问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就认识到了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有了认识，从革命目的上寻找到了革命力量的所在。

特别是他在领导的早期起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搞“精英革命”，不能专靠少数“英雄豪杰”包打天下，不能仅靠几个“勇敢分子”、恐怖分子暗杀几个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就够了。这种小打小闹小震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无法根本改变时事局势的。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平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也应该是平民的观点。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而要达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而不是唤起少数英雄好汉。

孙中山力主国民党党员努力去做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说：“诸君把这个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到了全国人民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还强调对“民众”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民众”即“国民”、“大民”，指的是“全国人民”、整个中国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就要唤起这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

他认为只要能唤起民众，革命不怕不成功。他说：“本党党员有 30 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 10 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 300 万人的同志，在 3 年之后便可以得 1500 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再用 1500 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

孙中山把这种发动广大国民参加、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他甚至还把国民革命的执行机关——军政府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与广大国民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说明军政府根基在国民，国民集中意志的体现在军政府，使得国民更好地认识国民革命的目的，以便更自觉更积极地参加革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国民革命在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这一策略指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他“扶助农工”旗帜举起之后，革命之势日趋旺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部分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排满”为跳板

清朝末期，当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开始探求和制订变革现实的政治方案时，他发现民族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之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欲使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残酷严峻的现实，使得资产阶级初期革命活动必须从“民族革命”着手。

基于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提出了“排满”的政治谋略。他认为只有以“排满”为旗号，组织一支革命大军，用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认为以“排满”为旗号，可以团结很大一批力量，共同完成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又必须注意到“排满”的旗号之下，并非尽为革命志士，而革命志士并不能把“排满”当成最终的政治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所以，打起“排满”的旗号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对于革命党而言，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目标。

1905年之后，“排满”的主张开始大得人心，成为当时之人心所向，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刊载“排满”的文章，国外留学生中关于“排满”的舆论一时鼎沸，“排满”这一话题一时之间被认为是历史潮流。

但必须认识到，各种运动之中难免有趟浑水之人，由于舆论和潮流，各种人都被卷了进来，如果盲目乐观，难免最终不功亏一篑。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赞同革命的人，都主张“排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主张“排满”的人却不一定全都赞同革命，不清楚地认识到“排满”阵营中的力量成份，是无法把握把“排满”当成革命的过渡性目标来完成的。

孙中山分析认为主张“排满”的人不外乎三类：其一，因官吏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这一类人数最多；其二，因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其三，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类人在“排满”的旗号下汇集起来，一旦这一目标实现，难免要分化。这三类人中，只有第三类和第一类的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的那部分人，才会把“排满”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中间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筹建同盟会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团体的名称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就坚决指出，“排满”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并非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过渡性目标，“创建共和”才是更为远大的目标。

他还说“排满”也必须弄清对策，不能乱排一气，满人中有害人的统治者，是“排满”安排的对象；也有不害人的满洲人，却要团结、保护和帮助。说到底，“排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在执行“排满”这一策略时，必须有节有制。必须反对和制止革命队伍中那些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的过火行为。对于满族人生活困难的，政府要帮助解决，使他们成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国民。新政府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应当再搞什么汉族特权，而是对国内各民族都一视同仁的公正政府。

孙中山主张的以排满为过渡性目标的谋略，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团结了很大一批革命力量，从这一谋略的提出开始，只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

同时又为革命指出远大目标，为后来“共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他 40 年的革命活动中，不管社会如何急剧动荡，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总坚定地憧憬着建立“民主共和”这美丽的未来前景，并且从未停止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艰苦奋斗。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中，单单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只能使理想成为虚幻飘渺的空想，孙中山在对自己政治信仰有几分宗教式的虔诚和狂热的同时，在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采用了一种灵活务实的策略。甚至是为某种目的，他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清朝专

制皇权，辛亥革命后，主要对象是军阀，概括而言是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比如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争取民主共和，到辛亥后的反对军伐专制，维护共和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等，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轨迹。但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采取灵活的策略，欲借敌方势力为己所用。例如，尽管惠州起义前后他多次声明他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但 1900 年，为了使刘学询的经济为革命所用，他在致刘学询函中表示了对帝制的容忍，函中就有一句“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话，这曾使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变成了医世救国的革命志士。另一事，孙中山为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曾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了早点使中国建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把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后来，尽管他认识到了反对军阀是他的首要任务，认识到了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但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他不仅多次与南方军阀一起反对北洋军阀，而且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建立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个对自己更具有直接威胁的派系。

作为民主共和这一伟大理想的政治鼓动家和革命实践者，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变化无常的姿态，实际上是在一定前提下投异己力量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的最终目的。例如他对刘学询允以皇冠作为诱饵，是想让这条肥鱼上钩，感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他这种举措，并没有离开共和革命的轨道，而恰恰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和举动上，也表现了他这一政治谋略。孙中山发动革命，就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落后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先进发达的国家。但他清楚，凭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革命要同时面对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作尖锐斗争，只要有被勒死于襁褓之中的份儿。不如迂回前进，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后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1900 年，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革命的支持，他允诺尽力平息台闽粤各地的抗日活动；为了争取英国的援助，他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提出以各国总领事为顾问局员、关税增改须先与列强妥议、路矿船政及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特别是连军费都无法开支，孙中山为了寻求贷款，曾试图以轮船招商局、江苏省铁路、汉冶萍公司以及长江和近海航行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还与日本谈判委托日本建立中央银行，给予发行纸币、免税、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改造货币、管理印花

税等特权。

孙中山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把“利用异己手段不择手段”的策略发展到了极限的嫌疑，特别是中日密约公诸于世之后，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也使不同政见的立宪派有了搅混水的机会，就连中华革命党内部也产生了不安与混乱。

这正是因为孙中山本人对政治信仰的理想化程度远甚于一般人，而使得其策略跨度也更大的缘故。在特定的时刻，没有外援，其革命事业完全可能会功亏一篑，半肚子流产，策略的抉择和运用，往往决定着离胜利哪怕只有一步之遥的革命成败。孙中山采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在孙中山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乃至封建地主是尖锐对立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采用灵活性的策略，借用对异己力量依赖、合作的方式，来利用异己力量，是可行的。

革命要把握步骤和重点

孙中山以带有几份宗教虔诚式的狂热和执着，坚信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天赋之权，中国只有在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赶走了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够实现民主共和。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各种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革命力量和革命意识的薄弱，以及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中国民之心极深等残酷的现实。中国革命如果不能正确地确定其发展过程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骤的重点所在，本身力量就较薄弱的革命党人盲目行动或全面铺开行动，不能完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的话，革命的胜算就会少去很多。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从1905年到1924年间，孙中山一直在进行着革命程序的摸索和论述。早在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之中，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三序”论，别具匠心地把革命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3个阶段。

孙中山主要着眼于考虑中国有过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反民主共和的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长期生活于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人们，民主政治是陌生的，甚至是畏惧的，要扫除反动势力和习惯势力，建立民主共和国，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把这过程作了一个设计：推翻清朝统治后，首先经过一个革命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然后经过一个过渡性阶段，提高国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国民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建立地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最后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一设计具体表现为3个时期的方案：

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即“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革命军起义后，军队和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由军政府总管地方行政，依次扫除积弊，如斩绝“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税捐之横暴”等“政治之害”和禁止畜养奴婢、缠足、吸食鸦片、讲风水等“风俗之害”，并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土农工商实业的利源。

概括而言，一方面扫除“政治之害”和“满洲势力”；另一方面为民国奠定基础。孙中山认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3年的时间。

第二时期为“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治有成效，解除“军法”，公布“约法”。地方议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军政府、地方议会和人民，各循“约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行事。以天下平定后6年为限。

这一阶段为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其主要标志为产生人民选举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官”。

第三时期为“宪法之治”，即“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

此时期被认为是宪政时期，只要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宪法，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行事。孙中山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

孙中山对革命程序即革命步骤的探索一直坚持到1924年，其间，他1920年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将革命程序划为“军政”和“宪政”两时期；在《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又把革命分为“破坏”、“过

渡”和“建设完成”3个阶段；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最后论述革命程序的问题时，又依然把革命划为“军政”、“训政”和“宪政”3个时期。他还试图从各省当时政治形势不平衡的情况出发，把各省作为“训政”和“宪政”时期的实施单位，从小到大，最后达到全国实现“宪政”的目标。

孙中山在试图划分革命程序的同时，非常强调革命程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不经过军政时期，无法扫荡反革命势力；不经过训政时期，无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民主政治，很可能造成“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后果；至于宪政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革命的目标所在。

孙中山这一“要把握革命的步骤和重点”的策略，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过程规律，以及其对每一步骤重点的强调，指导了革命。

定都南京和南京就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方面就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让袁世凯当临时总统以换取他承认共和。尽管孙中山回国后一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可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弱点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怯于袁世凯所采取的武力与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的进攻，不敢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宁愿通过和谈来取得“共和”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在这种可悲的议和谈判开始之后产生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过客”身份，他无法改变这种妥协的现状，只能沿着已经达成的协议一步步规矩地走。

谈判过程中，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情况时，袁世凯露骨地表示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来另立一个新的统一政府。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一点，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意识到，“袁化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恢复独裁专制统治。

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了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中加入了“即由袁世凯认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立即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使中央政权的职能。

袁世凯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敏感。他向袁世凯致电抗议，说“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并开始策划如何牵制和削弱袁世凯的势力，保卫真正的共和。

当时的中国，从2月13日孙中山辞职至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前，并存着南北两个临时政府和南北两个临时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民国合法的政府，却无权管辖北方一带；北京临时政府对民国来说是不合法的，但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又是事实，并有着取缔和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趋势。

尽管孙中山此时于南京临时政府之中已心不由己、力不从心，他还是想利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力量暂时存在的现状，利用这一角还能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政治舞台，与袁世凯作临时政府时期的最后一战。

他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3项条件。力图使袁世凯远离中外反革命统治中国的巢穴——北京，来到革命力量相对雄厚得多的南京。他试图以这“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来牵制和削弱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在革命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下，维护共和。孙中山坚持这一点是对袁世凯是否真的拥护共和的考验，并宣称袁不南下，他就不解职。

孙中山这一“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和不团结，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没有成功，没能达到钳制袁世凯的目的。

当南京临时政府派遣迎袁走使北上时，袁世凯一手制造了北京兵变，准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证明袁世凯不能南下。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脑们得到兵变的消息后，召开了一昼夜的紧急会议。孙中山试图挽救民国危急，说服革命党人出兵平叛，并由黄兴等将领发表率兵北上的通电。就在这一关键而紧张的时刻，帝国主义又一次支持了袁世凯，外交团派军队在北京示威，日英俄德美等国分别从各地向北京增调军队，制造紧张局势。帝国主义一出兵，软弱的革命派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了。立宪派、旧官僚、民社、章炳麟等都竭力反对定都南京；革命方面的都督朱瑞、孙毓筠、李烈钧、蒋尊簋、蔡锷等

以及同盟会的喉舌《民立报》都主张迁都北京；只有粤闽少数都督、部分民党报纸和海外华侨微弱地坚持奠都南京。孙中山回天无力，只得迁就。3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4月2日，又议决了临时政府迁都北京的议案。

“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却首先在南方引起了场反对的风波，湖北临时议会在民社的策动下，说各省都督的“差官”（指临时议员）无权制定根本法，不予承认。湖北反约法通电，很快得到了多数省份议会的响应。立宪派和章炳麟叫嚣得更是凶狂了。见缝插针的袁世凯马上就利用了这一风波，他一面宣称办事必须以约法为根据，一面又说法制本可随时改良，到时提议修改。就这样，《临时约法》沦为了一纸空文。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说明辛亥革命的失败。

“调虎离山”政治谋略的正确性，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战术中闪光的一点，其失败是历史的趋势。

北伐配会议和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为筹措起义经费而奔走。他从报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如当时往太平洋回国，20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他认为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英国政府答应不再借款给清政府以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

1911年12月25日，当孙中山取道法国来到上海时，已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尽管他发表宣言说：“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他一下船就反对和议，表明自己一定要为推翻清王朝和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目标而奋斗。可由于袁世凯仗着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对革命采取了武力与和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革命党怯于自己本身的弱小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对革命毫无信心，无法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幻想通过和谈取得“共和”。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由唐绍仪和伍廷芳为南北全权代表的和议已在上海开始时，革命方面已与袁世凯达成了改临时总统之职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初步协议。

孙中山回国之时，等待他的是一副无法改变的现状，一副连黄兴都日渐右倾，幻想愿以拥袁为总统，换成他赞成共和的妥协现状。这一现状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声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迫使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能按照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去走，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

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有所认识。早在武昌起义之后，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回国后，对袁世凯养兵自重，玩弄和谈，认遂已欲的行径也有所觉察。他在《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中指出：“袁意不独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仰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

基于和谈之势不可逆转，而袁世凯又不可信任，孙中山认为必须把握和谈的主动权，要把握主动权就必须“笑脸”与“拳头”相结合。他提出了“以北伐配会议和”的策略，以北伐为议和的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袁世凯反革命的两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强调：“临时政府之职务，首在军事上之进行。”“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在主张议和的同时，积极整兵北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怀疑南方会让出政权的诚意，便玩开了手段。他立即撤销议和代表，并指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以宣言要誓死抵抗，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迫使革命方面彻底妥协。

孙中山针锋相对，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致电广东等省迅速组织力量出兵北伐，并拨出二十万元巨款，交予北方党人代表胡鄂公等，让他们立即发动北方的革命，以背后打击敌人。

北洋军阀的咄咄逼人，使前线趋于紧张，而一时高涨的备战与北伐的声势，鼓励了革命党人，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己指挥三军，任黄兴为北伐陆军总参谋长，在总统府内设立总兵站，并具体拟定了一个六路北伐的作战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自京汉铁道进；

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

1月13日，民军在津浦路北伐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固镇、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胜，皖军、豫军、奋勇军亦分别在安徽、河南和湖北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北伐的枪声，使得和谈陷入了僵局。孙中山并不畏惧，作了和议不成就用武力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准备。1月下旬，孙中山电令黎元洪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容忽。”同时致电陈炯明并广东省会及铁路公司，提出借广东铁路“以为抵挡”，筹款北伐，并指法广西部督陆荣廷：“北伐之军，要选精锐”。还表示：“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共破虏巢”。

北伐战争的初期胜利驳倒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却招来对袁世凯表示欣慰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英、日、美、德等国军舰在长江上游戈示威，阻挡民军在秦皇岛登陆，驱逐占领山东即墨的民军，公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路洞线两侧十里内战斗，日俄军队增兵东北、内蒙，外国报纸极力宣传列强要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而立宪派乘机从革命内部动摇北伐，说帝国主义干涉，将使中国瓜分亡国。这样，大多数革命党人低头了；再加上革命军本身缺乏饷械，缺乏训练和统一的指挥，北伐战争中途而止了。

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以北伐配合议和，以保存革命成果”的谋略未能最后胜利，但其前期的胜利已足够说明他这谋略的正确性。

握紧拳头好说话

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的认识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但相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而言，他要超出很远。

由于革命军本身力量的虚弱，列强的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的妥协，孙中山力图以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无法得以实现，南北议和，以求实现民国统一，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迫于各种原因，放弃了总统之职，但他对袁世凯素有戒备之心。深深明白袁世凯玩弄和谈的最终目的，他很大程度上预测袁世凯一旦把握政权之后，一定会背叛革命。为此，他主张南北议和，统一民国，以避免列强瓜分中国的同时，要力保革命的实力，以防备袁世凯的变卦。南北和议如果只是一出骗剧的话，真相大白时，掌握了实力就掌握了发言权。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前，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试图努力争取在南北统一后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如果北方袁世凯方面不接受的话，就退一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南方的武装力量，以防万一情况有变时，革命党方面仍拥有实力；调新成立之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直接威慑袁世凯之老巢——北京；任命柏大蔚为山东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以期不测之时，能与北京、南京的革命武装力量相呼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孙中山一再劝说黄兴继续担任陆军总长，黄兴拒绝了。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汪精卫等也多次私下约定由黄兴掌握陆军，黄兴拒之甚坚，说：“奈何仍以是污我。”

黄兴这一立场恰恰给予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不原意军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力主让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对此，南方将领深为不满，集会于南京，宣称：如果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话，大家都不予承认。但由于黄兴等消极态度，使得革命党人最终把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孙中山只好退一步考虑，促使南京留守府的成立，希望以南京为大本营，保存革命实力。但黄兴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思想消沉，在应该任留守府留守时宣称：“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此职。”他这一态度和立场使他无法完成以南京留守府来保存革命实力这一计划，他消极就职，宣称“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代表，但他被革命党人普遍认为“倾于理想”，而受到了孤立，他的战略战术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正如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所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之主张，……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

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在兵权上一步步地退让了：陆军总长让给了段祺瑞；直隶都督被袁世凯借口北方军人反对，改为袁的心腹，王芝祥却被任命为南方军宣慰使，协助黄兴解散南京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南京留守府仅存两个月，黄兴就主动要求裁减号称30万的赣军、浙军和粤军；武昌起义后组建的八师二旅，也只剩下一师一旅，四川、湖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的军队也大批裁减了。

在南方大肆裁军的同时，袁世凯大力加强北洋军的建设，使其实力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对比悬殊之后，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1918年3月20日，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遭到暗杀。

宋案发生后，国内革命党人电促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回国商议对策。

孙中山仍然坚持“要握紧拳头来说话”的谋略，他明确指出，事已到此，只有起兵，而且应把握时机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由此举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继续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这一要掌握军事实力的谋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而未能得以实现，血的教训证明了他这一谋略的正确性。

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袁世凯的谋士杨度在其《君宪救国论》、《君宪纪实》之中，有一段惊世之言：“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这段话可以说是阐述尽了兵权对于政治之重要性。

武昌起义后，主持当时中国政治风云可以说是两个人：南孙中山和北袁世凯。他们俩人的斗智斗力，谁输谁赢，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袁世凯靠搞武装起家的，十分了解兵权的重要性。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展自己的实力，而削弱敌对方面的力量。孙中山在这次较量中，破此先手，把自己手中40万军队和七、八个省的地位让得干干净净。

孙中山之所以会把拳头交给别人，主要是被自己的幻梦和袁世凯的手腕所迷惑。他十分天真地认为，南北统一之后，革命军队为民主革命开辟道路和防止封建复辟的职能已经消失，他说革命军队已完成了民族、民权主义的革命，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实行民生主义，兴办实业，不必要用武力，孙中山还被袁世凯所玩的手段所迷惑，使得他认为袁世凯已真心真意地参加革命，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就会像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一样，受共和国家法律的约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孙中山有一整套“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却无法认识到袁世凯一旦掌握政权、兵权之后，就会破坏共和、破坏民国，建议独裁专政的统治。这是当时整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软弱和幻想的共同点，孙中山曾有过要保住陆军总长之职、建立南京留守府以保存革命军实力的想法，然而却由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有名无权的原因，未能付诸实现。黄兴、宋教仁等人均认为有了《临时约法》就能约束住袁世凯。

当袁世凯在裁减革命军和加强北洋军，改变了南北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后，于1918年3月20日，有恃无恐地暗杀了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举起屠杀革命的屠刀时，革命党方面举手无措，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此时，还有极大一部分革命党人仍沉缅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光环之中，主张用法律解决问题，黄兴等就力主“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

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仔细地分析了宋教仁遇刺的前因后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兴办铁路。主持国民党实际工作的宋教仁则领导国民党积极进行竞选活动，指望通过议会选举，进行组阁，然后把握全国政权。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要拨专制之死灰，页负民国之付托”。不容置疑，袁世凯是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

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斗争呢？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依靠议会的约法，是无法根本制止袁世凯破坏民主，建立专制的。必须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他指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有决者，只有武力。”他说“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所袁氏鼻息，莫改坚持，均不足能予智之雄，拥兵自卫之坚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

因为认识到法律和国会的无能，孙中山号召：“事已至此，只有起兵”，“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以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全面布置起兵讨袁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去与黄兴辩论，企图说服黄兴。

在积极发动武力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到了以法律为手段，揭露袁世凯，孤立袁世凯。他建立将4月12日的国会延期，以便弄清宋案结果，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还注意到阻止帝国主义向袁贷款，以使其财源枯竭。

在孙中山的领导号召下，谭人凤、李烈钧等追随而至，主张“以至仁伐不仁”，黄兴也清醒，转而支持起兵讨袁。1913年7月13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义，黄兴在南京起兵，陈其美宣告上海独立，柏文蔚在安庆再举义旗，粤、闽、皖三省也燃起了烽火，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这样，在孙中山“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政治谋略领导下，革命党走上了武装保卫民国的道路，发动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在艰苦的政治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有美丽光环的资产阶级法律不是斗争的根本，形成了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谋略，是他政治生活日渐丰富积累的结果，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是孙中山在中华民族受着帝国主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而面临着危亡局面的情况下，提出解放民族、推动民族发展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战斗意义的，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口号。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人类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5种天然力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并不同于同武力造成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必须注意到两种力量：一是“天然力”，一是“人为力”。

“天然力”主要是指人口问题，他认为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他认为外国的人口在急剧增加，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威胁。他说：“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10倍，英国增力03倍，日本也是3倍，俄国是4倍，德国是两情半，法国是四分之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900万，现在便有1万万多，再过100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10万万多。”“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孙中山认识到人口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经济卫生条件下，当然无法预计到中国人口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民族发展动力的问题上，孙中山主要强调的是“人为力”。他说“人为力”中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这两种力都指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

政治力压迫指的是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先后通过战争，强迫中国订条约，割领土，丧主权，使中国沦为殖民社会。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帝国主义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保护国，还割去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

经济力压迫，是指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使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控制中国的税收；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垄断储蓄，发行纸币，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经营轻重工业，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设立邮局控制汇总业务；索取巨额赔款等等，平均每年要从中国掠走财富12亿元。

孙中山认为，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人为力”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民族要发展，必须摆脱这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孙中山这一谋略实际上反映了他打倒帝国主义来完成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的思想，在当是是极具实际意义的，是一面领导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旗帜。

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不管他们在主观上的认识怎么样，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佼佼者的孙中山，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我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有时他称为“受屈民族”）的求解放斗争，是世界革命潮流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无比伟大地倡导，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所受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及各个国家对这种压迫所做的反抗、斗争，都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

孙中山发现欧洲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他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之文化，必然压迫亚洲社会使之不能进步，也就是说使亚洲民族不能独立和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上土耳其为先导，波斯、阿富汗、印度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相继起而抵抗欧洲强权，其中以四万万之中国为竞争最烈者。但是亚洲“受屈部分之人类”的反抗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是帝国主义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科技和军事；受屈之民族政治、经济和科技均落后，甚至还有一个反动腐配的国内政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鹰犬。各民族的反抗和斗争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各民族应如何来谋求革命的出路？

孙中山认识到世界范围“民族自由之大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只有被压迫之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头，才有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希望。

孙中山认为特别是亚洲人民应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实力，共同抵抗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他所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制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策略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四万万之中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了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不只是把远东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身体力行地帮助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他帮助过菲律宾反美战士购运军火器械，还准备带领中国革命志士前赴菲律宾协同作战；他还热心支援过越南的反帝爱国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认为被联合的对象并不只是限于恶劣周边国家，还包括非洲甚至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他认为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才应该团结起来，只有把所有被压迫民族全部团结，才能有充足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略。

孙中山认为苏联在欧洲也是被压迫之民族，也应该团结起来。他的“联俄”政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致苏联遗书》中更为急切地体现了孙中山欲联俄以谋求中国民族革命胜利的心情。他在《遗书》中说：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侯作共力。”

孙中山这种联合和支援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思想，在晚年发展得更为成熟了。他在最后的《遗嘱》中仍不忘这一策略，他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指全世界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压迫民族。

孙中山这一政治谋略当时在国内外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对世界反帝求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卓越的贡献。

要王道，不要霸道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东亚地区，先后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所以，亚洲国家基于唇齿相依的道理，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在日本一些忧于时事国运的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称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或泛亚细亚主义。其内涵简而言之，就是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地理位置互相邻依，文化相通，历史上又有互相交往的悠久传统，一旦受到外敌侵犯，应该互相联合一致，共御外敌。

大亚洲主义刚产生时确定秉着善良的目标，日本资产阶级倡导由日本一国延及亚洲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被侵略国家联合组织一个“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大亚洲主义”是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的，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响应。

但是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889年2月，明治政府公布了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集权制。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此后，日本由受欧美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侵略、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了欧美列强的东亚地区进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掠压的对手和伙伴。政治形势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促使了亚洲联合思想的分化。

左派亚洲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民权派的思想，主张亚洲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实行合作，驱逐欧美侵略势力，在亚洲普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右派亚洲主义者则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在东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大殖民帝国。孙中山觉察这两派思想上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对在日本当道的右派亚洲主义者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所干的一切勾心让孙中山触目惊心。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认为是“发展国运”的“大佑”良机，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接着又利用袁世凯签订了全面攫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权益的“二十一条”。寺内正毅上台后，又通过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北洋军阀镇压中国革命。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孙中山对日本右派亚洲主义者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差异，并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

1920年，美国部分州为排斥日本人，制定了《外国人土地法》，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排日移民案，掀起了一场遍及全美的排日风潮。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一部分又乘机提起了大亚洲主义，欲唤起内外舆论，以进行黄白人种的战争。

恰恰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要求，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取道日本前往北京。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应神户高业会议所、《大坂每日闻》社等五团体的邀请在兵库县立女子高等学校礼堂发表演讲，题目也特指为极为敏感的《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面对着中日两国的听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并乘机提醒劝戒日益军国主义化和侵略化的日本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其演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亚洲是人类最古文明的发祥地，曾经繁盛一时，但近几个世纪来，

各民族日渐衰弱和委靡，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日本最先举行变革，在 30 年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成亚洲最早独立的国家，这是亚洲复兴的起点。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给了亚洲各国各民族信心和希望。此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都兴起了独立运动，并呈“联络”之势。

其二，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欧洲文化虽是科学的文化，但它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仁义道德为本，不压迫人，重感化人，是王道的文化。与霸道的文化相比，王道的文化更有益于正义和 人道，更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是真正的文化所以，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兼修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苏维埃俄国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其三，必须明白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对抗欧美的强盛民族，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亚洲也会出现行霸道的国家。日本学欧洲武功文化最为全面，既得到了欧洲霸道文化，又有东方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诚，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演说深刻批判了日本各种大亚洲主义主张的狭隘民族性，科学地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号召联合“外洲”、“外国”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强权”，伸张“公理”。并呼吁要警惕亚洲也可能出现行霸道的国家，劝戒日本人民慎重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充分体现了他“要王道，不要霸道”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这一谋略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既强调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又指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实质和可能被利用的实质，表现了他极高的政治素质和目光。

孙中山政治谋略（下篇）

要确定党的中心地位

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是否就要让所有的国民都参与领导政治？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只能造成政治混乱和破坏民主政治的后果。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而又能真正建成民主政治呢？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政党，并以政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势力，让政党代表大多数的国民掌握国家政治，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正如孙中山在《总理遗教》中所说：“民国之政治若普间于国民之可否？岂不是行极繁之手续？故欲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

至于政党的产生，孙中山认为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他从国家成立后的国家治理出发来阐释这一道理。他认为国家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唯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其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论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为常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常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正因为这种需要，国家必须由少数优秀特出的“国民”，组成政治核心力量——政党来治理国家。

孙中山认为政党不但是“民主政治”赖以实施的手段，还是“代议政体”的基石，他说：“立法机关乃人民之代表”，而“欲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他甚至还认为，没有政党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权主义，就不能维持国家，不能为人民谋幸福。而确立了政党的中心地位后，就能使人民对政治产生兴味，积极参与，并能由政党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不溢乎正规。

在确定政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势力的同时，孙中山还进一步规划了“政党政治”的实施方案。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之中，政党应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政争。他说：“政争为绝好之事也。须知政争也，非争势力乃争公道。”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政党之争能够更好地完善民主政治，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发展。因为一个政党组阁后，执行其政党制定的政策，如果不很得力的话，不很完美的话，就将遭到有“政争”的其他政党的反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孙中山认为“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

在如何处理政党之争这一问题上，孙中山更倾向于英美的政党政治形式——两党制。他认为英美两国的政党模式也适用于中国，两党制较多党要优越得多，正如他所说：“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总之，不管是采取多党制还是两党制，不管是哪一党在朝，哪一党在野，政党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家由政党领导，“促政治之进行”，完成“民主建政。”

孙中山在构想建国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重要位置的同时，在其革命的摸索中，还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论，也明确地表现了他“要确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心地位”的谋略。

在他革命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民国已名存实亡之后，孙中山在检讨失败原因时，认为“非袁氏兵之强，实因党人心之涣散”。革

命必须从头做起，孙中山认识到要粉碎“反革命势力”的统治，必须有一个团结紧密的党来统领一切军国大事，以达到集中一切之力量，为革命奋斗，因此，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原则。

“以党治国”和“政党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个概念的涵义由政党和革命党的不同意义所界定。“政党政治”是由政党来完成，“以党治国”是由革命党来完成。但是从领导者孙中山所采取的政治谋略这一角度而言，他们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确定和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施行“以党治国”的策略时。决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用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以图在革命党的领导下，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为革命奋斗。

不管是政党采取“政党政治”，还是革命党力主“以党治国”，都是为了确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如把“政党政治”纳入一定的历史阶段，将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如把“以党治国”付诸了实施，也能力革命斗争阶段所需要的革命党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提供理论指导。

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

革命如果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怎样才能广泛吸引人民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促进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关切和熟悉，实现真正的民治？怎样才能打破违背民主原则的中央及省的“官治”状况，避免人民只能被动地受福祸于官吏的贤愚善暴？怎样才能避免中央统得过死，地方有名无权的专制统治，而实现真正的民治呢？

孙中山在摸索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完成实现民治这一革命最终目标时发现：与一般老百姓最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事，就是一个县里的事，老百姓最关心也就是一县之事。如果让县自治，让老百姓参与县里之事，进而一步步参与国事，应该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子；其次，如果实行地方自治，让人民直接或间接地把握地方主权，对地方政府和行政官有予压之自由，人民岂不成了地方之主人，依级而上，就能成为国家之主人；其三，如何把喘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和活动范围作一个理想的界定，让军事、外交、币制、交通、税收等权，而把其他一些权力不放到县一级政权，让人民在县级政权领导下，发挥主观积极的能动性，岂不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实现人民的自治的目标，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的初期，刚刚举起民主共和的革命旗帜时，就提出了实行“地方自治”这一策略。

1897年，他就说过：“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他这里所说的“自治”是与“他治”相区别而言的，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要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体现。1900年6月，孙中山与杨衢云等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也阐述了地方自治的策略，说“中央政府以总其成”，“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1905年《同盟会宣言》更进一步明确了地方自治的概念。

在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孙中山坚持维护地方自治的原则，与一切反对地方自治的思想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在政纲中规定：“促成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先后遭到了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反对，孙中山不屈不挠地领导革命党人坚持地方自治原则。

二次战争和护国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国根基不牢，他认为“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这一时期，他不但大力宣传和介绍国外实行地方自治所取得的成绩。还在他所划分的革命三个程序理论中，认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地方自治。1920年，还特地写了专著《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1920年12月1日，在重组军政府后发布的《建设方针宣言》中，提出了“今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励行地方自治。”

在他的政治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之后，他地方自治思想更进一步完善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列入了实践纲领。1924年9月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说：国民党之北伐，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势，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同年11月10日，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他的整个

政治思想演进的。其基本内容就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而主要方式是省自治和县自治，而以县为充分之区域。孙中山认为，“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所以实行地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因为感情上，国人对于本县，在历史习惯上有亲昵之感觉；从利害关系上，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从政治和管理效率上，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织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利用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另外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有利于实现直接民权。

实现县自治，并不是县完全独立自由，其自治领域大致为清查户口、确定地价、修筑道路、垦殖荒地。振兴水利、举办实业、设置学校、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等等。还有，县自治，人民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4种权利，决定县议会或县长，实现直接民权。

孙中山这种“把地方事务交给地方去管”的政治策略，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它既能使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又能为实现全国民治打下基础，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华侨之力不可忽视

我国人民移居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人数众多，特别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压，以及国内反动阶段的政治迫害，有很大一批人飘洋出海，流落他乡异域。到辛亥革命时期，海外侨胞总数已达 600 多万人，其中人数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是南洋，占华侨总数的 67%。

各地的华侨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选择的职业有所不同，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也略有不同。例如，美国及美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大多从事种植、开矿、筑路与服务业，也有一小部分经营洗衣铺、小餐馆和杂货铺，在澳洲的华侨，早年主要当淘金工人，也有人经营餐饮和种植业；而南洋地区，华侨主要从事种植园工人、各种手工业工匠、建筑工人和小商小贩。这一地区的华侨经济实力最强。

但是，不管是分布在哪一个地区，也不管他们是工人、店员、小贩，商人或中小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他们都因为身处异域，寄人篱下，而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歧视而欲诉无门，他们从生活中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华侨的命运与祖国的盛衰强弱是血肉相联的，他们都殷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使他们摆脱“海外孤儿”的处境，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无法保护他们，还反动地他们一概视为“省贼”、“秀民”。因此，他们也寄希望于国内的革命。出生于华侨家庭的孙中山深悉侨情，他仔细地分析了华侨的处境，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以及他们的希望和目的。他发现华侨由于身处海外，思想开通得早一些，比国内的人更容易接受三民主义；发现他们更能清楚地体会到革命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也发现他们不但较国内一般人更具有革命意识，而且也更拥有财力和物力。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其革命初期，就确定了“要发挥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并立即付诸了行动。

起初，他主要是利用其胞兄孙眉在华侨中的影响宣传教育华侨。1894 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组织华侨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 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率领华侨及武装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起义。此后，多次在华侨中筹捐资金，募集勇士在国内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黄花冈 72 烈士就大都是海外华侨。他还十分注意鼓励和策动各种侨报、侨校的工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例如新加坡华侨志士陈楚捕与张永福合办了《图南日报》鼓吹革命，在檀香山的孙中山看到该报 1905 年元旦印赠的月份牌之后，马上寄 20 美元购买，并写信加以鼓励。陈、张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又创办了《中兴日报》，成为革命党在南洋的喉舌。在孙中山的直接支持和关怀下，檀香山创办了《自由新报》，马来西亚创办了《光华日报》，美国创办了《少年中国晨报》等，在宣传和组织华侨参与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还在日本东京青山创办了军事学校，为培养海外革命志士的军事能力用；他还注意联络欧、美、日的留学生，以组织革命团体。

孙中山不只是把华侨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选择起义地点和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位置方面，考虑到海外接济的方便；还认识到华侨在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认识到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皆有意为故乡进步发展”出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因清帝的退位，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得以实现，当务之急是实现民生主义，振兴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发展民生，振兴实业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短期内无法筹集大量的资本和缺乏先进技术与管理人才。这时，他首先想起的是海外华侨。海外华侨与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在资金、技术与人才方面，可以为祖国发展实业，进行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1912年4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工职致力于发展实业。为了振兴中华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在上海组织了“中华实业银行”。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一个人就认股了十万元。孙中山委派银行家沈懋云和归侨庄希泉前往南洋劝募华侨认股，共得投资300多万元。1913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了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1912年2月，孙中山还支持和鼓励吴世荣组织了“华侨联合会”，作为沟通政治与华侨之间的桥梁。其协会在内，辅助华侨归国投资，振兴实业，发展商务；在外，联络海外侨团，互通声气，维护正当权益，并坚定内向之心。这在鼓励和协助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方面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孙中山还注意到禁止地方官吏对华侨的敲诈勒索。1916年，孙中山还曾派人调查，准备在国内选择矿山和土地，让失业华侨归国后进行祖国的开发和建设。

总之，孙中山对中国的侨务政策作了极大的贡献。他在1912年3月19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命令外交部妥筹保护侨民及杜绝贩卖“猪仔”的办法，是我国第一道保护华侨的法令。1923年，孙中山在革命政府大本营中，专门设置了侨务局。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设立的侨务机构。他的这些努力以及他所采取的“发挥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策略，使侨务工作引起了国人的重视。

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

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国家进步，革命的胜利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英雄造成的。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摸索中，思考过这么两个问题，其一是怎样才算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其二是怎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孙中山对革命目的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发问，使他在革命活动后期，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进行了重大突破，提出了“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

首先，他是从自己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出发，认识到重视“人民”的必要性。他继承并改造了中国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了诸如“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等口号，承认人民在国家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军人和官吏为人民所养，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公仆，而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只有用人民之群力，才能建设好国家。

孙中山反复强调要重视人民，要尊重人民的意愿，正是他在革命探索中，力图认识“民治”的真正涵义的表现。他试图以重视人民为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治的过程和途径。

其二，是对人民重要力量的认识。他在革命数次失败之后，慢慢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有了崭新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踏而去，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也正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擦亮了眼睛，使他认识到革命是国民的事业，不能只靠一两个人去做，要靠多数人去，做，“群策群力之足恃”。

孙中山在思想感情上这一变化，在辛亥革命之前并没能马上付诸行动，他还没有魄力去依靠人民大众奋斗，特别是无法用积极的口号和措施，去发动农民，没能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次失败使他下定了“合群力为革命力量”的决心，他正言宣告，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一定要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汹涌澎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9月的粤汉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10月开滦矿务局大罢工；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2月广东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70余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侵略；1924年工运、农运迅速发展，建立了武装，即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斗争，不但有力打击了封建帝国主义，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些斗争的熊熊之火，使孙中山有了更新一步的认识，当他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参加农民大军时，极具远见他说：“这是革命的起点。”也正是这个时候，孙中山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国民革命之运支，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也正是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农民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基础。他认识到了“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

线上去奋斗。”还认识到了，一般国民来参加革命，是革命的“后盾”。如他所说：“革命成功，中国能独立和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反动势力的相对强大，在早期革命失败上已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发现若只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动所有的革命力量，合群力而革命，反动势力必将土崩瓦解。就此，孙中山提出要使中国进步，真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非用群力不可。”他说：“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极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是在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去做，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

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在孙中山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积极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还注意到了工农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物质财富是由工人和农民创造出来的。如果工人和农民都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率便是很大，便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极大作用，因此在国家建设之中，也要合各阶级之合力，而不能单凭掌握了机器的资本家。

孙中山用他的所有活动，来实行“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一直到1925年3月11日，在他的《遗嘱》里，还提出“要唤起民众”的口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也属罕见。

各民族之间应平等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民主独立、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封建社会几千年统治，中国在多以汉族为统治中心，到了元朝，蒙古族人主中原，清朝，满族人主中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将如何来处置国内的民族关系呢？

孙中山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认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府，而不只是简单的“排满”，而且“排满”也只是排那些害人的满洲贵族，而不是排所有的人。不管是革命，还是建立共和政府以后，都要各民族共同努力、共同促进。

就此，孙中山在接受和提高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主义观的基础，提出了如何处理民族地位关系的政治谋略——各民族应立于平等地位。具体内容为“反对一个民族宰制于上”，实现各个民族间的平等，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也同样不受到排斥。

孙中山这一观念贯穿其整个革命过程。在建立同盟会时，他就注意到了他许多战友具有复仇主义色彩、种族主义性质的思想倾向。他认为反满不能把所有的满族人都置于敌对方面，我们并不是恨满人，他说把民族革命视为要灭尽满洲民族是大错特错。他反对同盟会的名称前冠以“对满”二字，认为“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

1920年11月，孙中山又主动否定了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五族共和”主张，认为国内何止五族，只提出“五族共和”是很不切当的，他认为中国应仿效美利坚的规模，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集合体——中华民族。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党内合作时，孙中山对民族的地位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民族同化仍有着大汉族主义味道，在他的民族主义之中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1924年4月，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说：“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他主张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孙中山所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准则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所内涵的民主主义精神。他提出的“各民族应立于平等之地位”的策略，既是当时形势下革命的需要，也是实现革命之远大目标建立中华民国共和政府后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可谓是高瞻远瞩。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满清贵族利用其政权对各民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其“鹰犬”——清政府，欲置中国于“共管”和“瓜分”的厄运之中，正如孙中山所说：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如何摆脱这种双重的民族危机呢，孙中山认为必须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而且这两种革命应同时并举，一步到位。要并举两种革命，就必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壮大革命之力量。就这一步而言，主张各民族立于平等之地位是唯一的策略。

就远大目标来看，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府之后，接着的就是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的原因，各民族均有自己的优

势和不足，只有实行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各民族人民，进行中国的建设。

孙中山在摸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就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提出了让“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的谋略，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极大的影响。

人民民主与人民独裁

革命成功之后，政权归谁所有，还要不要皇帝，还要不要等级观念。

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中山认为如果重新定一个皇帝、重新确立皇帝、大臣、巡抚、都督、县长等官级制度，普通老百姓无疑又要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过水深火热的日子，又会出现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矛盾对立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久，又会酝酿下一次痛苦的流血革命，这对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件痛苦不堪和损耗极大的事。

孙中山一直主张革命要一步到位，革命成功之后，永远不再发生也永远不需要发生流血革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孙中山认为处理政权归谁所有这个问题是根本，而且唯独只有“主权在民”才能永远避免革命。他认为要真正做到“主权在民”，必须先做到“主权为民”，这二者是一致的。

他说政府、官员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政权交到人民的掌握之中，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应该由人民作主，实行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应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应当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工具。因此，领导人必须奉行“公天下”的原则，而不能类似封建君主实行“家天下”。孙中山在这一点上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他的胞兄孙眉，为革命捐赠大批财产，也十分热心于革命活动，在广东父老和华侨中有极高的声望。革命后，广东各界一齐力荐孙眉任广东省省长。但孙中山认为政权是全民所有的，不能因为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就任命自己的兄长做省长，他力排众议，反对用兄长做高官，并亲自写信给哥哥做说服工作。

孙中山认为要实现“主权在民”，还必须把握好民与官的位置关系。他提出“主民仆官”的观念。他说“民”是“权”的主人，而官员则是为“民”服务的“仆人”。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就这个关系，孙中山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说共和国好比是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都是我股东的公仆。

但是，中国的民众由于受压迫过久，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实践的锻炼等原因，一时之间还无法认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孙中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主张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经常进行民主教育，启发他们觉悟。他在《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中说“13年以来，多数农民都是自己放弃这种权利，不知道争回自己的地位，不知道自己是主人翁，还以为象从前满清一样，自己还是奴隶。今日开这个会，就要大家醒起来，知道这十三年以来，自己不是奴隶，是主人翁。要能够做主人翁，便要大家联络起来。大家联络之后，有了大团体，便能够讲话。”可见，孙中山不只是在思想上主张“主权在民”，还力图采取措施，使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翁。

“主权在民”，但也无法使四万万之人全都来参与政权。怎么办？孙中山就这种新型政权的组织建设作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人民应先组织团体，然后选举代表来参加政权。他于《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中就阐述了这一具体办法。

孙中山在探索人民民主的同时，发现单单只有人民民主是不行的，还需要实行“人民独裁”，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没有人民民主，人民独裁将变质为个别人专政；没有人民独裁，人民民主将缺少应有的保护。孙中山

这种思想是在“以俄为师”的策略上，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成就。他在《民权主义》中说：“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样呢？……当然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

孙中山为了避免再一次出现流血革命而采取的人民民主政体形式，并就如何实行人民民主的方法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人民民主与人民独裁相结合的谋略，在当时未能得到实现，却给了后人以启示。

以法治国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孙中山在思索革命成功之后，采用何种治国之道时，十分慎重。他仔细地研究了中外古今的治国之道，发现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均是权大于法，皇帝老子天下第一，金口银牙，一个人说了算，不再适应革命后新政权的需要了，因为革命后将建设的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而并非某一个人的“家天下。”那么，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后，将如何进行治理呢？

孙中山从对中国传统的否定中，把眼光着上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权，强调中国只能采取“以法治国”的方针路线。他认为唯有“以法治国”，才能避免中国重新出现封建君主专制独裁统治，达到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是国民的国家，是社会的国家，而并非某一个人，某一姓的天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主权为民”的革命目标。

要以法治国，就得有法可依，新政府一成立，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立法问题。该制订什么样的法呢？

第一当然是根本大法宪法了。孙中山对英、美宪法很是赞赏，但又认为不能照搬照抄。他认为有文宪法美国最好，无文宪法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他把英、美政权建设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英、美实行“三权分立”（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的基础上，主张中国应实行五权宪法。

其“五权”，是在“三权”之外，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而成。孙中山认为美国的考选制度有很大的流弊，因为辖于行政部门之下，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于“纠察权”，孙中山认为应该设立一个专管监督弹劾的部门，并且为了使此部门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在宪法中应该独立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五权宪法”的理论，孙中山“五权宪法”是国家的基础，是建设“庄严华丽国家”的良法。“五权宪法”是孙中山“以法治国”策略的重要措施。

由于时势所局限以及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制定“五权宪法”，而只是制订了一部过渡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在孙中山参预下，由宋教仁起草制定的。这部临时宪法的制定也同样表明了孙中山以法治国的思想，因为此时南北和议已不可逆转，为了保卫中华民国的既得成果，防止袁世凯独裁，《临时约法》匆匆出台，它们沿用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改总统制为内阁责任制；规定了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公民的一般民主权利。特别强调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以及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

除宪法外，孙中山在他短短3个月的大总统任期内，努力履行“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制定出一系列具有鲜明革命民主性质的法令，共颁布30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较为重要的有：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

各类所谓“贱民的一切特别限制，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通令保护华侨，严禁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缠足，下令一律剪辮等；在刷新吏治方面，改革官制，举贤选能，禁止官吏循私在法；取消官场等级制；在改革教育上，提倡普及教育，取消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有封建流毒的内容；在发展商业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的方针，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农垦业，奖励华侨到国内投资等等。

立法之后，在执法上，孙中山更是身体力行，为维护资产阶级法律而不息斗争，充分体现了其“以法治国”的策略精神。

《临时约法》制定后，孙中山把它当成民国的一个硕果，无畏地捍卫它。当他觉察到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时，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时，曾附有3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试图通过法律来与企图复辟的袁世凯作斗争。1917年10月，孙中山因段祺瑞政府背叛约法而发动了护法战争。

孙中山坚持奉行“以法治国”的准则，自己廉洁奉公、不讲排场；不循私在法，任命自己的胞兄孙眉做首长；他还根据法律赋予他的权力，直接体察民情，阅批一些当时各界的“人民来信”，交各职能部门办理；他有时还在总统府接见民间人士，直至普通老百姓，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解决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孙中山“以法治国”的策略在其立法精神和执法态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但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更使人们耳目一新，在头脑中建立了民主共和观念，自称为“天子”的皇帝反而成了非法的东西，对中国日后政治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政权与治权的治塞效应

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认识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起初是单纯的仿效态度，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日趋反动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统治下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复矛盾，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巨大的消极后果，让他思索不已。

怎样才能避免西方那种国家政治生活的矛盾？那种人民不支持政府，力求以各种手段抵制；政府则为使自己成为“有能”机构，采取赤裸裸的独裁方式所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呢？

孙中山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策略，还是应该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着手，他把这一课题概括了一下：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怎样才能把现实的“第一说”变成理想的“第二说”呢？

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让政权对治权的控制象活塞一样往返运动”的策略。他这一策略是在他自己提出的“权能区分”的理论上形成的，是希图“济代议政治之穷”的摸索控求的结果。孙中山在1918年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来阐释他的“权能区分”理论，他说共和国好比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都是我股东的公仆。”他这一比喻正是说明了一个原则——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压之自由仍在人民。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和“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关键在于“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即孙中山所提出的“政权对治权的控制象活塞一样往返运动。”

他从政治二字的定义着手来剖析人民政府的关系。他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也可说是政府权。”政权归人民所有，治权为政府所掌握。如果把治权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掌握政权的人民便是操纵这一机器的工程师。政府这台机器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选权和监察权等五种权力；而人民这一工程师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四种权力。“工程师”与“机器”的关系很是明显，政府的权，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选举了政府、官员，也就发出了一种动力，但是，能发出也能收回，象机器的活塞一样能做往返运动。人民选举之后，还要监督、考核，发现不合格，反主人之道而行之者，可以对其行使罢免权。人民对于政府及官员，有决定其取舍去留之权。

孙中山这一“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的策略，是极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在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政权根本性质的前提下，不仅解决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预质问题，还能使人民成为国家正直的主人，能直接参与国务活动，也能使政府以人民意志为依归，使它在人民的支持下产生高度的效能。

虽然在孙中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这种用“四权”管“五权”的轨道政治无法得以实现，但他这种对政体组织形式的探索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

自由有限度，平等有真假

在中国这个曾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专制莽林中，谈自由、谈平等，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很有新意，也很有难度。跟其他任何新概念新事物来到中国这块大陆而遭到非难和歪曲一样，自由与平等，也遭到了话多后的不良之人的歪曲。比如说：什么自由即绝对的自由、平等就是要一刀切，搞绝对平均主义之类的。如果再无人作出权威性的回答，这对概念将不可避免地带人毒素渗入歧解的国民心中。

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目的本来说是争自由、争平等，自由和平等是民权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国民连自由和平等的真正意义也没有把握的话，就无法明白革命的目的，更说不上革命了。

孙中山在大量的论述和演说中试图向国民阐释清楚这一时概念的弄清楚正涵义，以及他们的关系。并强调指出自由有“大自由”和“小自由”的区别，而自由是有限度的，其表现为“小自由”服从于“大自由”，与自由可称为是孪生兄弟的“平等”是有条件的，其有天生不平等和人为不平等的区别，要主张真平等，反对假平等，其具体阐述大致如下：

自由，首先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政府、政党的自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政府、政党要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活动，这都是自由范畴里的具体表现。中国国家首先得自由，民族才能自由，政府和政党才能自由。

其次，自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革命就是为了要争得个人的自由。但必须明白，个人的自由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这种“小自由”必须服从于“大自由”。

其三，必须反对超出合理限度的极端自由。他说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所以个人的自由，不可不争，但绝不能驾于国家、民族之上。他特别强调在组织政党和军队时，要求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严格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履行自己的义务。

总之，他认为自由是要争的，而自由又是有限度的。至于与自由关系密切的平等，他认为平等更为重要一些，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旧制度的不平等所在，而实现平等，消灭不平等是革命的目标之一。他对平等作了如下一些述说：

其一，他从事物的特殊性入手，认为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天赋平等论”是不成立的。他说自然界找到了两朵同样的花，人又怎么能平等呢？

其二，封建“真龙天子”们的那一套“天生不平等”的把戏是人为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天授”的，人们应该去消灭这种人为不平等厂争取真正的平等。

其三，必须主张真平等，反对假平等。所谓的“假平等”，是指各人的先天条件、基础、起点均不是同一个水平，所以他们后天发展也无法达到完全一样的高度。在这个前提下，去凑合“平等”，是压制冒尖的，迁就后进的，弱小的。这样将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所以这一种平等是假平等。

真平等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所以真平等是讲政治地位的平等，是各人立足点的平等，至于各人将要达到的高度，不能加以限制，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

孙中山这种观点既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具体素质和条件的差异，又强调立足点平等。这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拥有相同平等的机会，又不搞“一刀切”，不搞绝对平均主义，以利于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总之，孙中山关于自由、平等内涵及关系的阐述，是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由和平等。

孙中山经济谋略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是指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是一种质的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高的质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孙中山所认识的社会革命直观的多，他指的是民生革命、经济革命，或者说是民生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使中国的革命少走弯路，孙中山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发现他们走的是一条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的路子。他发现欧美各国在实现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之后，经济上却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贫富悬殊，竞争日剧。于是，就出现了穷人反抗富人的革命，孙中山认为这种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的经济革命，就是社会革命或民生革命。他认为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种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事，是破坏的事业；每经一次革命，必受一次之痛苦，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不能今日一次革命，明日一次革命，这样会使国民大伤其元气。于是，孙中山试图探索出一条捷径来，使中国革命能一蹴而就。

他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启发，他发现俄国革命既实行了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了经济革命，也就是说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了，又把资本家推翻了。

中国的革命是否也能一石二鸟呢？

回答是否定的。孙中山认为中国是一个未开发的国家，所患者贫，而不是要打倒资本家，来实现社会革命。况且中国当时机器工厂尚未十分发达，真正的资本家尚未形成，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斗争也不十分剧烈。基于这种国情，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不是推翻已经产生出来并危害社会的大资本家，而是应该防止大资本家的产生。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就应该用社会主义来预防大资本家的产生，也就是说要实行“土地国有”和“大资本国有”，“限制私人资本”，“以国家之力”发展生产，“以防止少数人垄断土地和资本，防止大资本家的产生和金融寡头政治的局面，避免走欧美各国在政治革命许久之，又不得不进行一次痛苦的社会革命的路子，而是使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并举。

孙中山在强调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时，阐述了自己许多理由。他说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将如欧美国家一样不可避免，中国如果不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时解决，中国实业发达之后，资本家必认资本能力压制人民，中国必受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之专制，中国一定也会要受欧美今日经济革命这样相同的痛苦，破坏的事业是永远穷期的。而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应适应世界革命的潮流，使两种革命一次成功。

孙中山还指出中国实行政治革命，相对于欧美国家有大资产阶级阻挠，要简单容易得多。他打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比喻，他说一切大灾大祸发生之前，要防止它的发生是较容易的，而大灾大祸发生之后，要扑灭就极端困难了，而且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中国机器工业不发达，大的资本家不存在，所以社会革命阻力小一些，要使中网建立国营企业，实行土地国有容易一些。

孙中山认为西方各国政权都操纵在极少数资本家手里，进行社会革命不

得不使用暴力。而同在使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君主专制，完成政治革命之后，民国之主权在人民，民国政府不但不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极赞成社会主义，所以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不需要使用暴力。

总之，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应当并举，也就是说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同时并行，而不应让两者之间留有一个产生大资本家的空间，然而他并没有实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在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阐述的远大目光，在当时不为人所理解，也为许多研究者所误解，却被后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说明。

社会主义之真髓

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风行一对，许多人都以谈社会主义为时髦，聚讼纷纷，然而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人并不多。孙中山在这个时候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一下把握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真髓所在，这种思想对他自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所提出经济策略，有着深刻而广泛地影响。

第一，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特征，他说“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是“社会主义之真髓”。他说美国人卓尔基亨利在《进步与贫困》中所说的“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问又恶得而私之那？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采，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深合社会主义的主张。他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发现资本也应该公有。对二人观点的综合接受，他得了结论。“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也正是这种认识，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强调一切生产资料公有。他于《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

第二，孙中山认为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富悬殊的根源，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真髓。他说分配应该以土地、人工、资本所生产的产物，按土地、人口、资本的分量配成定例。而资本主义社会里，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只享得三分之一，又得分与多数工人，每个工人所得数就很少了，所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发现马克思的分配法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平均之法，在实行土地和资本公有制之后，按劳心劳力之多寡给予报酬，是分配最平允之方法。

第三，孙中山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孙中山发现不仅我国古代尧、舜、孔丘和墨翟所说的“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同样不是真的。西方国家大资本家富可敌国，而穷人连面包都吃不上，大资本家以资本压制穷人，实行专政，哪里谈得上什么“自由、平等、博爱”。而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日上，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

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既打破了政治之不平等，同时打破资产之不平等，使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社会主义之主张是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总之，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人类谋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

由此，特别是在经济上力求平等的愿望，使得他在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带有浓郁的社会主义色彩。他说“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民生主义，即扫除社会之不平”，革命要消灭贫富之阶级，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他把民族、

民权、民生三主义又阐述为民有、民治、民享时得到了极致的表现。

第四，孙中山认为 20 世纪，民生主义已成为了世界潮流，而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即分为“集产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共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髓。集产社会主义又可称为国家产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营，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国营。”与集产社会主义相比较。共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由此可见，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把政治经济平等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分成了一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集产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为共产主义。

孙中山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所以不能马上实行共产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集产社会主义。他于《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以尽我人之本分。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他还就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缺陷和怎样弥补回答了记者问。就国家获得和国民获得来看，国有企业胜过于私有制。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真髓的阐述，说明了他的民生主义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大资本公有

孙中山因深深理解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业，所以总想并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要避免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专权的经济革命。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就能防止大资本家垄断土地和资本，就能避免社会革命带来的痛苦。他说：“就吾国现势而言，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预防之法为何？依余所见，不外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究竟该怎样来解决中国的资本问题呢？孙中山仔细地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认为在社会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解决资本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实行“大资本尽归公有”。

孙中山的这一认识既包涵了从发展性角度来考虑的机械化和公有化的辩证统一，也包含了他从全面性角度来考虑的公有化的层次性。

孙中山说：“现在中国一困，只在一穷字”，“中国今日民穷财尽，所患在贫”，所以解决资本问题，必先振兴实业，振兴实业是日后中国存亡的关键。而发展实业，就必须公有化和机械化并行。孙中山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实行上业统一和国有化之后，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这一次关于工业的革命，比上次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更为深远。而中国尚处于手工工业阶段，连第一次工业的革命都未实行，与欧美国家实行二次工业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在中国，既要使生产力大增，达到发展实业的目的；又要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贫者日贫，富者日富，造成富者压迫剥削贫者”的问题，就必须达到“分配最平允”的目标。中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两种革命并举，既要用机器化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又要实现产业公有化或国有化。

发展实业，实业产业机器化和公有化，就必须实现大资本公有制。“举凡一切天然物产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只有资本公有，才能分配平均合理，才能真正避免给民族和国民带来痛苦的社会革命。

对资本公有的具体构成，孙中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认为资本公有包括国家、省和县（地方自治“充分之区域”）三级所有。

国家所有包括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大规模的实业。他说：“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国有。”“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在限定大实业国家所有上，孙中山提高到了用党纲来规定，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就明确提出了，凡国中大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之。

省级所有，包括省级的地产，所借的外资，所办的实业所获的利益，均属于省级所有。孙中山在《复但想辛函》中曾说：“川省地大物博，甲于中国。”“借外资时，其合同大旨，须申明此种资本，为四川人民所借；所办实业，为四川人民所有；所获利益，为四川人民所享”。

县级所有即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应当设立粮食管理局，专卖粮食一类；其余衣、住、行三种需要之生产制造机关，悉当归地方支配，

逐渐设局管理；至于自治区域内的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

孙中山这种实行“大资本公有”的经济谋略主要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表明了他在处理一个三角关系（即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三条线索所构成的三角形，遵循着任何一边的长度少于其他两边之和的原理。直接实行大资本公有，使社会分配公允，而使国民避免一次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经济革命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他在经济谋略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特点。

平均地权

中国的革命，如果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未能解决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计问题，革命只是徒有形式了，再一次流血暴力革命将接踵而至。孙中山从欧美各国的革命情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欧美各国所发生的闹民主革命未能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实现土地公有或土地国有，导致了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专制和不可避免的流血暴力革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一步到位，预先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战略目标上，孙中山采了迂回前进的谋略，他不直接提出土地国有或土地公有，而是堂而皇之地亮出“平均地权”的旗号，在这面大旗的保护下，陈仓暗渡，实现土地公有制和国有制。

在实行平均地权的革命中，孙中山仍然采取宣传和措施双管齐下的谋略。宣传上鼓吹实行平均地权的实际意义所在，达到攻上为心的目标，使国民在其鼓吹的美丽理想的光环下，欣然接受其思想；措施上就是以大旗为掩饰，大刀阔斧，陈仓暗渡，达到目标。

孙中山宣传“平均地权”是社会主义之政策，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他说“昔吾党宣言有平均地权一层，即为民生主义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即不能实行，”“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手段之一种，及今不行，后将无及。”

孙中山还认为“平均地权”可以防止大资本家的出现，可以防止“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之专制”，可以避免将来再进行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他说“欧美各国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夫煤铁等物质之托拉斯，其小焉者也，若上地之托拉斯，则最大者也。”又说：“英、美京城地价，比未进步时增至五六万倍，设如吾国中人，有地百亩，反值万元，后乃顿增至五六百万元，则已成一大资本家。聚此大资本以垄断高贵之地，则可以制止界之死命，将来必变出资本家与工人划分两级之世界，及今不妨，弊必至此。”“……30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惨剧。”所以要求幸免于欧、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恶例，非讲民生主义不可。要讲民生主义，又非用前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方法不可。

孙中山说实行平均地权，可以很轻易地解决建立国有企业所必须的土地和资金。他说实业发展必将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升，平均地权规定土地原价归地主，土地增价为国家所有。国家办企业需要土地，既能以廉价买到，又能从土地增价中获得资金。这样，国家就变成了一大业主，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平均地权还可以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机会按照国家“使用土地法”领地耕种。孙中山说国家按土地原价收购地主的土地，不可以在有必要或条件成熟的时候，按照国家的“土地使用法”，让那些愿意从事耕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机会领地耕种。

这些想法和认识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同时带进了一个绚烂多姿的理想王国。平均地权后，土地之增价归国家所有，国家将越来越富厚；平均地权，使得国民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皆能享受幸福；平均地权后，使资本家舍弃了土地的投机，而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也因为这一理想的描绘，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是绝大之建设，其功比改革政体更远大也。

那么，究竟该怎么来实现这一理想呢？孙中山采用迂回前进的经济谋

略，他决定首先承认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现状，实现土地国有化的目的。

第一是自报地价，孙中山认为规定的地价是平均地权的前提，但地价不必也不应由政府机关来核定，而应当由“人民自定价值”。如由政府设立“估价局”来评定地价，恐生滋扰；而由地主自行呈报，也不会出现以少报多或以多报少的现象，因为平均地权还有“照价收税”和“照价收买”两条来限制这一点。如地主料想国家将买此地，故意抬高价格，然而假如国家不买，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如果故意压低价格以求少交税，又怕国家收买之，所以有了这两个互相表里，互相制约的措施，上地价不定而自定。

第二是照价收税。孙中山认为以为所推行的“每亩抽捐”是不公平的，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照价收税的价是指原价，不包括土地上的建筑。增筑及其他人工制作物的价值。

第三是照价收买。孙中山在实行土地国有的过程中，考虑到了阶级冲突，提出“平均地权”不是“从实均地”，也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任人民自报地价之后，政府或照价收税，或照价收买收为国有。照价收买收为国有并不是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而是国家须地时，随时都可以照价收买。这样，既可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须的用地和无地少地农民的耕地问题，而且可以防止地主自报地价过低。

第四是涨价归公。孙中山认为土地涨价是社会文明进步所促成，并不是地主的功劳，而是众人的功劳，因此应该归利于社会大众。他说：“核定天下地价之后，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所提出的照原定地价收买，征收地价税和新增之地价收归公有的措施，既合乎马克思、列宁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也是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经济谋略。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地主占有土地，如强行地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分耕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势必引起一场尖锐的阶级矛盾冲突，甚至是一场流血暴力革命。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几点措施，就是极具策略性的。因为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土地的价格会增加百倍乃至五六万倍，土地的原价与新增价之比就微不足道了，原价归地主，新增价归国家，实际上是毫无代价地实现了土地国有制。

孙中山这一谋略可以说是迂回前进，陈仓暗渡，元知元觉地实行了社会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节制私人资本

早在 19 世纪末，孙中山留欧期间，就对社会矛盾重重、贫富悬殊的现实，有了认识，得出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的结论。为了预防这种社会惨剧在中国重演，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之计，即并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孙中山要采取民生主义，目的是要预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产生，使中国人民免受欧美等国人民目前正在经受的痛苦。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极端落后，生产力十分低下，中国现状主要是患贫而不患产均，在中国还不能直接实行马克思主义，而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怎么办？

实现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那么，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实业。发展中国的实业，单靠公营经济是行不通的，相反会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退一步海阔天空，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应该以退为进，先由两种经济形式并存，最后归结为国有制。

养虎不慎反成患，为了避免个人企业的发达导致大资本家的出现，孙中山决定对个人资本采取欲擒欲纵的政策，即他的“节制私人资本”的经济谋略，内容包括一方面对私人资本加以保护和奖励，另一方面又加以预防和限制。

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也是当时现状决定的，因为中国所患在贫，应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力，所以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而中国自从 1966 年上海成立妇昌机器厂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企业迅猛发展，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已有 549 家，总资本金额达 12 亿元；民族资本还渗透到农业方面，辛亥革命前夕已有 171 家农牧垦殖公司，资金有高达 100 万元的。保护和鼓励民办企业，调动私人经济的积极性，有公办不可比拟的优点。例如私办比官办省时省费；私人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暑之不足，继之以夜，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民办之五年可就者。

在充分调动私人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孙中山又主张要防止其流弊，他有挂冠告退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方资本家有垄断之流弊。”防止这一流弊的政策，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但就中国形势而言，民生主义不是学苏俄立即将资本家悉数扫除，而是对将来之资本家加以限制，即“节制私人资本。”

节制私人资本既可以防止大资本家产生，避免出现欧美垄断资本主义的履辙，还可以使分配较为公平，避免大资本归私有而导致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

究竟该怎样来节制私人资本呢？孙中山提了了几种方法：

第一是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孙中山规定，凡企业具有独占性或垄断性质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归国家经营；凡企业规模巨大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如银行、铁道、航路、矿山、森林、水利、大工业、大商业等等都由国家经营；凡企业不宜或不能委诸个人经营者，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凡天然之富源与社会之恩惠，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由国家经营，如煤、铁、水力、矿油等。总之，

凡是能“操纵国民生计”之企业，一律不准私人资本经营。

第二是对某些已由私人资本经营之企业，国家可以根据情况或需要，随时进行“收买”、“赎买”或“法律收回”，归国家经营。这一点不仅能有效防止贫富悬殊现象和托拉斯的产生，而且还可以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

第三是建立合作经济，以缩小私人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孙中山认为地方自治团体之要事是建立合作经济，以避免商家垄断。合作经济主要包括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主要经营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办和保险合作等事，以缩小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避免商家垄断和商家中饱之弊端。

第四是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孙中山提出以累进率直接征税，资本家人息极多，国家应对资本家的收入或财产征收所得税、土地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并且应该是累进率的直接征税，使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这样就可以控制私人资本的规模。

孙中山所提出的节制私人资本（包括一方面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另一方面预防和限制私人资本两点内容），从历史角度而言，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策略上来说，其包含了孙中山一个“以退为进”的经济谋略；总的思路上，他试图先允许私人资本与国营并存，以望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最后全部归结为国有化。他在允许私营资本存在时，就借鉴了日本东京铁路民办二十年后收归国有的经验；而在制定节制私人资本的措施时，就规定了国家可以随时收买、赎买或法律收回私人企业，为最终实行国有制埋下了伏笔。

借鸡生蛋，利用外资

发展实业，少不了资金、人才和市场三要素，特别是资金。而中国经过清政府几百年腐败统治后，又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民穷财竭，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更不用说筹出资金来搞什么建设。没有鸡何以生蛋？孙中山在规划发展国家经济时，深感力不从心。他发现美国独立后，百十年间，从下筭路蓝缕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一富强国，主要是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日本明治维新后，短短四十年，就以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而跻身于列强之林，也是因为借外债来实业。如今欧战之后，西方资本急谋出路，中国何不借鸡生蛋，引入外资，振兴中国的经济？

由此，孙中山提出了他经济谋略中极具特色的一点，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来兴办实业、致富图强。

孙中山系统地阐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非借外债不可。首先是中国贫穷落后，没有兴大实业的资本、人才和方法。需要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和外国方法。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要中国之一切大工业均在萌芽状态，利用欧美的资本和机器，才能在短时期内赶上他们。再次，列强进步日速，一日千里，这种形势逼迫着中国实业速成，而要实业速成，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大力吸收外资。

但是，“借鸡生蛋”在谋略上是借别人的鸡来给自己生蛋，生蛋之后再孵出自己的鸡来。如果在实施这一谋略时，稍有不慎，不但鸡生出来的蛋是别人的，说不定还会让鸡把鸡窝都占掉。

孙中山从埃及不善于利用外资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中得到了启示，为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做了许多原则规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回国途中，对廖仲恺等人的谈话中就指出了借外债必须遵守的三项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三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维护主权的原则，这是决定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之成败的重要环节，甚至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孙中山说：“惟只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第二原则是不用抵押，在1912年，英、美、法、德四国银行提出以财政监督为条件，或以关税、厘金为关押，进行贷款，遭到了孙中山的严正拒绝。

也正是基于主权完整的考虑，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要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下进行，坚决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以免使中央失去统一能力，产生财政紊乱，也避免引起外人无穷之干涉。也正因为这一点，孙中山主张必须注意所引进外资的性质，也就是说万万不可借政治性贷款，只能引进纯商业性质的借款。

孙中山还对引用外资的形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有三种形式：（一）利用外国资金，借款之后，自己进行建设；（二）中外合资经营；（三）外资经营建设。即把企业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家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孙中山认为第三种方式最好，最适合于中国情。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谋略，还包括引进人才，引进管理的思想。孙中山认为振兴实业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而中国缺乏这类人才。引进人才既能负责经济建设之事务，还可以为中国培养这类人对。孙中山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由于西方列强对辛亥革命和临时政府抱敌对态度，使得孙中山的借鸡生蛋、引进外资的经济谋略无法得以实现。但却给了后来者以启示和参考。

重点突破，发达国家资本

“发达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设法在中国实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孙中山主张用发达国家资本的办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一个没有贫富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所提出的“节制资本”的经济策略中，却包含了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两方面内容，并说明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发达国家资本是重点。孙中山这一策略的部署正说明了他的一种“综合全面，又有重点突破”的经济谋略。

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直接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发展实业，这就客观上要求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并举，但发达国家资本是核心，必须重点突破。

孙中山认为，只有发达国家资本，实行国有国营实业，才能使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才能使中国迎头赶上，并驾于美法而上之，成为世界上最富之国。他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许多国家推行了工业统一和国有化，生产力大增，其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而中国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未实行，唯有两步当作一步走，发达国家资本，广泛采用机器，发展国营国有企业，才能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其次，只有大力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抵制国示资本的垄断和掠压，才能发展民族经济，他说手工做出来的上货不如机器做的洋货便宜，而人爱便宜，土货抵不过洋货。中国如不发达国家资本，广泛采用大机器生产，就无法与外国竞争。而利用国家力量，就能开矿，发达实业而成为世界上最富之国。

再次，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取文明之“善果”，而避免其“恶果”。例如，铁道、航运、大工业、大矿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等能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必须由国家资本经营。如由私人经营，难免不重蹈欧美各国的覆辙。

再次，发达国家资本，国家能掌握一些从规模上为私人之力所不及的企业，才能打破私人资本制度，使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将来达到共产的大目的，实现民生主义的上乘阶段。因为只有社会上占大多数企业的国有经营形式，才能有足够力量来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也只有发达国家资本，在实业国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实行“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即孙中山所说的“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归大家共享。”

在对发达国家资本是发展实业的重点有了具体的认识之后，问题就在于怎样来实行重点突破，以重点的前进来带动全面的前进？

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几点意见：

其一是要有统筹全局之计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具体方案和计划。他提出了交通之开发，商港之开避，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水力之发展，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矿业之发展，农业之发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十大纲领，并提出了以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铁路系统、衣食住行印刷工业和矿业为

中心的六大计划。其二，发达国家资本，既要全面综合平衡，又要有重点。他说必须注重发展关键及根本之工业，同时又必须兼顾各方。他认为第一是交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必须有顺序地突破，但又不能偏废。

其中，发达国家资本，不但要自筹资金，自己培养人才，还必须利用外资和外来人才。孙中山发现卑单运用本国的资金和人才来发展实业，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非儿十年不能效，而利用外资和外来人地，就能事半功倍了。

孙中山对发达国家资本意义和具体意见阐述，充分说明了他试图全面发展实业，重点突破国有企业的经济谋略。

用土地来调动农民

列宁于 1913 年所写的论文中批评孙中山没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毛泽东在 50 年代两次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都归为三条，其中第一条便是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满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确实孙中山早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经过数十年革命探索之后，孙中山对劳动农民的认识有了提高，不再是一种同情，而是认识到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作用，认识到要解散生产力，要发运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就必须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由此，孙中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后，提出了他著名的“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济策略。

他说：“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比俄国农奴要厉害得多，中国也应当仿效俄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消除农民所受的经济压迫。

孙中山认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调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参加革命，革命才能彻底的成功。他说，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只有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巩固这个革命基础，革命才能有力量，才可以成功。也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不要每年交田租了，革命才算彻底胜利。

孙中山还认识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高速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他指出，农民生产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机器、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解放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情形作了调查，发现中国农民十个有九个没有自己的田，要为地主耕田，农产品也大部分属地主所有。若是长此一往，谁还情愿去辛辛苦苦地耕田呢？如果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肯定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就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基于这种要调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孙中山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措施。1921 年 1 月，孙中山在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也就是说农民在国家帮助下取得土地所有权。其主要方式是授田和贷田。授田是指国家直接资给无地或少地的佃农以土地；贷田是指把边远地区的土地经过国家初步经营建立农庄后，长期贷给农民，建农庄时所花费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的钱，由农民分年摊还。

授田或贷田给农民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可是国家给农民的土地又从哪儿来呢？孙中山作了五种设想：由国家“照价收买”的土地；公有或私有未经开垦的“荒地”；新填筑的土地；对地主抽重税，如他们不纳税，便可以把他们的田地拿来充分；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

孙中山不主张直接采取第五条设想，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力量悬殊，如果那样的话，地主们起来反抗，农民抵抗不住。而是主张宣

传农民、组织农民和武装农民，使农民成为中国第一等主人翁之后，就能够讲很有力的话了。

孙中山这一主张实质上还是仿效俄国，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使“耕者有其田”，只是不马上实行，等待时机而已。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孙中山高瞻远瞩，意识到了农民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势必导致土地所有权过份分散的现象，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土地所有权分散现象，不但造成农业生产成本的高昂，还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大面积耕作的要求。孙中山就此提出了拟建农民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来克服土地所有权分散的缺陷。

总之，孙中山这一系列思想和举措，都是试图实现其“使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的经济谋略。他这一谋略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认识得较晚，未能付诸实现，却给了后来者以启示。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孙中山极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只有七八元，不及发达国家的 1%，穷的至少有 3 万万，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也因为贫穷，国势积弱不振，久受列强欺凌和宰割。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积贫积弱的境地呢？孙中山认为要解救中华民族，必须抓根本问题，而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患贫”，只有人民富裕起来，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繁荣富强。要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为此，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他“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经济谋略。

他这一经济谋略内涵是说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机器工业和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早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孙中山这一谋略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就有所探索，甲午战争前夕，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洋务运动时期，以铁甲强国的洋务热潮喧嚣一时，孙中山独具慧眼，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并指出了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强调发展实业乃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

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在归国途中从巴称发电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孙中山一历史性的选择，充分表现了他强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他认识了推翻封建帝制仅仅只是一种“革命之破坏”，随之而来的课题必然是“革命之建设”。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政治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当务之急在于发展经济了，以解决民生问题。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在临时政府特别设立了实业部，并命令各省设立实业司，以发展农、工、商、矿等各行各业。并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例如 2 月命令实业部指令各省都督保存已成之实业，筹划新的实业；3 月，命令财政部拟订“商业银行条例”，鼓励私人开办银行；命令实业部拟订“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临时政府一体保护；又命令内务部制定“禁止买卖人口暂行条例”，废除人口买卖契约和主奴之分，唯许有雇佣关系；还命令财政部拨款 30 万，让黄兴等人筹建拓殖会，规划开发大西北。在他短短 3 个月的任期内，共发布了 30 多件有关发展实业、繁荣经济的命令。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亲手创建了中华铁路总公司，为在中国修建 20 万里铁路而奋斗。他还兼任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长等职务，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国家实业的事业中去。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试图在理论上以“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谋略影响和武装国民。他指派了廖仲恺、朱执信等人组织建设社，创办《建设》杂志，并亲自撰写发刊词，大力宣传建设思想，阐发建设原理。

不仅如此，为了让民众对国民经济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把握住经济建设中全局与重点的关系，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实地堪察，积

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孙中山，深思熟虑，在《建设》杂志上分期发表了一部中国经济建设专著——《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实业建设》）。

《实业计划》包括六大部分，归结起来，包括修筑 20 万里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北、东南和高原等五大系统，组成一个统系全国的铁路运输体系；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分别修建三个类似纽约的世界级海港，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及十五个渔业港，初步形成一个渔业、海运体系；围绕三大海港和五大铁路系统，治理黄河水系，改良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开凿、疏浚运河，形成内河航运体系；修建遍布全国城乡的公路运输体系；平衡全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分布之巨大不均；以移民新疆，内蒙进行农牧业开发和建设；开采煤、铁、铜、石油及各种特种矿藏；建立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包括钢铁冶炼、机械制造、造船工业及车辆制造工业，及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食品工业、服装工业、建筑行业、印刷业等；同时要特别重视农业机器的制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

《实业计划》一书不但强调了“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还宏观地展示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与重点。孙中山认为，一方面，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各部门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发展实业，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衍待举而不能偏废。另一方面，既要万端齐发，全面发展，又要抓住根本，抓住基础，突破重点。孙中山认为交通是第一重点，尤其是铁路，甚至把修筑铁路看成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除铁路外，孙中山把农业、矿业、钢铁和制造业列为重点部门。他认为农矿是其他种种实业之母，钢铁是一切实业之体质，只有农矿和钢铁发达后，其他实业才能发达。孙中山这种对全局和重点的有机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孙中山的发展实业的谋略中，还包括了对社会生产两在部落的划分。以第一部类即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发展。来促进第二部类即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物的制造业。他这一理论的阐述虽不及马克思主义明白详尽，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孙中山还主张利用外国资金、人才、技术来发展实业，他认为国内现有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无法满足全面发展实业的需要，而欧美这些方面恰恰有剩，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来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发展国内实业，是可取的。

总之，一切措施，一切方法归根到底都只为一个思想服务，用根本方法解决根本问题，即发展实业，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成为一个富强之国。

孙中山这一“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的经济谋略，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影响，临时政府成立了，全面掀起了举办实业的高潮。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而使其谋略未能得到全面实现。却留给了后人许多借鉴的经验。

让铁路四通八达

中国中医治病，特别是针灸术治病，总是先扎通血路，使病人全身的气脉皆通，然后再施药治病，往往能妙手回春。孙中山试图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一个实业发达的世界性强国，也采用了这一“打通气脉”的策略，首先致力于修筑铁路的事业，企图在中国让铁路四通八达，凭借着铁路把中国建成一个全球最富最强之国。

孙中山对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对铁路的重视，同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论点是相吻合的。马克思曾说过：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铁道乃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列宁也把铁道看成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是煤炭与钢铁工业的总结。

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大大缩小产地和销地的空间距离，能够为扩大国内市场和开拓国外市场提供条件；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缩短流通过程，从而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加速资本周转；交通工具的进步，可以刺激人口的集中以及城市的形成和扩大，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甚至认为商品的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是追加的生产过程。由此可见交通的重要性了，而交通尤以交通之母铁路为最重要。

孙中山也许并没有从理论高度去这样认识铁路的重要性，但他还是“为天下先”地认识到了铁路的客观实际作用，他认为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铁路对于经济发展，经济交流起着重大作用。铁路等交通工具的建设，是实业之利器，没有这一利器，则虽全国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他说：“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认为，美国全境有120万里铁路，所以成为全球最富之国；而我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经济反而落后，主要原因是铁路不兴。孙中山还认为，铁路交通，对于国家的国防、政治有重大作用。因此，他认为修筑铁路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一辈子致力于铁路的建设。早在《上李鸿章书》里就提及“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建议李鸿章促使清政府招商兴路。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亲手创建了中华铁路总公司。并亲兼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同时他还致力于宣传，辞职后数月间，他或公开演讲，或挥毫撰文，或对人谈话，反复阐述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1917—1919年间，孙中山呕心沥血，全力赴地考察，亲手制订了规模宏伟而又十分具体的《实业计划》。《计划》仍坚持了铁路是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的观点，《实业计划》所涵的六大计划之首，就是要把铁路修到中国西北极端。“计划”中他提出了十年之内建筑21万里铁路，计划以中央铁路系统为主，再配以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共拟建107条铁路，把全国沟通联接起来，形成一个遍布祖国大地、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为使铁路运输配套，孙中山在计划中提出相应建立机车制造厂、修造厂以及客货车制造厂。

此后，孙中山还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设想：美国铁路为世界至

多，而其富强亦为世界第一。若以人数较之，则我国应多于美国四倍，如是吾国之铁路应有 480 万里。就这样，孙中山为中国描绘了一个铁路总长度为世界第一的蓝图。

孙中山企图“让铁路四通八达，来带动实业发展”的经济谋略，虽未得到实现。但他对交通运输事业，尤其是对铁路的重视，无疑是正确的，是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论点相吻合的，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无参考价值。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便是交通运输能力无法满足工、农、商、建筑等各行各业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确定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为今后二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如今，北疆铁路的建设，通过阿拉山口，形成了第二座欧亚大陆桥，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交流，使人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在六大计划之首，提出要把铁路修到“中国西北极端”的远见性。

不能爬着追，要赶欧超美

中国落后了，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若干年，怎么办？不赶上，就仍然要遭受到列强的宰割和掠夺，要赶上，又怎么个赶法？照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去赶，永远是落后的。打个比喻，到下世纪中叶，我们把西方先进国家本世纪末的水平作为赶的目标，即使那时我们达到了，可人家又发展了，相比之下，我们仍然落后了。显然，用这种“爬行着赶”或“等距离赶”的方法，永远只能戴一顶“落后”的帽子。怎么办？

在本世纪 20 年代，关于选择近代国民经济近代化道路的问题，孙中山以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为民族图富强的远大理想，作了非凡的选择，提出了“不能爬着追，要赶欧超美”的经济谋略。其内涵包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两个方面，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迎头赶上，奋起直追，以求驾而上之。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迎头赶”是一个与“爬行着赶”相对立的概念，仍然采用前面所述的那个比如，“迎头赶”是指把眼光放在未来，准确地预测到西方先进国家在下世纪中叶，经济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并以此作为我们追赶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跻身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总之，孙中山这一谋略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赶超。

孙中山就这一谋略作了具体的阐述。首先，中国一定要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日本和暹罗这些小国本来都比中国落后，但由于它们顺应世界大势，引进开放，结果超越了我们，不但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也得到了独立。中国也要走这样的路，否则就会亡国灭种。

至于这条路该怎样来走，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几种看法：一是按照资本主义各国发展近代经济的旧路径走，固然可以，却无异于现代人到美洲仍沿着当年哥伦布探险所航行的海路走一样，绕了许多不应绕的圈子，却事倍功半。他说：“此之旧路径，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程，考其当时之海程，由欧洲起，向西南方，经加拿利岛至巴哈马群岛之圣沙路华打，路程极远，与现行之航线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于前时数倍者，不可曰日而语焉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径，是一未辟之路径，即不啻哥伦布初往美国之路径，犹人行黑暗之景状。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此所以吾等从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预知其彼岸为美洲而非印度矣，经济界之趋势，亦如是矣也。”这一段话里，表明了孙中山在经济和科技上要迎头赶上的原理和决心。他认为西方发展近代工业如哥伦布之发现美洲，走了不少弯路，受了很多阻碍，而我国发展近代工业，如后人之至美洲，可以直捷而去，少走弯路。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二三百年来，但如果我们有赶超的勇气，几十年内就可以学到其精华。

孙中山还注意到了中国赶欧超美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他认为众多的人力资源是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物质力量。他说：“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也。”

为了赶欧超美，孙中山拟定了一个深谋远虑、雄心勃勃的大计划——《实业计划》，其目标之远大规模之宏伟、设计之周详均属空前，是一个从实业上迎头赶上，赶欧超美的计划。孙中山在计划中信心百倍地预言：“十年之

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路进！”

由于历史的局限，孙中山赶欧超美的理想在当时未能得以实现，但他“赶超”的思想却是留给后代的一份重要遗产，体现了其思想的超前性和伟大进步性，鼓励着中国几代人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也给了后来人以借鉴的经验。

开发大西北为经济发展的基地

大西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占中国领土的很大比例，发展大西北，不但可以平衡全国土地、人口，合理利用全国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资源，从而达到全中国共同开发的目的，还能将开发大西北与军事、移民结合起来，防止帝国主义蚕食我国领土。不只是如此，孙中山从经济角度着眼，认识到发展西北经济不但具有广泛的前途，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全面振兴发展的基础。因为这一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作为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大西北建设成粮食、肉类、石油、皮毛工业之基地，把西藏建设为未来的矿藏基地，来服务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由于大西北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的特定状况，孙中山注意到了开发大西北，应该有主次之分，应该有重点有步骤。

第一，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最重要的是建设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西北正是由于“交通运输机关缺乏之故，丰富地域，委为荒壤”，所以建筑铁路为最要之图，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需要之铁路。孙中山设计着修起北方大港，然后以西北铁路把北方大港与西北各地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而言，西北的肥沃土地、丰富资源就能得到开发，对全国经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铁路把欧亚“两大陆于以连为一气”，“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来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络……综观现在铁路，于世界位置上，无较此重要者。”

因此，孙中山提议先在西北铺设七千英里铁路作为基础，然后再逐步增加。他在“扩张西北铁路系统”中，又增建十八条铁路；于《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之第一部中央铁路系统的一部分，共效用所及之地区包括蒙古，新疆之一部；第四计划之第五部高原铁路系统中，除四川、云南外，其他地区的铁路皆为大西北铁路之一部分。

在铁路建设的计划中，孙中山注意到了铁路建设的主次、轻重之分。他认为第一计划之“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重点，西北铁路系统完成后，沿途地区经济逐步发展之后，再修筑西北的其他铁路。

第二，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只是手段与条件，有了条件，没有人是不会发展的。所以他提出建设西北的第二步——移民。也就是从经济角度着眼，在一个国家之内，进行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孙中山的移民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人满之患的东南地区的“废弃之人力”，移殖到地旷人疏的大西北去，把劳动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仿效北美合众国、加拿大、澳洲及阿尔丝丁等国所行之结果；二是准备在革命之后，把数百万的军队裁兵时，移屯西北。

孙中山设想在大西北采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农业方式，以大机器来进行农牧生产。孙中山这一思路既解决了人口问题和防边问题，还致力于大西北的开发，以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

第三，在移民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第三步骤是开发大西北的粮食生产（特别是肉类），毛纺工业和矿业。

孙中山认为发展大西北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到西北地广人稀，草原广阔的条件，因而可以建成全国的粮食基地，特别是肉类工业基地。他认为蒙古、新疆与甘肃一部分领域，面积约170万英方里，在于阿根廷共和国60万英方

里，阿根廷为供给世界肉类之最大出产地，如果西北一带铁路运输能得到改善，广阔的草原能够全面地进行科学管理和综合利用，就能取阿根廷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地。

在建立肉类基地的同时，还要建立皮毛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因为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每年廉价输出很多羊毛，而又高价进口皮毛成品，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开发大西北就是要消灭这种侵略，要利权自握。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资料，认为西北主要是有油矿，主张大力开发，形成一个矿业基地。一是摆脱花费很大财力年年进口煤油汽油的局面，二是为将来工业发达，汽车业发达提供能源。

第四，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必须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他说黄河几千年来威胁着数百万生灵的生命和财产，非以一劳永逸之策进行治理不可。他强调了治理黄河既治本又治标，治本在于植被，治标在于筑堤修坝。还要把防患与利用结合起来，变害为利，造福人类。

为了发展大西北，孙中山除了为大西北制定了计划，规划了步骤外，还为之设立了各种政治经济措施。

其一，用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为了杜绝土地投机商参与西北土地投机，决定采用国家收买，建成农庄，然后贷诸移民的方式。

其二，设立特别国家机关，统一安排移民事宜，特别国家机关在移民初期，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到一定时候，成为资本主义地方自治性质的机关，移民拥有自治权利，“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也就是办资本主义企业和农场。特别国家机关，管辖自治移民的企业和农场。

其三，在西北设立金融机关，建立兴农银行。当时中国的金融机关基本于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创设民族金融机关以资济大西北的经济开发大业，是极为可取的。

其四，拨助专款建立西北开发之科研和实业公司。1912年，黄兴等人筹办了“拓殖协会”，孙中山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30万元巨额经费资助黄兴等人，表现了他开发大西北的宏伟心愿。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孙中山“开发大西北为中国全面经济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未能得到实现，却给了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许多启示。

机器产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极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民穷财尽，所患在贫的现状，提出发展生产是近世经济上的头一件事，而且要高速度地发展，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主张中国实行“第一工业革命”，易手工而用机器。他这一主张形成了他经济发展建设上“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的谋略。

他认为大机器生产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标志，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用机器来做工，就是一个很懒惰的和很寻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产力也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总之，自从大机器时代来到之后，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至今尚用手工为生产，还处于小生产社会，还未能进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中国要摆脱贫和落后的状况，就要立即废除手工劳动，而采用大机器生产。

孙中山认为采用机器生产不但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还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物质技术手段。他在《实业计划》中说：“世人尝以中国为生活最廉之国，其错误因为寻常见解以金钱之价值，衡量百物；若以工作之价值衡量生活费用，则中国为工人生活最贵之国。中国一寻常劳工，每日须工作十四——十六小时，仅能维持其生活，……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货品，虽在寻常丰年，亦仅足敷四万万人之用，若值荒年则多数将陷入穷乏死亡。中国平民所以有此悲惨境遇者，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

这段话不但体现了孙中山认为机器生产是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和条件，还体现了他那种“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机器生产，才能做到“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他尤其强调农业上采用机器的必要性。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如果农业中不使用大机器，不讲求“农器”，而依靠中国传统的“牛马之劳”，是无法根本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局面，也就无法解决实现“民生”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科学技术补人工之不足。而农业的机械化，就能带动其他行业的机械化。

每次大战之后，总会有大量过时或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转到民用上来，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和促进战争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时，孙中山就从战时看到了战后，预先设想，要利用时机，把大战结束之后的闲置下来的“宏大规模之机器”，接转来为民用服务。他还注意到了机器在轻重工业的协调搭配，在他的实业计划之中，不只是有着对钢铁冶炼、采矿、机械制造、造船以及车辆制造的注重，对粮油工业、纺织工业、日用工业、印刷业、建筑业等等，也有纲要式的设想。

孙中山在用机器生产武装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还主张机械化和国有化并举。因为机器生产是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如以机器去适应中国传统的那种私人小经济、小生产，根本就不可能发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因此，他强调中国不但必须赶快实行“废手工采机器”的“第一工业革命”，同时还必

须实行“工业国有”的“第二工业革命”，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富强，人民生活才有可能改善。由此，孙中山不仅主张要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收归国家经营，还主张把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由国家经营。

孙中山这种“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并未能在当时得到实现，但他从《上李鸿章书》开始，到谋求实业救中国的过程中，对机器的重视，特别是他灵活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搭配的思路，与国有化和机械化并举的思想，却留经后人许多借鉴的经验。

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

怎样确定财政的来源和怎样支出财政，是国家经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方面，孙中山有自己的整套的策略。他说：“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什么是“合于理财学理”？他认为理财学理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为人民“谋有生之乐”。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所鼓动、宣传的某些思想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就职时所实施的某些政策，就充分显示了他于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经济谋略。

这一谋略首先体现在统一财政的思想，他认为财政的统一是加强国家政权统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和物质保证，更是“谋有生之乐”的前提和基础。财政统一的内容包括税制统一、税收机关的统一、关税自主等等，由此，孙中山提出了“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举措，改良一切与财政有关的组织和制度。孙中山认为人民生活之所以穷，经济之所以落后，财政之所以困乏，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组织”不良引起的。所以必须改革清政府那一套管理制度，消除其苛剥、臃肿的陋习，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组织”，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

他认为封建制度的财政是分散的、不统一的，地方与中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是庞大的封建统治机构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农业上的赋税特别多，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因此主张建立新的财政制度，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人民过了好的生活。

在统一财政的思想，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关重强调了盐政统一和发行公债的统一。他认为盐政关系到国计民生，1912年1月上任伊始，就发布了《统一盐政事权统一令》，命令实业部长张春兼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管辖江苏省松、太地区和淮南、淮北盐厂，以及行销淮盐的湘、鄂、皖、赣及苏五域的运销和人事等事务。为了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乏，孙中山批令发行公债，就强调公债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由国家成立专门机关，办理国家公债。

其二，孙中山关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设想，也是他在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经济谋略的表现。

按他的设想，财政收入主要为单一地价税，用地价税收入代替各种赋税。后来，他又把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对一些国家重要资源征收资源税、关税也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地价税是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思想时所倡导的主要方法，其内容是让地主自行将现有地价报给国家。国家根据地价课税，并规定土地的新涨价归国家所有：他认为“平均地权”之后，国家就可剔除清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因为只靠实行地价税就可充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提出了征收“税契”的观点，就是通过承认土地个人所有，在换取新地契的过程中，对地契进行征税。正如他所说：“中国近来患贫极了”，因此“补救之法，不但收地价税，尚当收印契税。”他于1912年10月2日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民国成立，前清土地契约，当然作废，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各县，令民间更形易新契，并令其于易契时，报明该地现时值价若

干，一一登计，收什之一税。”他这一观点与起初的地价单一税是互相矛盾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后来，孙中山的财政收入思想又纳入了国有企业的收入。他认为随着地价税的征收，国家就有财力来振兴实业，随着实业的发展，实业收入就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为了保护本国工农业发展，孙中山提出征收高额关税，并将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非常时期，临时政府财政很是困难，特别排在财政支出最后军费，更是紧迫。孙中山提出了几条非常措施来扩充财政，例如没收清政府官产和反动官僚的浮财、发行军事用票、借用外债等等无可奈何的方法。

财政的支出主要包括军费，国家行政开支人民福利事业的支出以及国家对地方生产的财政补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福利事业的支出。

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在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作了这方面的著名演说，其内容具体说来有几点：其一，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为支出的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地方国营生产的补助支出；其二，养老、育幼、教育、济贫、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电费 etc 生活费用的支出；其四，国家行政费用的支出。

从其财政支出来看，孙中山对人民福利事业方面最为关心，即使致力建设实业的目的也是如此。他的整个财政思想，特别是关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都贯穿了他那“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谋略，对后人很有启示。

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

马克思说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因此，谈近现代经济不谈人口问题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有着浓厚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色彩的孙中山，在他纷繁庞大的经济思想中，对中国人口问题十分关注，他忧虑着中国“人满为患”和“人口减少”，认识到了人口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一种“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经济谋略。

孙中山毕业奋斗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几万万同胞有饭吃有衣穿，以便立国。正如他所说：“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也正因为担心着几亿人的衣食，就不能不关心与此关系密切的人口问题。

孙中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道先是认为“人满为患”，指出了人口繁殖太快及其将出现的严重后果。他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人口论者，如商鞅、韩非、苏轼、马端临、汪士铎、薛福成等人的“患多”思想的继承，而且主要是对清代人口急增的严酷现实所进行的思索。

明清以来，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中国人口猛增提供了条件。康、雍时期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两项新赋政，刺激乾隆以后人口的猛增，从1741年到1840年，99年间，人口从14,341万增至为41,282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0.74%。1840年后，由于战乱，人口下降1873年，人口为27,713万，此后人口上长幅度更大了，到1897年，又达到42,100万，21年之间，净增人口14,387万。

人口猛增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人地对比关系紧张，人口突破4亿之后，全国人均耕地由18世纪的8亩左右下降到不足2亩，远远低于了18世纪末洪亮吉所估计的人均4亩的“饥寒界线”，人均耕地的减少，导致了粮价的直线上升，每公石粮价由雍正时千钱以下上涨到道光时期的三千、四千；人多地少，米价腾贵，使得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乱不已。

人口繁殖过快及其严重后果，促使孙中山苦苦思索，他认为唯有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增加食物，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他“以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经济谋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了。”这段振聋发聩的话说明了他异于其他人口论者的关于解决人口问题的观点，而提出了兴农政的策略。

洪亮吉对人口增多表示出无奈的悲观；江士铎提出了“以刀兵消息之”的残酷办法；薛福成和陈炽主张发展大机器工业，扩大就业，使穷民有衣食之源，却又很不现实地寄希望于在中国尚未大量出现的资本家；在欧洲流行一时的马尔萨斯更是提出以战争和瘟疫来削减人口……唯独孙中山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他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以中国现有的土地，就能养活更多的人。

孙中山就如何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三种办法。

其一，充分开发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人满”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搭配对比而言的相对过剩。为什么是相对的呢？因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劳动生产

力越高，能养活的人口越多；相反则越少，他就中国与法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对比，认识到中国农业主要是技术落后。技术落后使得人和地两个因素的潜力得不到挖掘。就此，孙中山提出了“地尽其利，人尽其力”的想法和两个主张：（1）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中国当时共有荒地 11.77 亿亩，如开垦出来，肯定能解决很大的问题。（2）提高单产，扩大生产门路。他提出了机械、肥料、种子、除害、水利、运输、防灾等一整套农政方针。孙中山认为只有这样，就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田。

其二，大力发展经济，使劳动力充分就业。孙中山认为消费人口相对于生产人口太多，使负担过高，也是“人满为患”的原因。如果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就业机会之间能相适应，人口问题会相对减弱很多。所以，孙中山着眼于大力兴办各种“生利”的事业，来解决患贫和人口问题，正如他所说：“中国若兴农、矿、制造，则十年之间，可以白养其民也。”

其三，移民垦荒。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口在地域分布极不平稳，畸形集中在东南地区，而西北很是荒芜。所以，为了缓和内地人口压力和就业困难，开发边疆无穷之富源，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他主张从“民族生聚之东南”移民到“凋零之西北”。在他的《实业计划》之中，计划以组建大规模国营农场的方式，从长江及沿海人的充盈之地，向东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移民，将应裁之兵数百万移往西北。孙中山的这一计划如果得到了实现，不但缓解人口问题，还可以使西北经济发展起来，达到国民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平衡。

尽管有一段时期，孙中山就信了外国人说“中国人口正在锐减”的断言，忧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其主流仍然是“人满为患”的忧虑。这一点，特别是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的谋略，至今在人口众多的我国仍值得借鉴。

孙中山军事谋略

利用时机，在敌薄弱地带起事

成大事，必不能少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必要的客观条件。孙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致力于通过革命战争打出一个民主共和新国家的伟大事业，以致使他的大半生传记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武装后清的斗争。他前后亲自领导了10次反清起义，都符合着他利用有利时机，避实击虚，这样薄弱地带起事的策略方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王朝，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勾结帝国主义，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为条件来维护其腐败、落后、专制、残暴的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一次次的失败，认识到了在清王朝统治下是丝毫看不到通过自行改革，重新振作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了，不再为任何改革的迷雾所欺骗迷惑，只有坚持以暴力为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但是，不管清王朝的没落和灭亡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可相对于力量薄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仍然是如此地强大而无法在短期内战胜。

孙中山在摸索革命道路时，不是简单地模仿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在首都和重要城市发动起义的方式，而是选择敌对力量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11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孙中山的指示和领导下，其他各地区的起义也蜂起云涌。起义的高潮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尤以1907—1908年次数最多；起义发动的地点也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一是两广云南地区，主要由同盟会组织管理；一是江西湖南交界处，即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当地矿工掀起的自发起义，同盟会总部派人参与领导；一是安徽安庆，是光复会系统所组织管理，其中1907年徐锡麟所领导的安庆起义是与绍兴的秋瑾起义相配合的；另一个就是四川了，这一区域的起义主要是四川的同盟会志士奉孙中山的指示发动的。这四个区域最主要又是在广东，达9次之多。

早在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考虑到运用北部湾临海处接济外来军火的方便，和边境地区清政力量相对薄弱，起义容易成功的可能性酝酿出一个在滇越边境发动起义的计划。孙中山计划在广东的东西两端地区即潮、惠、钦、廉同时起义，夺取全省，进入广西，以窥南宁，然后以粤、桂、滇为依托，北出长江以定中原。这个计划首要的一条是夺取两广，但从军火接济、进退有回旋之余地，易于聚集人员等各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必须选择临近越南和北部湾的钦、廉两地。

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要在滇越边境举事，能寻求到法国政府的同情和援助是最好不过的了。早在1902年底，孙中山就与法国频频接触，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没能得到任何承诺。孙中山仍没放弃他的边境起义计划，而是进一步努力地在南洋一带包括印度支那半岛上开辟革命活动基地。为日后的起义创造条件。

1905年10月，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孙中山从横滨前往越南筹募革命经费。船至吴淞口时，法国情报军官布加卑自称奉本国陆军大臣三命前来求见。两人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密谈，布加卑表达了他个人对孙中山的钦佩，

也暗示了法国政府有可能对此表示关切。孙中山也正寻求与法国有关方面的私下合作，以促成滇越边境起义的成功，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但由于有法国武官参加的在圣公会的日知会举行的会议上，有清方的人混入了会场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告密，引起了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引来了麻烦和法国政府的封锁，使得与越南接壤的云南边疆发动起义的可能性受挫。孙中山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广东的廉州和钦州以及广西的上思州。但 1906 年 6 月，在新加坡与三合会首领，潮州富商许雪秋的相识，使他的计划扩大到了接近福建的广东潮州府和接近江西的广东惠州府。各地会党紧急联络行动，筹划起义。

1907 年初，许雪秋电告孙中山潮州已准备就绪，孙中山复电要求与惠、钦、廉同时行动。3 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到达越南，在河内设立边疆起义指挥中心。孙中山亲自坐镇河内，命胡汉民前往香港，协助冯自由指挥潮惠起义；召黄兴离日来越，要黄兴亲自前往钦州廉州，策动清军郭人漳部，并任命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协助黄兴行动。4 月，孙中山命令惠州地区会党道领邓子瑜在惠州归善、博罗等地置军事。

潮惠钦廉约同一起举事，但由于潮州黄冈于 1907 年 5 月突然举事而被打破，使得 1907 年的起义变成了一连串孤立、分散的起义，不能相互呼应。1907 年 6 月由邓子瑜、陈纯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由黄兴、王和顺组织的钦州防城起义；12 月由黄明堂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包括黄冈起义在内，全都失败了。

1907 年四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本人也被法国印度支那当局驱逐出境。但他仍坚持着他的边境起义计划。1908 年 3 月，孙中山离开河内前，再一次发动了钦廉地区和滇越边境起义。他命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以黄兴为战地总司令发动起义，并云南河口作为偏师，以资策应。

1908 年 3 月，黄兴在越南边界宣布起义，率军进攻钦州。4 月在粤桂边界的马笃山以少胜多，击败清军郭人漳部，起义军队伍倍增。4 月 30 日，在黄明堂、关仁甫的领导下，发动了河口起义，以策应黄兴的起义。起义当天就占领了河口，宣布成立去贵都督府，不久又分兵攻占了新街、万河、南溪等地。5 月 6 日，黄兴取道越南海防途径河内前往河口，指挥作战。但由于义军中的清军降卒及会党游勇不听号令，致使义军进军个旧和蒙包的计划失败。不但无法策应钦廉上思的起义，还使自己成了孤军，在清军的接连反扑下失败了。而钦廉上思的起义也由于弹尽粮绝，没有后援于 5 月下旬相继失败。

孙中山所领导的六次边境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进一步地扩大了。1907 年 11 月至 1908 年 1 月间，四川先后发动了泸州、成都、叙府三地的反清起义。

1907 年 7 月，安庆和绍兴发动了由徐锡麟和秋瑾领导的起义；1908 年 11 月，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了安庆新军起义等等。总之，从 1906 年 12 月至 1908 年 12 月两年之间，在中国中部的湘赣边界，在东南部的安徽省，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南部的两广云南省，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处接一处，起义的风潮此起彼伏，前仆后继，不仅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对清末政情和政局的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孙中山所领导的边境起义，着重选择两广地带，当然一定着眼于边境地带敌对力量相对的薄弱，二就是由于起义力量主要来源于南洋一带，所以必

须濒临海和陆上边界。他这种避实击虚，选择山高皇帝远的薄弱地带作为举事地点和策略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战术有着深刻影响。

孙中山在发动起义时，不但对地点的选择有所考虑，还对起义的时间选择也很是斟酌。清王朝的残暴和腐败，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群众自发斗争日益高涨，客观上为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许多有利时机。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不少文章和函电中都曾揭示了中国劳动群众因无法忍受清政府压迫而奋起反护的革命形势，并指出革命党应该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来完成自己的大业。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就是典型一例。

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浏阳、醴陵处于湘赣交界地区，历史是两省哥老会聚会谋事的地方。1905年，其首领马福益被清政府杀害后，会众一直在图谋着他报仇，倾向于革命。而1906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地区陷于饥馑状态。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委派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回国作起义准备。很快就组织了以洪江会、洪福会和哥老会为基础的起义军，并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安源煤矿工人的支持。12月4日起义爆发，不数日，迅速发展到了三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威震长江流域各省，给了清政府很大打击。

1910年10月，在南洋槟榔屿的孙中山得知广东连州抗钉门牌而聚众捣毁总捐、屠捐各公司，并焚毁了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很是高兴，认为又是革命有利时机来到了，他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进图大举。”

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长沙抢米风潮以及波及全国的收回利权斗争，把革命情绪和革命声势推向了颠峰。

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抓住了有利时机，于1912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暗杀，攻敌之心

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时期，有另一项与反清武装起义相辅而行的暴力行动——暗杀。暗杀在辛亥革命时期曾风行一时，不少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都认为暗杀满清权要是配合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曾对暗杀的可行性有过评议。孙中山说：“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它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也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孙中山这番话说明了他看待暗杀的态度，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一是衡量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损害之程度，以利于革命，不妨害它种运动为前提；其二是考虑所支出的代价值不值得，其三是必须以不损害和动摇根本计划为原则。孙中山对暗杀的态度可以说进一步促进暗杀行动的增加，特别是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黄兴也决意行暗杀主义时，胡汉民也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辛亥革命领导人所持的态度使得党人的暗杀行动屡见不鲜，从1904年到武昌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共有8次著名的暗杀行动。1904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未遂，万被捕入狱；1905年王汉枪击铁良于河南彰德，未遂，王投井而死；1905年吴木樾炸出洋五大臣于北京前门车部，未遂，吴当场殉难；1907年刘思复炸水师提督李准，未遂，刘自伤；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谋炸摄政王载沣于北京，未遂，汪被捕入狱；1911年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事成，温遭捕杀；1911年8月13日，陈敬岳、林冠慈以炸弹击李准于广州双门底，未遂；1911年10月25日，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

万福华在戊戌政变后开始倾向革命，1904年拟谋刺杀户部侍郎铁良未果，不久与刘光汉谋刺企图出卖广西权益的前巡抚王之春。他邀王于英租界金谷香西菜馆共进晚餐，王一出现，万举枪射击，但因不会射击手枪，事不成反被逮捕。

王汉曾与刘静庵策划长沙起义，事泄不成。便谋刺反对革命的满族大员铁良，王白清任务，先计划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行动，而铁良的火车开往了河南彰德，王尾随而去，在彰德行刺，不中，担心被识破，于所住客店投井而死。年仅22岁，结婚才过一个月，客店老板义葬之。

吴樾目标起初是铁良，欲竟王汉未成之志，后听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买了一套官差衣锦，乔装跟随，但因口音不似北语，而被阻上车。他混上车后，炸弹暗藏于袍内，因机头和车身碰合致使他的撞针式炸弹自行爆炸，吴当即被炸死，对方有一亲属被炸死，五大臣中，载泽和绍英被炸伤，徐世昌衣袍被炸破。送行大臣中，伍廷芳两耳震伤。事变后，清廷大震，徐世昌、绍英因此不再出洋，由尚其享和李盛铎代行。

刘思复1907年参加潮惠起义和策划，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不准为革命公敌，非去一不可。刘约人在水师行台处谋刺李准，而那早上李早已路过，而刘思复炸伤了自己，被捕判刑二年。

汪精卫与黄复生决定炸摄政王载沣，择定会刹海旁之甘冰桥为爆炸地点，行动时被一个导购找几次不归的老婆的人撞着，报答而未成。

温生才在1911年4月，预伏在广州将军孚琦前往燕塘观看冯如试飞机的

要路上，孚琦回来时，温抢眇到轿前，迎面放枪，击死了孚琦，温被捕就义。

陈敬岳、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和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的事件，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革命者产生了严重的急躁冒险情绪所引起的。

当然这些暗杀行动并非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打击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而作的一种努力，加王汉枪击铁良，是在亡国之痛的刺激下产生的，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是为了抗议清吏出卖国家主权，引狼入室等等，这些暗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敬岳和李沛基的事件之后，“清大臣与各省疆吏，人人自危，不止张鸣岐、李准胆落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暗杀活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历史观和阶级局限有关，他既是暗杀者崇高的牺牲精神的表现，也是一些人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了急躁悲观情绪的反应。暗杀活动本质上是个人恐怖活动，虽无法实现目标，可造成一定的影响。虽不能推倒清政府，但在一定程度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条件的制约下，孙中山把暗杀当作革命的辅助手段，因时、因事、因人而言，是应该肯定那一部分应该肯定的东西。孙中山这一策略也确实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起义。

建设革命根据地

孙中山在确立了实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就面临着武装斗争走什么道路的战略问题了。

孙中山的武装斗争生涯，是从宣传鼓动和筹饷开始的，他起初认为只要有了“愿意干”的人和钱买枪支弹药，便可以进行遥控起义，他把指挥部设在海外和香港，对国内的武装起义进行临近指挥。但由于清政府与孙中山留居国家和地区交涉，弄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驱逐孙中山，使他在临近中国的地方，如日本、越南、南洋各地均无法立足。孙中山认识到国内无根据地，便无法组织训练部队，无法取得军械弹药等后勤保障，更无法宣传和组织群众。

1895年，孙中山以香港为活动基地，筹划发动广州起义时，就制定了“袭取广州以为根据”的计划，并有了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

1897年至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讨论研究中国军事斗争的战略时，提出了武装斗争总的战略方针。他说：“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给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孙中山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割据”，并认识到了割据必须是武装的，要不然就会“地方豪杰互争雄长，巨数十年不能统一”的局面。他还意识到了割据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只有先“割据”，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势力，“张势威于四方”，才能最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

孙中山选择南方的粤桂滇三省作为根据地，三省之中又“以广东为最善”。选择南方三省特别是广东作为根据地是有他的战略思想的。一是南方各省反清的会党势力较集中强大；二是这几省的华侨多，而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就是在华侨中展开的，从海外取得财力物力的支援方便得多；三是清政府的政治军事重心都在北方，南方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四是南方几省经济较发达，有建设根据地的财源基础，便于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函》中说：“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有两广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昌明之政体。”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集中到广东，尤其是广州。

1916年的讨袁战争，也以广东为根据地。孙中山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时势，制定了战略方针。他说：“长江一带，敌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急于争衡，过费资力，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治。”但由于根据地建设不力，讨袁战争失败了。

1921年5月5日，经过了护法战争失败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他认为新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政治上民主，军事上统一的根据地，以作为北伐的大本营，彻底消灭一切军阀统治，统一全国。他就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很多的探索和尝试。最突出的就是关于根据地内党、政、军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强调指出根据地必须由革命党领导，根据地必须加强政权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根据地必须实行军令统一，军政统一，使武装力量为革命党和革命政权所掌握的重要原则。1921年4月4日，孙中山详细阐述了“五权宪法”和国家机关的组成，规定了军政部设于政府行政院下。同月，又在《陆

军部官制令》中规定：“陆军总长承大总统大命。”这样，就为根据地军政统一的组织建设打好了基础。

在组织建设打好基础之后，孙中山开始了军事上巩固两广革命根据地的行动。孙中山下一步的战略就是剿灭桂系，平定西面了。他认为取得广西后，可解除广东侧翼威胁而巩固广东，消除后顾之忧，而可转入军事大进功，实现北伐的宏图。当时桂系军阀与北京政府勾结起来了，陆荣廷集兵 15000 于梧州准备反攻广东，北洋军三路出兵“援粤”。革命只能采取果敢措施了。5 月 28 日，孙中山命陈炯时出肇后趋梧州，命许崇智由北江迎击沈鸿英，命李烈钧统一指挥滇、黔、赣军由湘黔向桂林、柳州进攻，并电告赵恒惕派兵助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革命军捣毁了桂系老巢龙州，陆荣廷本人也亡命越南。孙中山将广东广西联成一片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

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问题由于陈炯明和沈鸿英的叛乱和武力进攻广州而受到了威胁。经过艰苦的斗争，1923 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他这一次建设政权是要实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重建革命根据地来进行北伐。他说：“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建民国，还要拿这个光荣的地方作为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须选好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建民国的好屋基。”“速谋恢复广东之秩序，以广东政府为中心，谋中国之统一，以开导各省。”

在讨伐陈炯明和沈鸿英之后，孙中山关于广东根据地的建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作了建立政权、动员组织民众和统一财政、收回关作余三个方面的努力。广东根据地军政政权的建立使得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统一财政、收回关余的措施，整顿了军队丰裕了军饷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实力异常伟大，而其力大于枪炮十倍百倍而已”，广东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需要“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1924 年 10 月镇压商团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是依靠民众革命斗争必须与民众相结合，是他巩固根据地思想的重大发展。

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为北伐打好了坚实的大本营基础，为 1924 年年底的北伐扫清了障碍，并为其初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都在努力建立一块是可以与北方政府抗衡的根据地，并希望以根据地为本营，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共和。并且孙中山运用民众基础和武装实力相结合的原则来选择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措施，以及根据地纵深发展的构想，都是极有价值的。

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的突破口，孙中山在广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用他的革命思想教育了广东人民，还在根据地里建立了军校和革命军队，为全民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使革命之花在全国开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武装革命中没有走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起义流窜作战的老路子，而是开创性地走建设革命根据地路子，对当时的时势而言是英明的时期。

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领导武装革命几经失败，自己被迫几次离开政府，他发现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北方政府而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叛乱，两广军阀在“护法”“护国”战争中的不齐心；在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期间，陆荣廷、陈炯明、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等相继叛变革命，使革命功败垂成，甚至几遭覆顶之灾，失败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他逐步认识到了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是不可能使革命成功的，他不仅认识到要造就一支革命军，而且还认识到了单独依靠兵力奋斗是行不通的，必须领先民众。他说：“若单独依靠兵力，是不足靠的”“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之心力以奋斗。”孙中山这一认识的飞跃，表明他的基本的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转变为依靠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这个转变，是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后完成的，他这个转变有他本人在数次失败，逐步从内心加速这一认识的一方面原因；也有十月革命和中共的成立为确立新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契机，苏共和中共的帮助是他加速这一转变的另一方面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善意地批评他忽视了群众工作，并指出这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奋斗却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代表向孙中山建议“要推进革命，必先造成革命态势，对群众进行长期、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常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苏共和中共的帮助使他开阔了视野，认识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元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元成功之一日。”

1923年12月，孙中山作了三次演说：《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三次演说标志着他的转变。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宣言中他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族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他甚至提出要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他还提出两个重要原则，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提出给农以土地，要改良工人之生活，扶助他们为自身而奋斗。他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强调了武装改造民国必须依靠民众，为革命战争找到了基本力量。

孙中山其实早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就仔细阐明了他这种新战略思想的基本点：

第一是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他认为革命既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使革命的真正成功。革命要反帝反封建，必须以军队为手段，军队是以杀人暴力为革命破除障碍使敌人屈服的手段。但革命的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救人也。然欲救人必须全国人民能自救。他还从另一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建国有两种力量，一是军队之力量，二是主义之力量。军队的力量使敌屈服，而主义的力量就在于使人心服，自觉地为主义奋斗，两者相辅相成，各尽其效。即兵力与人民之心力的有机结合。孙中山这一主张指明了武装斗争与国民结合的方向。

第二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这是孙中山在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育所得到的新体会。他在演说中说武昌起义，讨袁、护法三次都以武力胜了，但革命仍未成功，是“因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何种力量？就是人民的心力，……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元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说：“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因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他指出兵力与心力两者，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实际上，他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前提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表明了他找了革命力量的源泉。

第三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合群力奋斗。他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太大，要造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必须做到党员协同军队奋斗的同时，要先得民心，使革命党、革命军队与人民合作奋斗，即他所说的合群力奋斗。就如何合群力奋斗，他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用主义宣传群众，一是用革命的方法组织群众。孙中山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武力和国民相结合指出了根本途径。

孙中山把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军事思想还在一步步地升华。1924年4月12日，在致电全国学农工商的通电中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本党之奋斗乃为发展实业而奋斗，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工人与本党共同奋斗。”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农民是我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这表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革命依靠国民力量，主要是要依靠在国民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武力和国民相结合，主要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种认识使得孙中山转向了依靠和武装工农。

孙中山这种进行激进的转变，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右派的反抗，但孙中山矢志不渝。他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紧接而来的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伐战争中得到了体现。1924年10月14日的平定商团叛乱中，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给予了黄传学生军和滇、桂、湘、豫、粤各军以极大支持，为平定商团叛乱立下了大功，工农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和起的巨大作用更加妇孺皆知了。

孙中山就武力与国民结合的探索，在北上时又更进了一步。他在《北上宣言》中说：“第一步是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武力与国民结合的途径是使时局的发展适应国民之需要，是使国民自择其需要。这进一步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基本精神是使武力拥护国民利益，为国民利益服务。这不但指明了军队革命化的途径，也指明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途径。

武器与精神相结合

与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坚持唯武器论不同，孙中山在考虑战略战术的诸因素时，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与武器的结合体现出来的。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说：“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之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他认为战争不能“专恃物质”，而应是“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这就是武器必须与精神相结合的战略思想。

孙中山极早就注意到了建设军队必须在政治思想上下功夫。早在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学校时，就把兴中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该校的宗旨，可以看出，他在此就作了精神思想教育与军事知识教育并重的尝试。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指示陆军部颁布了《维持地方治安军律》12条，强调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条文重申“擅封民屋财产者枪毙，”“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孙中山这些规定是从十多年来会党新军反清武装斗争中常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欲重视军队的精神风貌建设，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第二次成立折广州政府的就职宣言中提出军政统一的任务时，提出了军队“由共同的目的，以为共同的行动。”他的意图就是要以“拥树民国”这一共同的目的来统一军队。并指出“拥树民国”为民国军人的“天职”，并把“忠爱民国”作为军官的培养、考核和晋升的主要条件之一。在“拥树民国”的军事思想中，他还十分强调军队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了民国的军队是以消灭封建专制、拯救民众为己任的人民军队。这一方针的确立，使军队的精神思想得到了提高，使他们从只为吃军粮而战上升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觉悟程度，战斗力更是增强了。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精神与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建设谋略，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其重要性。

一是必须对革命军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孙中山认为革命军人必须受非常之军人教育，必须与“当兵吃粮”的旧军人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同负革命之责任”，“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即革命军人须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对军人实行精神教育是革命军人履行职志和实现其本质的要求。他认为反帝反军阀都必须有革命精神。而且革命精神是克敌制胜的保证。他以一童子与牛的力量对比来类比，他认为，牛力大但没精神，所以受制童子；童子力小但有精神，所以能够制服牛。

二是确定三民主义为军人革命精神的核心。孙中山要求革命军人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说革命军人高尚思想的根本表现就在于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而军人一旦具有了这种献身精神，就能吃苦耐劳，视死如归，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就能战无不胜。

第三是军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精神要素。他说：“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军人之智是指军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还强调“军人之智，须以合乎道义为准。”而军人之仁与智不同，他说：“所贵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谓之智。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革命军人之仁就在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不怕牺牲。军人之勇就在于

不怕牺牲了。他常说：“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他鼓励军人说：“诸君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孙中山这种智、仁、勇的思想，三者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把智慧和道德相融，把勇敢精神与革命理想联系起来，是极有份量的，为革命军队的建设铺置了一条新的路子。

孙中山在将武器与精神相统一的思想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初步的实践。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时，规定培养爱国精神为主要办学方针。《陆军军官学校暂行条件稿》规定，本校“授以初级军官应有之学术，养成爱国之精神，使具有初级军官之资格为宗旨”，在后来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印本》中指出：“凡军官之适否，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其在其精神品性如何，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生，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重要。”可见其对精神的重视。

孙中山将武器与精神相结合这一军事思想的探索和实践，是他建军思想上光辉的一页。孙中山这一思想既符合中国古兵法中“馭心为上”的原则，却又不象中国古代起义者那样运用宗教迷信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运用革命的实质阐述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在战略上这一开创，立即加强了革命军的力量，使他们在紧接而业的东征和北伐战争之中，做到了武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使得他们常常以少胜多，所向披靡，而这样的兵法是一个崭新的开创，是孙中山在革命时期所施行的战略谋略之一，既为当时的革命作了贡献，也为日后的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经验。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中国古兵法中，伐交为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战略上总能孤立敌方，使自己获得大量的支持者。军事上并不能泥拘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义框框，大敌当前，总是先给交与我方矛盾较小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战胜强敌的战略目标。

孙中山这种战略思想在二次革命前后就开始酝酿，在面对袁世凯和后来强大的直系军阀的强敌压境之时，总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联盟，来抗拒强敌。

这种谋略的第一次运用是在二次革命时期。早在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爆发了一支由白朗领导的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起初是在河南宝丰、鲁山等地活动，12月打出了革命的旗号，并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鲁山战役。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遭到了围剿，只有80人幸免于难。不久又迅速发展起来，并打着鲜明的反袁旗号。

袁世凯称帝之后，革命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号，组织武装力量，与有着巨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对垒。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革命党人处于极大的劣势，孤掌难鸣，只有联合其他力量一起奋斗才有希望。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转战于豫、鄂两省、牵制了北洋军阀部分兵力，威胁着京汉铁路运输的白朗起义军，孙中山派人与白朗联系，要求白朗军与抗袁军配合行动，使其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的任务。虽然孙中山派去联络的人因路上受阻，未能见到白朗，黄兴致白朗的亲笔信也因被截而没能让白朗见到，但他们联合作战的思想 and 为实现它所付出的努力，无疑是正确的。

讨袁时，孙中山不只是与白朗的武装力量尝试着联合行动，他甚至领导全国各派力量建立武装讨袁联合战线。当时可以联合的柄派主要力量是进步党和西南军阀。进步党本来是由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所领导的，是一个拥袁的政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是对立的。只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受到了排挤，不为袁氏所容，又看到袁氏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的反对，进步党为了自存而从拥袁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是当时反袁最雄厚的力量。西南军阀与国民党本来也志不同道不合，只是担心袁氏在一个个消灭异己力量，不再反抗，万难瓦全，所以也举起了反袁的旗号。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意识到只有运用“联合战线”这策略武器，才能自存和反袁胜利，他摒弃了宗派主义的小圈子，力主在“共同计贼”这面大旗下，与进步党及西南军阀联合起来。

孙中山这一策略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说服带有关主义色彩的中华革命党；二是怎样与其他两派力量联合。他在《讨袁宣言》中说与进步党的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可以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他致电中华革命党各地领导人，要“体察此意，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孙中山为了促成护国联合阵线的建立，他主张在尊重约法的大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他联合军用什么旗号的问题产生了争执，但由于云、贵、桂、浙已采用了五色旗，为了不使讨贼军之间互有猜疑，孙中山下令中华革命党用的青天白日旗换成五色旗。孙中山这种努力，使得护国联合阵线付诸了实践。

孙中山还注意到如何来巩固和发展联合战线，他从实际出发提出四条原

则，来约束联合战线内部的团结，力求把握联合战线的领导权。他认为第一，对于敌人要“以武力取彼凶残”，在联合战线内部“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第二，除恶条尽，一定要把讨袁战争进行到底；第三，必须反对妥协；第四，应由革命党领导。护国统一战线尽管由进步党和西南军阀的妥协，而使护国战争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孙中山这种“团结友军打击敌人”的策略的实践，说明了他的军事思想一步步走向了成熟，为后来成功地建立“反直军事联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早在他产生武装革命和武力改造民国的思想时就形成了，他认为北伐有关于革命是否成功，有关于中国的存亡。他在《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中说“一定要北伐，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如果能够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国便可以长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但是北伐的主要目标——直系军阀的实力不可小觑。

直系军阀拥有重兵 40 万，有极大的军事优势，政治上控制了北京政权，有很强的影响，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况且还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各个主面的综合实力比国民政府要大得多。如果去鸡蛋碰石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孙中山仔细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发现直系的曹锟、吴佩孚企图以“武力统一”的政策来消灭各派军阀，一统天下，这不仅与南方革命力量势不两立，与直系外的各派军伐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派军阀也想除掉直系而后快。孙中山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应该联合一切反直力量，建立全国武装反直联合战线，达到消灭直系，武力改造民国的目标。

孙中山的反直联合战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联合西南和联络西北；一是分化直系军阀，与张作霖的奉系的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军事联盟。总之，联合一切反直的力量，全国共举，武装讨直。

建立反直联合的第一步是联络西南各省，他认为要北伐讨直，必须先巩固西南。如果“西南能够联成一气，共同出兵北伐，很快就可以得武汉，得了武汉以后，便可以恢复民主元年的力量。”

孙中山认为西南联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1923 年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就派石青阳等回四川活动，争取四川各方面人士的合作。不久，任命四川的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命令熊督率各军，迅速扫荡，肃清川境，并力中原。孙中山乘着建立反直联合的精神，对很多军阀都摒弃前嫌，把众多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阵营之中。他大力争取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命孔康为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命孔“淬励部属，会合川军定川局，进军武汉。”

孙中山认为北伐同样需要西北各省的积极响应，如西北方向也出兵讨直，就置直系于前后受敌的境地了。他一方面派人去西北活动，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刘允臣等人，希望他们积极配合革命军北伐。

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孙中山开始了第二步——分化直系，联合奉皖。为了武装讨直，孙中山对直系的冯玉祥部展开了思想攻势，派孔祥熙送去孙中山亲笔的《建国大纲》，派与冯接触较多的徐谦、钮永健、王法勤等人，劝他联奉、皖，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致使冯玉祥加入了联盟并发动了北京政变。

出于经济和军事的原因，比如从奉、皖方面取得经济援助；比如阻止吴佩孚的势力向南发展和对直系实行南北夹击等等，孙中山决定与奉、皖结成

军事联盟。

广东根据他当时的经济已是非常危机，无法巩固和发展，更何况孙中山方面北伐力量有限，不联合奉、皖，欲打垮直系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形势，也发现有直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利用。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方局势为之紧张。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就立即派汪精卫前往奉天，讨论联合讨直之事，建议军事上南方政府出兵北伐，奉军出兵关内，攻占北京；政治上打倒曹、吴之后，召开国民会议，商讨国家统一和建设等事项。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孙中山又联合了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祥，相约四方共同举兵，讨伐曹吴。至此，反直军事联盟形成了。张作霖和卢永祥在经济和军火上给了广东政府很大的援助，使广东政府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发展了力量，江浙战争一爆发，张作霖通电响应，率师入关；孙中山发表宣言，移师北伐。

孙中山这种远交近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策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借人之力量，以于革命事业”。他这一策略的实践和胜利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闪光点。

以俄为师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前后认识到了十三年的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是缺少一支革命军，一支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完全不同的革命军。他迫切要求建设一支革命军队，但他认识到仍然按照以前那方法建军是不行的，孙中山开始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关于一支革命军队的新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是凭借一支强大的革命军的例子中得到了启示，提出了他的“以俄为师”的建立指导思想。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建军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一是重视军队骨干培养，以军校的形式来训练军队的骨干；一是改革军队的组织结构建设。当然，三者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

政治建军上所作的努力是极具开创性的，也很是成功的。孙中山在对苏联红军进行初步了解之后，认识到苏联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是因为苏联红军是一只用革命主义武装的军队。他认识到用革命主义打战，不但能使革命军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还能够瓦解敌军。孙中山决定用新三民主义武装革命军。也正因为如此，他确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也正因为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办学方针中，贯彻着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在教学的一些课程中，进行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并在军校内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的精神，孙中山亲自为黄埔军校制定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要学生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生死共赴。并在军校内倡导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军校大门上端高悬“革命者来”的匾额，两侧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师生们在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黄埔精神。

政治建军还表现在党军组织建设改变上。在党军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教导团体的团、营、连三级设党代表。在军校设政治训练班，培训见习党代表。东征时，东征军里设有政治部，另一方面还重视党军兵员的成份问题，使得政治觉悟较高的工人和农民成为主要成员，这样使得党军战斗力倍增。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军事策略还表现在创办黄埔军校这一行动上。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为组织革命军的干部培养而创办了黄埔军校。

1924年1月24日，指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参照苏联红军的样式组建军校。

军校教育也“以俄为师”，注意培养学生的革命牺牲精神，注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军事训练更是体现了联俄政策和以俄为师的策略。1923年1月，苏联顾问由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和契列帕诺夫等组成了苏联军事顾问团到黄埔工作。苏联顾问为黄埔师生讲解各门课程，随同学生们出操演习，随时随地指示各处动作要领，帮助师生们贯彻执行各项制度。

军校的组织机构，为了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军校，要求入校的学生有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大部分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来的，大多是出身工农或倾向进步的青年，军校对不纯洁分子坚决清除。军校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孙中山任命忠于新三

民主主义的廖仲恺为党代表，而政治部主任却三易其人，起初是戴季陶，因其不满三大政策被撤，后来任命邵元冲、邵把政治部主任之眼当成官做，最后改任能认真执行“以俄为师”的周恩来。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策略办军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孙中山在军事执行“以俄为师”这一策略还表现在他组建党军这一实践之上，他向苏联学习，把革命军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让革命军服务于革命党的政治目标。他在很多地方就干脆把革命军称为党军，以表明革命军与革命党的关系。

在党军的组织建设上，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制，选择忠于新三民主主义的人选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职务，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使得革命党能在军中展开政治思想工作，使革命军处于受革命党领导监督的地位。他还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重视党军领导力量的配备和武器的装备。

孙中山在组建革命军中，采取了“以俄为师”的基本策略，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得它成为一支异于中国以前任何旧军队的新军队，具有了不可比拟的战斗力的。不管是东征，还是北伐，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动，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它各营兵士纷纷响应，合力攻打湖广总督署。第二日12点左右，武昌全城为革命军占领，在武汉炸响了革命的第一炮。

第三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孙中山，从报纸上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回国之心，急如火焚，但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认为革命“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孤立清政府。在11月下旬由巴黎回国之前，先后在美国、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会见了美国朝野人士，英国外交大臣格里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长毕恭，争取他们同情中国革命，并约见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主任，希望他们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但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功。

孙中山虽然在那段时期内忙于致力外交，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在10月20日，经过圣路易、芝加哥抵达纽约时，确定了日后的革命计划，决定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的方针把革命之火在全国燃开。孙中山这一策略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总体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孙中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武昌起义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起义，造成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局面，以求达到孤立和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当时，各省的官僚和地主以及立宪派头面人物把握了一部分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地方上的统治还相当稳固，他们手下有一大批未被革命感化的军队，如果他们为捍卫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话，革命势必遭受极大的损失，胜算究竟有多大，也未必敢肯定。

这一严峻形势迫使革命者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同时，不得不寻求一条瓦解敌对力量的路子。孙中山仔细地分析了敌对阵营里存在的矛盾。

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在垂死的时期，“感觉到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他们就趁今日监国机会，先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巩固皇族的大权，然后渐渐借政治上的力量来排汉。”载洋上台后，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剧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督抚们不是排满，就是被满排，这一形势使得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张望不定。清王朝对立宪派玩的一个花招，冠冕堂皇的内阁实际上是一个皇室内阁，使一直在企望清王朝实行宪政的立宪派绝望了。清政府把这一派力量也推向革命的一边，并造成了“民心震动”的政治冲击力，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求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的策略是最适当的，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造成革命的声势，以和平光复的方式来劝说清王朝的地方官僚举起反清的大旗，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总之策动各地以响应武昌起义。

孙中山亲自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东提督龙济光，劝他们反正。国内革命党也纷纷执行这一策略，他们在发动武装起义给清王朝以打击的同时，也劝说地方大官反正。革命党人曾经让汤化龙以湖北洛议局局长的身份号召各省谘议局反正。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施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平光复”减少了革

命的阻力，避免了许多牺牲和损失。比如当时的广东，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想凭着驻扎在城内外的李准和龙济光所部 40 几个营的巡防队，负隅顽抗。孙中山致电与他说：“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使广东得到了和平光复，使革命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自战。

在和平光复的战略攻心下，身份特殊的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的作用下，各地官吏纷纷效尤，包括一些满族官吏，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但又惧于革命的声势，持首鼠两端的态度，但那些很有影响的地方大员一反正，就逼得他们不得不跟着走。如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宣布和平光复，江苏独立，当天就通电江苏省所属的备府县独立，使得全省官吏惊恐不安，交出官印，接受独立。

就这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两手，促成了光复和独立，全国其他的各省的许多府县也和平光复，建立了新的政权，造成了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局势，孤立了清王朝，给了清王朝极大的震动和打击。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形成和实践，给解放战争部分省市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模式。

分进合击，歼敌有生力量

1917年7月，段祺瑞把握北京政府，破坏临时约法，并借张勋辫子军复辟的机会，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建立了一个段氏政权。段氏一系列的举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人民认识到必以反对复辟者反对伪共和，始可救国，全国掀起了反对假共和的高潮。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不能容忍段氏这种践踏约法的行径，为了拯救革命和国家，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护法的大旗，他仔细分析全国的形势，以便订出作战计划来。

他发现南北方在政治影响上，段氏是非法政府，外人均不敢轻为承认，众叛亲离；而护法军靖国护法，义师讨贼，为人民所拥护。军事上，北方军心不一，且又畏难，并且军内有人倾向于革命；南方拥有海军和滇系、桂系，能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有必胜的把握。

1917年9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军事实力，而是要转过来依靠陆荣廷的桂系和唐继尧的滇系作为主力。

陆荣廷和唐继尧各个肚里都揣了一把小肠子，为自己打算。好在当时的形势可以利用。段祺瑞派傅良进攻湖南，与桂系陆荣廷。陈炳混要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桂系出于自己的考虑，愿意与军政府联合起来，唐继尧虽然有要恢复约法的思想，但实际上也是想利用护法进攻四川。

在南方企图北上护法的同时，段祺瑞也有一种武力的战略意图，分三路南下：主攻湖南、四川和闽浙为两翼。

各方面的原因使孙中山为护法战争拟定了战略目标和战术计划。战略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推翻北京政权。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是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

9月10日，孙中山等提出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如下：由桂系派兵防止龙济光打俯背，巩固后方；由滇军第三师援军；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打福建；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军，会师武汉。

这一战略不但能够适合北伐正面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需要，也适应桂系和滇系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也是针对段氏三路南犯的形势。正面迎敌，保卫南方各省的需要而制定的。这一计划促使了三路进军，分进合击，会师武汉，断敌退路，歼灭敌人在长江以南的有生力量。

歼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只是手段，但并非护法的最终目标，孙中山为了直捣北京，消灭段氏违法政权，制定了北伐的作战方针。北伐以长江岸为主战场，先克武昌，后定南京，击攘敌军在长江一带的势力，再图北京。

其战略仍然采用“分进合击”，军分三路：桂系为主力的湘、桂联军为中央军；滇系为主力的，联合黔川护法力量为左翼；在粤滇军，陈炯明、朱执信招收训练的部队，加上海军为右翼，三路共进，合击北京。

战争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央军由两广进攻长沙，肃湘人湘之战，作好攻打武昌的准备；左翼军道先攻占四川，留下部分兵力扼守川陕边境，以牵制晋陕之敌，主力东下与中央军会攻武昌；右翼军攻打闽、浙，略定淞、沪，与中央军，左路军共下南京，歼灭敌方在江南的有生力量。

第一步战成功之后，休整补充，以图北进。中央军从南京出发，沿津浦

路北进；左翼军从武昌出发，沿京汉路北进；留守川陕，边境的部分兵力，度秦岭，出陕晋，攻打敌军后侧；右翼军沿江入海，由海路北进。三路共进，会攻北京。

孙中山这一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他在军事谋略上的正确探索与实践。他在作战方针中确定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认识到了要推翻反动政权，必先消灭反动军队，例如他要求中央军援湘进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目的也是为了断敌后路，合“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尽歼丑类，永奠民国。”

还有，孙中山把战争分为两步来打，以攻打武汉作为转折点，也是非常正确的。第一是因为武汉是北方通向湖南的枢纽，只有攻克武汉，才能切断敌人的增援和退路，达到腹背夹击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第二是因为武汉是三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三楚又“为全国中枢，棺毅大江南北，形势所重敌必所争。”攻占了武汉，就能决定三楚，扼长江，威慑全国。

孙中山这一伟大的谋略终究因为西南军阀的阻挠未能实现，桂系主力攻克长沙不肯北进，唐继尧占领四川不愿南下，使攻占武汉的计划搁空了。但其战略的正确性和伟大性仍然可由护法战争初期的胜利所证明。

精兵袭取，侧翼牵制

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是孙中山武装革命开端时，举行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时所采取的军事谋略。

精兵袭取在战术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精兵，即指人的本身，兵贵精而不贵多；另一方面是战术即作战方法上的袭击，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一个突然的打击。精兵袭取是孙中山在 1895 年广州起义中所动用的主要策略。

孙中山从战略上没把广州起义孤立起来，而是将它与惠州起义联系起来。他应用侧翼牵制的总谋略来筹划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一方面在惠州起义，一方面准备在广州响应。惠州作主要作战方面，广州策应以侧面牵制 1894 年 7 月 25 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1895 年 4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的战败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抓住清政府被削弱和全国人民革命的呼声高涨的时机，制定作计划，采用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敌人的战术，向清王朝发起武装革命的第一次进攻。

孙中山在筹划广州起义时，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情况。第一方面，在清王朝统治几百年之后，突举义旗，也属“造反”，起义必须隐蔽、迅速，这个角度来说，兵贵精而不贵多；第二方面孙中山觉得当时广州的重要衙署只有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只有数名衙役把守。孙中山打算派人袭击这六七处地方，将敌军指挥官或执或诛，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使敌自乱。从这一角度来说，也要求兵精而不兵众。第三，孙中山认为清朝军队防备松弛，没有思想准备，他计划对广州的清军来个突然打击，用“内起外应”的作战方案，派一部分精兵潜伏在城内，出敌不意地袭击敌军的指挥机关，使清军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只要敌军一混乱，事先埋伏在城外的各路会党队伍随即响应，攻占广州。

基于这种分析和设想，他给广州起义定下了“精兵袭取”的策略。他注重参加起义的人员的“敢死”精神，有奋勇首义的无畏胆略，希望他们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在筹备起义的时候，特意从汕头和西江招募一些会党，利用他们与广州存在的主客之分，语言差别，与当地人不相习，无后顾之忧，可以一意以争胜，孙中山想就是起义中途有什么变故，他们也无法在城内存身，使得他们只能置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地向前进攻。

广州起义终因计划泄密而失败，但孙中山所作的军事谋略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在策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作了侧翼牵制的谋略上的探索。他分析了在惠州起义的各方面条件：惠州是广东东江一带的要地，它接近英属殖民地新界，又濒临大海，便于从香港和海上获得接济。但何况惠州地区是会党聚居之地，革命党人正待机而动。在惠州举事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也是很在战略意义的。尽管如此，清政府在广东方面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不在战略上作出计划，起义就很难成功。孙中山认为应牵制住广州的敌人，阻止他们东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派出邓荫南、史坚如等人急赴广州，在广州同时举事，牵制清军，以保证惠州方面能够迅速集结起兵力，夺取惠州、新安两地区，然后再逆江西上，与广州起义军内应外合，夺取广州市，然后再逐渐据有广东省。

孙中山在惠州起义的同时，策划广州起义，其目的不在于直接夺取省城，只是想让广州有乱，使清军受到牵制，无法出兵惠州而已。他这一侧面牵制的谋略的运用，使得惠州起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下子就发展到两万多人，一连打了很多胜仗。

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我国古兵法《孙子》的《谋攻》篇很是详尽地阐述了集中力量，以绝对优势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重要性。孙中山较早地认识和实践了这一军事谋略。

他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首先是表现在武装起义方面，认为武装起义也应该集中力量来“大举”，以图一举成败。他这战略思想是在1908年4月领导的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形成的。在这次起义失败之前，他先后发动了8次边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告诉了他，以往那种贪多务得，分散小搞以求引起各地响应的策略是行不通的。认识到累次累率发动起义，过于频繁，未能成功，反而大伤革命元气。

河口起义之后，孙中山产生了一种要集中力量，“大举”起义的思想，正如他在《致寅崎寅藏函》中所说：“自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这话正说明了他要积蓄力量，集中力量进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起义。

这思想的形成，促使他在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格外谨慎了。1908年，清王朝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大陆革命党人蠢蠢欲动。纷纷争欲起事，派人前往当时呆在新加坡的孙中山请示，但孙中山却认为“机局固佳，然吾人财力未充”，仍然无法集中力量给清王朝一个致命的打击，表示“仍要养足实力以待之。”

1908年底，孙中山在南洋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决定再次发动起义。由于他认识到了以往历次起义，同时在几个地方发动起义，分路作战，力分而薄，无法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次决定全力于一地进行大规模起义。

此时的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运动新军上来了，选择新军集结较多的广州作为起义地点，集中力量策划广州一地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力量，统筹部从南洋各地以及福建、安徽、江苏、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调来会党，组成先锋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总之，这次起义集中各地革命党之精英，倾注了全党的人力物力，充分体现了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策略。

这次起义因经费不足而失败，却更坚定了孙中山要集中力量起义于一地的军事谋略。在后来的1910年2月的广州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更加完善地执行着这一策略。

孙中山这一军事谋略的运用也表现在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中。

1917年10月打响护法战争，在孙中山等人的努力下，进展神速。在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湖南护法军的配合下，中央军攻占了长沙；孙中山策反了驻守芋襄的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召集旧部起义，三人所部的军队共同组成了湖北靖国联军，使湖北防卫空虚，并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指示，活跃于荆襄，准备进攻武汉；左翼军也已攻下长沙，与四川护法军组成联军，时刻准备着取道重庆，东下武汉。形势一片大好，是攻克武汉断敌退路，消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的关键时刻。

孙中山决定集中力量，打好关键的一战。战争选择三楚中枢之地武汉，只要攻下武汉，就能平定三楚，扼长江，长驱直入攻下北京。正是“将胜之棋，一着难援”的时机，孙中山准备集中各路兵力，会攻武汉。

孙中山命令“除征闽粤军克日出发外，并电促川中联军速下归，宜夹击

吴逆光新。”命令黎天才等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成腹背夹击之势，电令林修梅、刘树藩等进窥武汉。

只要各路军队尽心尽力，武汉指日可下，可由于滇系唐继尧留恋四川，桂系陆荣廷攻占长沙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过到，不愿再北上。不管孙中山是如何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坚持集中兵力会攻武汉的策略，滇系和桂系仍然按兵不动，致使武汉未下，荆襄靖团联军孤军奋战遭到了镇压而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但这并不能使人怀疑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谋略的伟大性和正确性。

在第二次护法北伐中，孙中山所拟的一条“移师湘境，中路突破”的作战方针，也充分体现了他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军事谋路。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首领曹锟步段祺瑞之后，成了北京政府的掌权者。曹锟的贿选与修改临时约法，严重违犯了约法精神。因此，曹氏直系军阀成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北伐的主要对象。

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掌握了直系的主要武力，他所辖的第三师以及所指挥的五个混成旅、四个补充旅就驻守在两湖和京汉线两侧。消灭驻扎在两湖的吴佩孚部队是北伐路上不可避免的一场血战，而当时北伐军的总人数不足三万，吴佩孚驻湘军却是直系精锐，以少对多，很是忌讳。

为了突破中路，孙中山命令顾品珍等，移师湘境，命许崇智率粤军本部，联合湘军直赴武汉，命川军从侧翼进攻，集中力量打好这一硬仗。

孙中山这一策略最后因为川、滇、黔军之间的“三角战争”和川军互战而未能实现，但北伐初期的顺利进行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

四面打击敌人

四面围敌，置敌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四面挨打，互相不能呼应而置敌于败绩。这一策略在中国古代兵法常常见到，只是一定要注意到“围师必阙”这一前提。

孙中山所运用四面打击的策略与四面围敌有同也有异；相同点都是欲使敌四面受敌，不能呼应；不同处是四面围敌是主动方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孙中山的四面打击敌人却只是想从4个方向上打击敌人，而分四围合之。

孙中山这一个策略先后在讨袁战争中和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中实现。

1915年，窃取革命政权后袁世凯明目张胆地进行改变共和国体，复辟封建君主专制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竭力反对。孙中山目睹又一次革命有利时机来到了，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1915年夏末，召集了廖仲恺等人举行会议，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阐述了他的四面打击敌人的战略。战略决定以东南军、西南军、东北军、西北军发动起义，四面打击敌人。密令陈其美、胡汉民、居正、于右任等，前往上海，广州、青岛和陕西在原筹设中华革命军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各军总司令部。

四路军的具体任务是：西南军在西南省区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东南军在长江一带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占领重要地点；西北军在陕西等省发动起义打击敌人，增加革命的实力；东北军在东北主要在山东发动起义打击敌人，作好进攻北京的准备。

孙中山仔细分析当时全国的形势，他发现东北是清王朝的老家，封建统治势力仍然很强大；华北是反动统治的中心，发展革命更是艰难；西北偏远，袁世凯也没什么势力，但其革命基础薄弱；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很是重要，可袁世凯在扑灭辛亥革命时就驻守了重军，更何况东西有津浦、京汉两条铁路线，敌军运输方便，发动革命的难度很大；西南方向与西北一样，山高皇帝远，反动力量相对薄弱，而革命党人的力量因二次革命时力量的保存，相对强大一些，西南方向接近边疆和海岸，便于海外接济，集中力量，在西南方面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然后威震全国。

孙中山认为广东是西南方向最有发展潜力省份，广东不仅经济发达，便于联系海外，而且可以旁及福建，从而控制整个南方。基于这一考虑，孙中山派朱执信担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在澳门设立司令部，策动和领导广东起义，作为建立西南根据地的决定性步骤。

在东南方面，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说上海是长江下游财富的地区，如果能够占领上海，国际上也许能够得到支持。孙中山也认为袁世凯阵营内部不和，袁手下许多将领官僚都想反抗袁，如果在长江下游举事，必定会有大批官僚将领反正。基于这些考虑，孙中山委派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中华革命军总司令，领导东南军起义。

在东北方向（东北，当时泛指东北三省和北部沿海各省），孙中山也接受了陈其美的建议。陈其美说：“辛亥癸丑两役的失人，原因很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如仍偏重南方，忽视北方，复辙相寻，决元成轼希望。不如蹈瑕抵隙，改在东北进行，培植根基，为犁庭扫穴的准备。”陈其美的建议使孙中山认识了东北的重要性，但东三省太开阔，不如地理位置重要的山东省，孙中山命令居正担任东北军总司令，

前往山东整编当地的革命军，组成山东中华革命军，下辖两个纵队、五个支队和由三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大队。

为了四面打击敌人，孙中山把眼光放在了秦陇地区。在西北方向发展革命力量，为“秦陇一军出关北旨”作好准备。孙中山委派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前往陕西发展力量。

反袁战争一打响，四个方向的中华革命军一涌而起，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力量，造成了极大的革命声势。

朱执信在广东领导了起义，此仆彼继，再接再厉，各县莫不有民党起义事，其众几十万，整个广东省 94 个县，除滇军占领的韶州、英德外，有 54 个县脱离了龙济光的统治；陈其美到上海领导卢义，曾一度占领了电话局，声势和规模之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居正执行孙中山“必占济南”的指示，他率领东北革命军进攻济南，占领了 20 几个县，队伍发展到 30000 人，威震整个山东乃至中国北部。

孙中山这种四面打击敌人的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讨袁烽火，使袁世凯防不胜防，震撼了他的统治，揭开了了不配的护国战争的序幕。

在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中，孙中山也注意采取四面打击敌人的策略。孙中山在领导指挥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时，一面使三路军从三个方向北上，一面也注意布置发动起义和策反敌军，以期达到四面打击敌人的效果。

在三路军起兵北上的同时，派程潜前往湖南衡阳组织湖南护法军；指派黄复生、石青阳与前川军将领卢师绅、颜师德等人，组成四川国民军；策反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原第三师长王安澜，组成湖北靖国联军；派于右任、胡景翼前往陕西三原组织靖国军等。

孙中山这种四面打击敌人的策略，使敌军防不胜防，牵制了敌军，有力地配合护法军北伐。这种策略的确性由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初期胜利得到了证明。

游勇战术

孙中山为了实现北伐大业，以其达到武力改造民国的最终目的，在北伐前后，他秉着要找到一种适合革命军的战术，以一种求实精神和辨证思想，仔细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特点，提出了游勇战术和游勇战术所必要的5种技能。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现状，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游勇战术原则。

孙中山分析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军事工业更是一片空白，缺少大兵工厂，不应学欧洲打正规战的战术；其次，中国军队刚刚学使用洋枪洋炮，不能再用以弓箭刀枪作武器时所排定的阵法，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清军被八国联军打败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点，他着重强调的是北伐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北伐军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北洋军，而且在编制、指挥等方面都不如正规军。北伐军去攻打北洋军不要以少胜多，就必须避实击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也就是孙中山针对当时的国情和军情所提出的游勇战术。他说：“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彼之所用战术，皆为游勇战术，最能制胜。”“此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与北方交战，尤为相宜。”

孙中山在那次演说中，不只是提出了游勇战术的原则，还在分析和借鉴中外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从一种军事的远大战略眼光出发，提出了游勇战术的五种技能，即指参加游勇战的军人应具备五种素质：能命中，能隐伏，能耐军，能走路和能吃粗。

孙中山在演说中说军队之有无战斗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第一要件。一定要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孙中山这一要求很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孤身作战的游勇，随身携带的弹药是非常有限的，无法随时补济，所以要求游勇有极高的命中率，他这一要求也体现了他作战中充分发挥火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术思想。

与“命中”原则相辅相成的另一原则是“能隐优”。孙中山在演说中要求战士善于利用地形，为自身之屏蔽，缩小目标，使得敌人元目标可寻，特别是在子弹如雨的情况下，要深自闭藏，勿康惊窜。这样已在暗处，敌在明处就能保存自身的前提下，又能消耗敌人的锐气，伺机出去，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孙中山所说的隐伏其实是与命中原则相吻合的，甚至可以说出是命中的前提和基础，与命中原则同为孙中山所提出的游勇战术中最精华所在。

与稳伏密切相关的是能耐劳，他说，往日黄兴在领导钦廉起义的时候，失败后只剩下四个人逃到山上，被600敌兵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险全在于具有命中，隐伏和耐劳的技能。他还说隐伏的秘诀只有“不动”二字，至少须能耐12小时之劳，直至夜深始于潜行，具体他说明耐劳和隐伏的关系。孙中山强调了游勇战术中战士身体素质的重要性。

同样属于战士身体素质的另外两个基本技能是能走路和能吃粗。

从某个角度而言，能走路体现了游勇战术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孙中山提出和强调能走路的技能，是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孙中山说当时的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走。”而以生活在山区的南方人为主的革命军，走路是优势，也是游勇战术的流动性

所决定的。采取游勇战术，战士往往比敌人要多走几倍的路。

孙中山所说的“能吃粗”即指能习惯于能吃炒米。他分析到采取游勇战术补给困难，吃有轻便、耐久、自足、省时等特点的炒米是最好不过的，这一点甚至胜过正规军。

孙中山所提出的游勇战术虽未能揭示游击战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度性、流动性等深层的意义，但是他基于国情和敌我两方对比的分析。而寻找适合革命军的战术原则努力是极有价值的，为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奠定了指导思想。

先驱后灾，灭桂北伐

1917年10月11日，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因为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的牵制和妥协而进展缓慢，特别是陆荣廷玩开了破坏革命的手腕。他不提阻挠孙中山建立军政府，还想广东省变成桂系的天下。

桂系军阀督粤将领陈炳昆把广东当成桂系王国，垄断广东的政、军、财大权，企图把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使军政府的部长每月都拿不上20元；军事上，分化排挤和打击服从孙中山的军队，收买了海军程璧光，把新组建的由陈炯明所领导的粤军排挤入闽，暗杀了就任陆军总长和次长的驻粤粤军第三师长张开儒和他的秘书崔文藻，使孙中山成为了一个光杆元师，陈炳昆还蛮横干涉军政府事务，使之形同虚设；政治上阴谋改组军政府，拉拢国会议员通过了《修改军政府的组织法案》，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4日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5月21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去上海。

从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闭门著书，从数十年的革命教训得出了结果论：不能依靠军阀来打军阀。1919年5月28日，他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决定“重新革命，重建民国。”

要“重新革命”、“重建民国”必须先消灭桂系军阀，消灭桂系军阀是建立南方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北伐等整个军事战略的关键。孙中山说：‘昔武侯未出中原，先擒孟获，以除内顾之忧，今之桂贼，即孟获也。……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

为了灭桂，孙中山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部署工作。1920年1月14日，孙中山提出了“先驱后灭”的方针，利用粤军被排挤到闽的不满，欲驱逐桂军而后快的急迫心理，先把桂军驱逐出广东，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力量壮大之后，再寻机消灭桂军。

1920年2月，滇系与桂系发生争端，并诉诸武力。孙中山认为时机已经来到，决定立即行动。他命令陈炯明率部回粤，并策动滇、川、湘、黔各军四方策应，以牵制桂军。可是除了李烈钧孤军作战外，陈炯明、唐继尧、王文华、徐鹤仙等人均按兵不动。李烈钧迫于实力相殊，与陆荣廷议和而终。

孙中山预料桂系盯时必将出兵灭粤，果不出其所料，8月11日，南方伪军政府发出了进攻福建的命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三路进犯，陈炯明迫于生存，不得不出兵，8月12日在漳州公因誓师，亦分兵三路进军粤省。

粤军思乡心切，个个拼死奋斗，战斗力大增，一路势如破竹，实现了孙中山“先驱后灭”战略意图的第一步。孙中山一方面密切关注粤军的进展，鼓励陈炯明向惠州猛进；另一方面策动滇、川、湘、黔各军出兵，四面围攻桂军。可当时川、滇、黔军正忙于“三角战争”未能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但使得桂军孤立和感到了侧翼的威胁。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

孙中山以革命军队为主力，似西南各省作箝制，驱桂出广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实现。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计划：废除伪军政府，建立军政统一的根据地，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积累实力，寻机消灭桂系，使南方成为一块连成一片的根据地。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完成一系列举措，稳固了基础之后，他力主迅速出兵消灭桂系。孙中山在《复李翰屏函》中说：“现粤省虽经克复，桂贼老巢尚在，非犁庭扫穴，莫竟全功，尚望我诸同志协力一臻，完毕业也。”

当时，孙中山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诸优势，粤边在进粤一战中大胜桂军，士气高昂，在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更有战斗力了。而此时的黔、川、滇各军也归附了正式政府，对桂系呈包围之势，粤军若乘胜进击，必胜无疑。而当时桂系军阀从广东败退之后，已溃不成军，无很强的战斗力可言。

在孙中山计划着消灭桂系的同时，桂系也打着同样的算盘，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重新打回广东来重温旧梦。桂系军与同样怀着想消灭南方军府目的的北洋军一拍即合，很快就勾搭上了，北洋军分三路南下“援粤”，陆荣廷收集残部，在梧州驻重兵 1.5 万准备反攻广东。南方局势又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了，孙中山下令平定西南，实现他的“先驱后灭”的战略计划的第二步。5 月 28 日，孙中山命陈炯明部从肇庆出兵直扑梧州；命许崇智由北江出发，迎战沈鸿英；命李烈钧统领滇、黔、赣军沿湘黔方向进发，直取桂林和柳州，致电赵恒锡，请求派兵助战。讨贼军同仇敌汽，又深受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6 月 28 日攻克梧州，8 月 5 日，开进南宁，8 月 13 日，进占桂林、柳州，9 月底，攻克了龙州。陆荣廷亡命越南，桂系残部投降。至此，孙中山“先驱后灭”的战略计划全部得到了实现，广东广西联成一片，为北伐打好了根据地的基础。孙中山在消灭桂系的过程中，采用了“先驱后灭”的谋略，分二步来完成，第一步利用粤军想杀回老家的心理，第二步利用粤军胜利后的高昂士气，可以说符合古兵法中的激将之法，孙中山把先驱后灭也是根据当时的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不能一口吃成胖子，但也不能不吃，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与虎谋皮，发动新军

与虎谋皮，本来是指去做一种很是危险却毫无希望的事情。用于军事谋略就有着另外一种意思了，指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无从下手，就不如去打它身上的皮的主意了，谋定皮之前，敌人四顾张望没发现敌人，放松戒备；谋定皮之后，敌人发现了，皮痛了，却已无可奈何了，皮烂了接着伤肉伤骨，敌人就被战败了。军事上用与虎谋皮之计谋，既能够隐伏保护好自己，又能一着置敌于死地。

孙中山在领导武装起义时，注意运动清政府的新军，并由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促使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就体现他与虎谋皮策略的成功。新军本是清王统治者作为加强其统治力量，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是清王朝这只老虎表现出威武凶猛使人畏惧的一张皮，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通过艰苦的工作，促使了一部分新军思想的转变，使得他们由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工具变成了革命的工具，给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

孙中山这一谋略开始动用时是不自觉的，在1907——1908年组织西南边境起义时发现西南地区有一支可以联络起义的新军力量。因为当时广西巡抚李经羲为了办新军，用了不少湖南人，与革命党人黄兴是旧交的郭人漳是桂林防营统领，蔡锷是随营学堂总办，还有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谭人凤、邹永成也在随营学堂。在西南起义有着联络新军的方便。

但此时的孙中山，头脑中还有一种“秀才不造反，军队不革命”的观点，1904年，孙与在比利时的朱和中就此问题争论了三日三夜，使得孙中山确定了起义中会党新军并进的指导原则。

孙中山开始吸收新军首领加入同盟会，如吸收郭人漳、赵声等加入同盟会，起义中注意了让新军策应，但主力仍然是会党分子。河口起义和镇南关起义，新军策应，起义军没费多少火力就成功了，但此时对新军并没有进行革命思想的熏陶，而多用金钱和粮食加以收买，所以起义都只能是暂时的胜利，并没有造成全国响应，也使得孙中山那种一地起义而多地响应的计划落空。

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胡汉民和赵声的帮助下，认识到民军缺少应有的战斗力，而有战斗力的新军中往往有真正想救国救民的人。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新军的军事素质及成份性质，发现了新军有着让他惊喜的优点。

一是新军的家庭出身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民主主义。因为新军人伍时对文化程度标准的要求，使得新军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出身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大部分是出身于贫苦农民或会党分子家庭。这两种家庭出身决定了军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使得容易被革命宣传所打动。

第二是新军中的军官一般由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担任，而接受现代军事知识只有在国内或国外进军校学习。这种学习常使他们接受西方教育，思想受感染而倾向于革命。

例如清政府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300人，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而国内各省的陆军中、小学生堂中有不少学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为革命党人运动新军起义提供了基础。

第三，新军的编制是依照日本模式进行编制的，武器装备全是从西方购置的，其训练也完全是练洋枪洋操，因此，新军有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军事

素质、组织纪律和战斗力。

如果能发动新军革命，自然要比会党和旧式军队强得多。

第四，新军是清王朝统治者手里一张王牌，是自认为对付革命者的法宝，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如发动新军革命，既能使清政府防不胜防，又能给清政府致命的一剑。

基于对新军的性质及军事素质的认识分析，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新军中的革命形势和刺激以新军为己用的重要性，其用兵思想有了新的转变。并且在运动新军的方式上有了改善，把重视新军上层分子的联络，发展到对下层官兵的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在与胡汉民的讨论中，认识到新军工作应注重于连排长以下，并决定派革命党人打入新军基层，进行宣传工作，争取下级官兵。例如革命党人倪映典打入广州新军中担任炮兵排长，进行基层官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倪映典在基层工作的有声有色，并摸索出一整套的工作方法来了。他为同盟会南方支部拟定了《运动军队章程十条》，说明了“先从弃目着手为基础，以其提介兵士之神速，尤均以靠现实主义”的新军基层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如倪映典一样的革命党人在基层以发放小册子、讲故事的形式，使得新军基层官兵思想大有改观，几成揭竿欲起之势，成为了一支新的有力的革命力量。正如端方于 1906 年所上奏的密折里所说：“革命党人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担心竿介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

正是孙中山这种“与虎谋皮”的策略的实现，革命党在广州新军中有了一支力量，尽管接下来的 1910 年 2 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倪映典的牺牲，失去领袖而失败；。1911 年 4 月，黄花冈起义因联络不周而失败，但是几个月后的由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的成拭，就说明了孙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除旧布新，建立近代化军队

事物均有个发展过程，新取代旧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键人物把“除旧布新”当着谋略来用，往往可以把历史的必然进程提快几个步骤。如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许多人要华盛顿当皇帝，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美国也许就有可能只是一个独立落后的封建君主制国家，但是华盛顿巧用了除旧布新的政策谋略，使得美国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之后，就用除旧布新的策略，把起义各省的旧式军队改造成一支近代化军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将实现“五个统一”，即“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孙中山强调了军政统一是其他四大统一的基础和保证。他宣言：“本总统就任后，首谋统一军队。”

可当时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又担心有人乘机滥招军队扩张私人力量，因此，临时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另外大量招募新兵来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只好在各省现有军队基础上整编。

究竟该怎样来将这些旧式军队进行编制呢？孙中山与担任陆军总兼参谋总长的黄兴以得一致共识不能再象清政府那样治军了，要除旧布新，向西方学习，建立一支资产阶级的近代化军队。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军队整编的命令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思想：

第一，建立一支崭新编制和多兵种的武装力量。

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批准颁布了陆军编制表，规定了陆军建制和兵力配置。新编制将清末新军建制名称军、镇、协、标、营、队、大排、小排，改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兵力配置也较清末新军加强火器的配置，基本组成为每军管两师，每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重炮连，另有一个野战电信队，一个卫生队；每师有两个步兵旅；每旅辖两个步兵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营；每营辖四个连（其中一营另辖一个机关枪连），骑兵一团辖五连（包括一个机关枪连），炮兵一团辖有两营六连。

为了让军队达到多兵种形式，孙中山试图编制一支海军和制定了海军军事制度。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前，临时政府已整编了21个陆军师和一支包括39艘舰只的海军。

第二，为了精干各级指挥机关，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采取“一长制”。即每一级军事编制单位只有一个正职，没有另设权力相当的长官。如陆军部设有总长和次长，军部、师总、旅部设军长、师长、旅长，而无副职。团部虽有团副，但并没有与团长并驾齐驱的权力。营部、连部也只有营长、连长。这样简化了指挥程序，有利于快速灵活地指挥。

每一个军事编制单位的“长”之下设有参谋部，陆军部还请有顾问人员，这样可以招揽人才，集思广议。孙中山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了不人浮于事，十分强调“事权统一”，“责有专属”，不允许各级单位的指挥机构的人员兼职。孙中山还注意精减各指挥机构的各种人员，以达到精干化的目的，提高效率，加强应变力，增强战斗力。

第三，学习西方，划分和明确军人等级，实行军衔制。军衔制有利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级级节制，维护纪律，更有利于激发军人的上进

心。

其军衔制体现了它的晋升军衔的选拨原则，即劳绩战功，学术才具选拔军官。为了培养军官的才具，临时政府重视军校的举办。

其军衔制规定了严格的军官考核晋升制，规定晋升必须以充现职年限期满为前提。使得各级军官能在现职岗位上积累一定的经验，为就任更高的职务打下基础。晋升制按能力又分为升级、轮升和报升几种方式，既有过硬的制度，又能破格，重视人才。

为了保持军官队伍的合理年龄结构，南京临时政府的军衔制还规定各级官佐的服役年龄。

孙中山的军队建设上所迈的一大步，体现了他的“除旧布新”的战略策略，又体现出民国时期的革新精神，使得中国的军队建设模式从清末清军直接向前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以三民主义指导战争

孙中山认识战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其内容区别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时期，两个时期所阐述的民族与战争、民权与战争、民生与战争关系内容不同，统而言之，可分为三民主义战争观和新三民主义战争观。他的两种战争观的阐述，其战略目的是以武力来实现主义，以主义来指导战争。说透了就是谋略上的“馭心为上”的运用，以激起一批批革命志士为主义而奋斗牺牲。

三民主义战争观是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来的。第一，他主张用民族战争解决民族压迫，必须通过民族战争才能驱除穷凶极恶的满政府，另外，“恢复中华除了要“驱除鞑虏”外，还要反抗外侵略，要以民族自卫战争保卫祖国。第二，封建专制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除了实施惠民政策外，总是采用武力镇压人民，专制主义与民权主义格格不入，必须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逐步把民主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第三，主张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来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同时，要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从三方面阐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整体构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战争观。

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完成了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在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战争观也由三民主义战争观转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战争观。

第一，他在民族与战争的关系上，提出了两点：一是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是联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

孙中山强调说当今中华民族已处于被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地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避免灭亡的厄运，就必须唤起民族意识，不只是如此，孙中山还认识到了世界上所有弱小民族都在受着压迫，中华民族要独立生存，不但自己要唤醒民族主义，还要把世界其他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他说俄国革命改变了世界潮流，使世界战争成为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战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因为俄国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变化，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就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中结民族也由此可以获得解放。可见，孙中山对民族与战争的关系认识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战争观中阐述民权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时，强调了反对封建主义，并把二者有机结合。他认为以战争手段实现民权，为民权而战的革命是正义的，并认为必须要以“为民权而战”的思想精神来武装群众。

他从改良不成，认识到只有武装才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但在他后来所走的武装起义和武装保卫民国的道路上，他才发现依靠帝国主义和依靠军阀打军阀是行不通的，他说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根本祸乱，由此他认为要以武装斗争即以战争为主要形式，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铲除中国长期动乱的根本，实现民族、民主革命。

孙中山认为时代已是民权时代，因而为民权而战是正确的。他说他领导的战争迥异于中国古代那些争做皇帝的农民起义，而是为民权而战，所以他们的革命是正义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由于君主专制时间过长，君权影响很深，这就是军阀混战的根源所在，战胜战败都未能使人民得到真正的权益。所以必须要以民

权主义武装人民和革命军，让这支与皇帝不相容的革命军去摧毁皇权统治，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实现真正的民权主义。第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不如前二者紧密，但仍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不需要战争，但必须进行民族、民权革命战争，为实行民生主义开辟道路，创造条件。可战争却少不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在战争中有重大作用。

他认为用革命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中国经济不发达，直接用暴力革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在经济较中国发达很多的俄国都行不通，中国更是行不通，在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一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

但民生问题的解决在战争中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孙中山认为军事行动需要财政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他还认为民生问题的四个方面即衣、食、住、行也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他说在中国解决贫苦工人、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对国民革命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战争观，是一套相对于三民主义战争观又有了改进，更具特色的战争观。这套战争观与他思想上的根本转变有极大的关系，他这一套战争观的阐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作用，他要求每个军人都必须懂得为民权而战的道理，要为三民主义为革命去牺牲。新三民主义战争观的阐述，鼓励了一批批革命志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

孙中山外交谋略

德国是我们的典范

孙中山也清楚认识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在镇压 1900——1901 年义和团，以及在 1911 年中国武昌起义的日子里表现得尤为富于侵略性和反动性。更毋庸讳言，德国占领青岛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但是德国同俄国、英国、法国或日本——它们部分地吞并了或“租借”了我国东三省、台湾、广州、香港、九龙、威海卫、缅甸、越南——相比，应该算是中国第二流的敌人。要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发展中国，孙中山认为学习或利用德国，也许是外交方面的上策。

孙中山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应该说是他的德意志观决定的。因为他对德国两个方面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一，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对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即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其二，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在经济改革和军事上一跃而成为了强国感兴趣。

孙中山这种德意志观使得孙中山对德国比对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更少的批判态度。他希望于德国于 10 年或 20 年之后，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他甚至提出以现金或错款形式赔偿德国的一切支付，并保证德国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孙中山在提出这种说法的同时，考虑到面临着一战的德国在军事上的孤立，他希望德国会利用作战物资和教官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可以减轻德国军队在东部边境的负担。

很明显，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在辛亥革命之后争取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谋求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想在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领土主权的平等基础上，为资本主义大国进行投资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巨大可能性。并希望以此为条件，来换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这一外交思路起初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响应，德国人认为议会制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武昌起义时，德国人直接参加了清军方面的军事活动；后来又把赌注押在实权人物袁世凯身上，直到 1913 年才宣布承认共和国。

但是，孙中山总是不懈地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为他的运动寻求物资资助，想谋求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盛的中国的成立，并试图以日后振兴经济时的部分利益作为许诺。他寄以厚望的英国让他失望了，英国人不但卖力地支持袁世凯，还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对中国人采取暴行。

1917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政治特殊形势下，由于孙中山对英国态度的改变，使得他希望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想法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开始对德国政界开始了正面接触。

可接下来的是英、日，然后是美国强迫中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对德宣战。这一形势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不同派别的辩论。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反对对德宣战，并委托朱执信起草了《中国存亡问题》这本小册子。书中不但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说明了德国相对俄、英、日、法而言，是第二流的敌人，更从战争结果而言，说明了战争不管是协约国胜还是同盟国胜，中国总会是一个失利者，是列强战后进行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希望战争在 1917 年初结束，并热切指望德能将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在战争中谋求中立，既要与日本及美国结成友好同盟，又要尽可能地抵制俄国或德国在战后的优势，为维护世界

和平尽自己的努力。

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了孙中山这一态度，3月14日，中德断交，德国公使冯·兴策在回国之前指令上海总督卡尼平同孙中山保持直接联系，并打算资助孙中山200万美元，促使他推翻段祺瑞政府。但孙中山最终并没有得到这笔钱，总统黎元洪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推迟了宣战。

1918年，德国与俄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孙中山试图尽量实行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他派曹亚伯前往德国，试图进行下述建议的磋商：德国应利用俄国的帮助，把1万名军人派往中国边境，装备那里的中国军队，而用这些军队一起共同推翻段祺瑞军政府，作为酬报，德国可以从中国获得生活资料和原料，并优先参加经济技术发展、铁路建设和教育事业现代化等。可曹亚伯直到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到达被战败的德国。孙中山那一计划也就因此而搁空。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谋求的与德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合作走进了实际阶段。1921年5月20日，德国同北京政府缔结和约。9月，德国一位副领事与5月5日在广州登上总统之位的孙中山的秘使进行磋商，德国与孙中山的合作才能弄虚作假正走上日程。

孙中山谋求与第二流的敌人德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合作，而反对英、日、美、俄那种第一流敌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反民主反革命势力的策略，很符合中国古兵法中的“远交近攻”之计。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构想和实施足以见得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甘当小学生”

在孙中山的外交史中，与苏联的关系尤为重要。在他与苏联的外交中，他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策略，这种策略使他在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寻求苏俄对革命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革命后期所取得的进步和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与苏俄人的接触首先是在 1897 年，他在伦敦的一个图书馆时认识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伏尔霍夫斯基。后来，伏把孙中山的《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伦敦被难记》翻译并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使俄国革命者对孙中山有了初步了解。

1905 年春季，孙中山往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宣传革命、募捐经费时，又结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齐契林，并与他就革命事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1907 年，孙中山在《平民新闻》中获悉俄国革命的消息，发现俄国人的革命目标与自己很是相同，便希望学习苏革命成功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此时，列宁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具有极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并仔细分析辛亥革命的进程，详尽研究了孙中山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活动，指出了孙中山某些观点站不稳脚，并预言他将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得到克服。

1917 年 11 月 10 日，《民国日报》报道了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1918 年夏，孙中山通过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向列宁致电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 年 8 月 1 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刘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回信。孙中山虽未收到此信，但孙中山已清楚地看到建好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打算派得力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等前往考察苏俄的革命经验，责成他们尽快学好俄语。

1920 年末，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苏共党员维金斯基。孙中山迫不及待地问着关于十月革命，关于苏维埃俄国生活，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等问题。还表示了想同苏维埃俄国保持经常接触的愿望。

1920 年 10 月 31 日，齐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另一封信，建议恢复苏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孙中山于 1921 年 6 月 14 日收到此信，8 月 28 日写了复信。信中表达了他力求同苏维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信中还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造成中国继续分裂的罪魁祸首是帝国主义。信的结尾表达了对列宁和苏联人民最美好的祝愿。列宁尽管遭枪伤而患重病，仍向齐契林索取了这封信。

1922 年 4 至 6 月，少共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达林在广州数次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就民主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在 1922 年 8 月以后的一年里，孙中山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二个外交团团团长阿·阿·越飞书信来往频繁。1923 年 1 月，孙中山与越飞会晤，共商中俄合作大计，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孙中山确定了“联俄”的思想。他说：“我党以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3 年 2 月，孙中山回广州担任南方政府总统后，于本年夏季，向莫斯科派遣了一批国民党军事人员，去学习红军经验，年终，又在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参加下，改组了广州政府的军队，并建立了军校。

1923年10月，鲍罗廷应邀来到广州。孙中山在鲍的帮助下，认识到只有纪律严明坚如磐石的党才能担负领导革命的使命，并开始改组国民党。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号召党员向苏俄学习，效法俄国革命经验。

1924年8月29日，英国驻广州商团对孙中山进行最后通牒，要求孙中山政府停止反对商团。齐契林9月5日在《真理报》发表文间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商团发动暴乱前两天，苏联政府派遣的第一艘“沃罗夫斯基”号军舰载着武器弹药及黄埔军校所需要的设备抵达广州，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广州各报发表了对舰长祝词，平乱后，孙中山慰问了军舰上的所有工作人员。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发表演说，赞扬苏联率先自动放弃与中国的平等条约。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以英语口语述了致苏联遗书。书中说：“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预见我国之援助。……”

孙中山在与苏联的外交中，秉着一种甘做小学生的态度，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军事经验、党建经验，并力求得到苏联的帮助。孙中山所采取的这一策略是定符合中苏革命目标相同这一具体情况的。孙中山这一策略的运用促使了中国革命的进步。

必须同东南亚联系起来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是东南亚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二次高潮时期，恰好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之时，孙中山仔细分析中国和东南亚各方面的情况，发现两者无论从地理、历史、民族、文化，还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一样沦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革命目标，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同情和支援。

基于上述这种客观情况，孙中山在外交上定下了“必须同东南亚联系起来”的策略。孙中山先从华侨着手，因为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聚居最多的地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先为当地的华侨所吸收，然后通过华侨中的同盟会成员传播给东南亚各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还亲自或指示其战友给东南亚各国革命以支持，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暹罗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援。东南亚各国的斗争也影响和鼓励了孙中山的斗争。如菲律宾能抗拒西班牙和美利坚两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就使孙中山对中国实行共和充满了信心。

总之，孙中山同东南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者所进行的交往，是在“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的问题综合起来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为革命活动基地，利用各种机会与各国革命志士共同商讨民族解放问题时，所结成的风雨同舟、共同战斗的良好外交关系。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孙中山对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和菲律宾革命的支和援助。

1905年，孙中山从美洲到日本横滨，会见了因反法殖民统治而被迫流亡到日本的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潘氏精通汉语，却不能口语。孙中山与他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对潘佩珠领导的革命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对潘佩珠领导的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援助：潘佩珠起初因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主张君主立宪制，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逐渐认识了民主共和；为了为越南革命培养人才，储备革命力量，孙中山鼓励潘佩珠去发动越南青年赴日留学，兴起了越南近代史上的东游运动，后由于人数日益加多，经费很为困难，孙中山为越南留学生积极筹借资金，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习；孙中山还介绍潘佩珠与在振武堂学习的云南学生联系，以备日后越南能够得到云南籍中国革命党的支持；孙中山还给潘佩珠有机会在《云南杂志》发表《哀越吊滇》、《越亡惨状》等文章，以便唤起越南人民的觉醒和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孙中山还对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反法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对菲律宾革命的直接支持和援助，是从认识菲律宾革命军革命委员会书记长彭西开始的。1899年，彭西到日本买军火，经日本民党道领犬养毅的介绍而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与彭西因志同道合而成为了不逆之交。孙中山经常奔走无虚日地为彭西购买军火。1899年7月19日，孙中山通过犬养毅买日本船布引九从门司港启航运军火赴菲。孙中山此时与彭西已结下了牢固的战斗情谊，孙中山与彭西约定，当菲律宾革命军对美侵略者大举反攻时，他将率兴中会会员人菲助战。彭西也以菲律宾革命军的名义馈赠十万元给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经费，并承诺日后将派人人中国内地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

后来，布引丸不幸触礁沉没，孙中山在 1900 年 1 月为菲律宾义军购买了第二批枪械，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无法运菲。但这并没有挫败孙中山援菲的信心，1900 年 6 月，孙中山派遣了数百名中国人参加菲律宾革命军，援助菲律宾的革命。

孙中山绝不只是支援过越南和菲律宾两国的革命，在他要与东南亚联系起来的外交策略支配下，他对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十分关注和支持。在他的鼓动下，东京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这个协会由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等国的青年学生组成，这个组织使他们认识到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命运，为他们日后参加革命并维持各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打下了基础。1908 年，孙中山与潘佩珠等人组织了“东亚同盟会”，以把亚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志士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

孙中山除了直接参与了领导亚洲各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的行动给各国民族解放事业极大推动外，他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也给亚洲革命带来了极大影响，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就说自己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影响。总之，孙中山不但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还对整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样：“孙中山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也正因为他的革命的世界性，使他更伟大。

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

从鸦片战争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到一战后中日签订“二十一条”的7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或以战争威胁，或以政治讹诈，胁迫中国政府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包括协定章程和合同等等）。这些条约既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到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特权的法律形式的体现，又为他们进一步“合法”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而正是这样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不但认识到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也逐步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在他整个革命过程中，他在外交上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作了艰苦的斗争，特别是他在晚年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更是带着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孙中山在早期革命中，对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流亡海外，外境十分恶劣，他不仅被清廷的暗探所追踪，又一直处于各国政府的严密监视，动不动就得被驱逐出境。他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对诸如不平等条约等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另一方面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他指望帝国主义会对中国革命保持“善意的中立”，不要干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慢慢看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到他们不但不支持革命，反而大力支持袁世凯篡权和极力扶持南北军阀。孙中山明白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在中国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绞杀下丧失殆尽的。因此，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使孙中山开始了态度鲜明地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15年1月18日，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3月10日，孙中山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1920年8月，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在日本直接干涉山东问题上，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抵制日货，及其他继绝经济关系之法。”

在致力国内革命的同时，孙中山密切关注并警惕着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支配中国的形势。他指出“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思为瓜分”，“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而外扰日迫，瓜分豆剖危机，在昔不过危言恫吓，近日见之实行”，中国开始落到“殖民地”甚至“次殖民地”的境地，对外患的十分紧迫的反抗感，使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那是些什么条约呢？就是满清贵族把我们的主权、土地押到外国的条约。”特别是对新出现的“二十一条”，尤为反对。他愤怒地说：“这是日本制的最初的铁锁链，来绑中国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就是日本把整个中国征服去了。”

孙中山全面地分析批判了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直接经济侵略的手段。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把持了中国的海关、金融、海运和特权营业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每年的损失超过12亿元。而且，帝国主义当他们经济侵略无法得逞时，就运用政治压迫的手段，这使中国民族工业只有失败的路子可走。

所谓的“协定关税”，不但不保护自己人，还去保护外人，使得中国的土货竞争不过洋货，这就造成了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孙中山愤怒地说：“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

此外，孙中山还对领事裁判权、鸦片贸易、传教活动、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基于这种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孙中山产生了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态度。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明确表态：“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就在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即宣告要建立实现包括领土、民族在内的五大统一的共和国，其中就包含有收复失地的意思。

在1923年9月、10月，孙中山先后两次照会驻广州的领事团，要求今后向他的政府支付在中国南方所征收的并由外国海关支配的关税“余额”，而不能再用于豢养北京军阀。英、美、法却从它们的军舰调派陆战队保护广州海关，并在广州泊集了19般外国兵舰。1924年1月3日，孙中山接见美国驻华使舒尔曼，指责列强阻挠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正当主权行动，“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为一殖民地则事实也。”1月9日，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六国在广州联合举行针对孙中山的海军大示威。但孙中山不顾各种威胁和压力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24年2月，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申了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且开始制定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政治特权为主要内容的七条对外政策。

孙中山对待不平等条约所采取的对外政策，表明了他的认识和态度，使他超出了前人和同时代人许多，也正是孙中山这一对外政策的采取，使得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由个人的谴责汇合为千百万群众的革命运动，揭开中国历史上反帝斗争的新篇章。

利用外交空隙护大革命

19、20 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之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怎样才能把祖国从非常危急的局势下挽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当时每个爱国者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日本，作为中国的毗邻，曾与中国一样有过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然而当中国成为列强竞相掠夺，被人豆剖瓜分之时，日本却由于明治维新，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变革，只用 30 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列强百年的路程，成功地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鲜明的对比使得许多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要富强，得向日本学习。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了一种热潮。从 1896 年，第一批留学生到达日本开始，至 1920 年已增至 14258 人。这批数目巨大的留学生，到日本后就与当地的华侨结合起来了，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革命热情的革命力量。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等人不得不亡命海外，“欲纠合华侨，以收臂助”。但选择哪一个国家的华侨聚居地区为革命的主要基地呢？

孙中山认为日本华侨社会是最理想的基地。日本除了地理相近，信息易通，便于筹划外，还有就是日本政府对革命派所持的政策有利于革命。

日本对华的国策是自私的，他们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先进国家后，就把中国作为了他的侵略目标，尤其是在其政府居重要地位的军方为争夺中国，早就想利用中国革命的机会，扩张在华势力。他们认为，与其去支持奄奄一息的清政府，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变革现状的年轻力量上，以便届时进一步谋取和保证日本在华的未来利益。因此，他们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给予容纳和资助，甚至为他们某此活动还提供便利。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革命后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得更透了。但他双重政治性格中的实用主义，促使他为了革命成功，采取了利用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空隙来发展革命。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又于 1895 年 1 月，取道横滨去香港，与当地华侨取得了联系。10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乘日本货轮“广岛丸”逃亡日本。到横滨后，在冯镜如所开设的印刷店，着手发展和组织横滨的兴中会。1895——1905 年间，孙中山先后 11 次居留横滨，开展工作。

1905 年 7 月 9 日，孙中山重返日本，8 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此后，革命中心从横滨转移到了东京，革命的重心也转移到发展知识分子身上来了。日后，日本的革命力量给国内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胜利后，日本华侨沸腾了，他们不但剪下了自己的辫子，还落下了领事馆的黄龙旗，各种团体名称前都冠以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还筹款支持和组织“敢死队”回国直接参加革命。

1931 年，“二次革命”失败，8 月，孙中山不得不又一次来日本寻求华侨和日本政府的支持，然而，日本政府已寄希望于袁世凯，以谋取更大利益，对孙中山不再予以欢迎。孙中山因考虑来日本便于指挥革命，与神户的革命党人李恢修、宋嘉树以及萱野卡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使得日本政府同意孙中山在日本居留。此时袁世凯悬赏 10 万取孙中山首级并派出刺客经朝鲜釜山来到日本，孙中山在华侨的保护下安全渡过了难关。

此时的孙中山仍然利用日本政府对待革命的暧昧态度，在日本抓紧机会

发展革命力量。从 1913 年秋至 1916 年 4 月连续 2 年 9 个月中，孙中山以东京为主要居住和活动地点孕育、组建中华革命党，重整旗鼓，积极发动反袁斗争。1913 年 9 月至 1914 年 7 月，共 692 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中东京本部就有 524 人。这些人或捐款资助革命，或亲身回国参加革命，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新高潮。袁世凯仅仅做了 83 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1917 年 3 月，张勋复辟，日本华侨又立即表示反对，坚决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1924 年 11 月 28 日，从上海绕道日本去北京的孙中山，应神戸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邀请，在神戸高等女子学校作出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利用日本政府给他的这样一个机会，把演讲台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提醒日本政府“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不但提醒了华桥要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也敲了日本民主人士的警钟。

从 1895 年登上日本国土起，到 1924 年转道日本去北京这 36 个年头，孙中山先后 15 次来到日本，累计居住时间达十年之久，占他整个革命生涯的四分之一多。他利用日本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暧昧态度，极大程度地发动并发展了日本华侨和留学生的革命力量，为他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学习一个英国，反对另一个英国

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存在着双重的态度，特别是对英帝国主义。因为他发现自己及身边一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及爱国志士，都慕仰帝国主义物质上的成就，体会到自己的国家也有这种现代化的要求。但是，他们在本性上对帝国主义者及自己国土上协助列强掠夺的政体有着一种必然的愤恨。这就使得他们在佩服西方文明的同时，又变成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这其实也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政体，允许自己的人民享受正义和自由的恩惠，同时，他们在国外却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掠夺。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理想及原则与海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怎样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呢？孙中山认为既要学习和利用他们在国内所采取的自由与平等政策，又要反对他们对中国等殖民地国家所采取的野蛮掠夺政策。孙中山这种外交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如何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上。

孙中山 13 岁开始读书，初小在夏威夷英国教会小学，中学在夏威夷和香港，学医在广东和香港，所受的教育均为西方的学制，其中以英国势力影响为主。在这种教育中，学到了英人所爱好的自由，也学到了英国人民怎样为了限制他们统治者的权力而斗争，以及如何保证个人权利，怎样设立宪政府，他还非常羡慕英国的科学技术和政府工作的效能。

1896 年到 1897 年，孙中山曾旅居伦敦九个月，在这段日子里，孙中山曾被中国使馆监禁起来，并企图把他遣送回中国处死。因为他的朋友、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亲自出面交涉，惊动了英国本上的新闻界，并造成了极大的舆论，才迫使英国政府很愿意装聋卖傻，姑息清政府让他们引渡孙中山，但报纸上一登出这件事之后，就引起了公众极大的舆论，英政府就不得不干涉了。

这次事件，使孙中山认识到居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由于法律制度的保障，他们能要求公正、个人权利和福利。他由此产生一种要学习英国文明的决心，正如他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说：“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赖英政府秉慷慨为民之精神，得蒙省释。予于英人之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也正由于社会公论挽救了他被绑架的插曲，使他产生一个利用公从舆论影响英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了争取英国社会的支持，孙中山 1897 年 3 月给一家英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政府的支持，他说如果大英帝国采取中立的立场，他的政党就可以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并许诺将来的革命新政府完全可以给英国提供一些有益的投资机会。他企图以此来掀起舆论以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

孙中山还试图直接与英政府交涉，以求得他们的支持。1911 年武昌起义，孙中山闻讯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去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阻止住他们向清政府贷款。希望他们支持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哪怕是在他事业中最黑暗的时候——1922 年 6 月后的一段日子，陈炯明背叛了他，陈的属僚叶举把他驱逐出总统府，乃至广东省时，他都没忘记包括英国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优点。1922 年 8 月 9 日，在广州湾炮舰上，他

与好友摩汉就说过他相信西方国家都会对支持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感到真正的兴趣。

但是，也就是早在香港学医时，他就发现“另一个英国”的面貌，发现了大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居民的歧视。因为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中华学生毕业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所承认，而致使他们白白浪费了5年时间。他的心里此时就埋下了一颗反对“另一个英国”的种子。

后来，英国外交部为了缓和清政府非法释放孙中山的愤怒，竟然在香港恢复了驱逐他永久出境的命令。这命令并不符合英国的法律，让他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反感。辛亥革命时期，英帝国主义的政策造成了辛亥革命的恶果，遭到了孙中山愤怒的谴责。特别是不久后，英国支持袁世凯，并涉及到暗杀宋教仁的案件时，孙中山激烈地反对英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他揭发了英国背叛了本国所持的理想，在中国支持反民主力量的行为，接着，当英国蛊惑中国参加盟军反抗德国时，孙中山让朱执信协助他写了一本《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揭露了英国准备出卖中国而致使帝国主义者从中获利的行径。当然他此时仍没有忘记西方国家的文明和科技。

学习和利用公平正直的“一个英国”，坚决反对残暴的“另一个英国”，是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所采取的外交策略。这与列宁、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人所提出的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态度的思路是相通的，在当时世界民族运动中有着闪亮的光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的科罗拉多州进行筹集革命经费的活动。当他从报纸上欣然翻得这一胜利的消息时，原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酬生平之志。但他仔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一，而要搏组之间”，应周旋于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和寻求到对革命的支持。

他对美、法国抱有幻想，认为他们会“同情革命”，在他经华盛顿时，曾要求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被拒绝了。要求会见法国驻美大使朱塞龙也未成功。

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英国来到法国，在巴黎停留了3天，与法国政界、财界以及新闻界一些人士进行了交谈，但始终未能见到法国外交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很显然，孙中山曾寄予厚望的法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样，对孙中山采取了回避态度。

孙中山意识到了“樽俎之间”的难度，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他到巴黎一方面想阻止法国及四国银行团贷款缓清政府；另一方面谋求他们对革命政府的支持；还希望法国对俄国施加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互相勾结，在中国扩大势力和干涉革命。

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及四国银行团，对中国革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正如四国银行团驻北京的法国代表贾思纳所说：“从这场革命方面，我们决得不到任何好处。”“继续保持满清王朝，仍是最好的可能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反对建立共和，挽救满清王朝，才符合法国的在华利益，这正是法国政府在辛亥革命时对华的外交政策。

但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法国想扶持一个什么摄政王的计划落空了，便与其他列强达成了共识——利用袁世凯来控制清王朝。法国积极促成四国银行贷款给袁世凯，并希望借助袁世凯来控制中国局势，以维护法国在华利益。

孙中山就是在这时来到巴黎的，其中一项重要事务就是11月23日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见面，希望能立即或在最短期内向革命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以所谓的“严格的中立”为借口，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到巴黎的另一目的，就是谋求法国政府对建立共和制政府的支持。他发表演说：“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法为共和先进的，当必稍以助中国。”但是，法国政府怀疑共和制能为各省共同接受，各省的分歧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对孙中山的要求断然拒绝。

孙中山还力图通过法国给俄国施加影响，劝阻盟友俄国不与日本沉湎一气，在中国扩大侵略和强行干涉中国革命。西蒙不但没有答复孙中山，反而全言答复了俄国的照会，满足其肢解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在巴黎所作的努力，没有一点效果，但他非常明白外交这一着的重要。他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1月24日，在他离开巴黎的同一天，他的代表胡秉柯访问了法国外交部，询问法国政府是否打算承认中国即将成立的共和政府，法国外交官员布瓦梭纳不但以要估计时局为借口表示拒绝，还要求中国必须对“法国人的安全”负责。

因为共和制将有损于列强在华的利益，法国坚决要求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同法国政府估计结果恰恰相反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君

主立宪制。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华东、华南的利益。率先放弃了要采取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法国不得不也如此，但他们所支持的共和政府又并非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失望地离开法国后，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就职。孙中山虽然对法国政府很是失望，但他在成立临时政府后，仍不畏艰难地争取列强的承认。他于1月11日致电法国政府，通知任命已在法国的张翼枢为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同日，外交总长王宠惠也致电法国外交部，通知临时政府的成立，要求承认。要借法国政府为维护在华利益，伙同其他列强一起拒不承认孙中山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而在中国扶持起一个所谓的“新秩序”。

法国政府伙同英、美、德、日、俄6国贷款给袁世凯，并企图以此来攫取中国财政监督权。孙中山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试图以建立中外合资银行的方式来抵制这种侵略，未能成功，1912年4月26日深夜，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正式签订。4月26日，国民党派代表向袁世凯抗议反对代理款将不得国会的同意而签订。签字前，国民党代表又提出严正的抗议，但同样遭受了失败。孙中山不得不施加外交压力，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反对北方，并以武力反对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但最后孙中山这一威胁并没发生效力。5月21日，善后大借款的债券在巴黎及其他欧洲市场开始发行。

善后大借款的签订，使袁世凯有了镇压革命党的资金，立即派兵南下，镇压革命势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迫于袁世凯的武力，达成了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南北势力形成对垒的时候，试图以断绝反革命的外援而寻求对革命的支持，是符合“上谋伐交”的战略战术的。他在外交几乎看不到希望时，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不舍的政治性格决定的，也是当时的形势下，他对于外交所采取最好的策略了。

走私人路线打入政界

孙中山和法国政界的关系起于1900年,从此后到1912年共和国成立时,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最为密切。不只是1905年至1908年间,孙中山在印度支那边界的华南各省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法国的默认,还在1911年11月孙中山访问巴黎期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都说明了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密切关系。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密切关系还曾迫使孙中山天真地认为法国政府同情中国革命。

那么孙中山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建成这种与政界的密切关系的?他走的基本上是利用私人的关系敲开一条紧闭门的道路。

孙中山首次与法国官方人士的联系是在1900年3月,他通过一个中国裁缝和东京法国公使馆一位人员接触。通过这样的关系,孙中山会见了法国公使阿尔芒,并向他请求安排会见印度支那总督韬美。1900年6月7日,阿尔芒写信通知韬美说孙中山将到达西贡,请他自行决定是否接见这位中国革命家。阿尔芒告诉韬美孙中山想先以两广和福建为中心建立独立民主政府,希望获得法国武器和军官的援助,并说孙中山愿意接受法国的一切要求作为交换。

但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认为法国不值得为孙中山这样一个人去冒险支持,他向殖民部长表达了他反对援助孙中山的意见,并指示东京法公使拒绝孙中山希望再次会谈的要求。可在巴黎的指示于1901年1月6日到达东京前的两天,阿尔芒已同意接见孙中山,并被孙中山的爱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胸襟所感动。为孙中山作了走下一步私人路线的建议和安排。阿尔芒说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军用一样,不会向中国输送武器和教官,但印度支那总督或许能够帮上这么一个忙。因为一个地方官与一个叛乱分子的关系,远不如自己这样一个外交首长与一个叛乱分子的关系对法国政府有那么严重的影响。阿尔芒安排了孙中山与韬美会见,安排孙中山与驻广州法国领事联系。

为了更大地打开与法国外交的缺口,孙中山许诺,法国人将被授与在他将来建立的共和国里拥有铁路建筑和开采矿产的权利,还拥有陆运进口免税权和对两国有利的一切要求。孙中山这一政纲虽然没有改变德尔卡塞认为与“煽动者”的任何合作都会引来麻烦的态度,却在法国政界产生了收效。尽管德尔卡塞写信给韬美叮嘱他要谨慎从事,韬美却因为孙中山的政纲很符合自己在印度支那的远大计划而置之不理,韬美计划提高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和扩大它在该地区地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华南发展铁路、矿产商业。而且,在韬美与孙中山的进一步接触之后,韬美被孙中山的反君主思想和现代主义信念所吸引。为孙中山日后的革命行动提供了许多方面的便利。

韬美离职后,博继任了印度支那总督。1902年12月,阿尔芒又发出密函通知博,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情况。博又对孙中山表示了高度重视,尽管他无法同意孙中山创立一个“华南联邦共和”的政纲,却提出了保护孙中山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要引渡孙中山的话,法国政府应该拒绝,还有应付北京派来的打手而对孙中山进行暗中保护。

1905年2月到6月,孙中山两次停留巴黎,会见了新任法国众院议长韬美,孙中山又一次利用了他与韬美的私人关系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他在韬美的介绍下认识了议会中“殖民派”人物埃里臭、毕盛、班乐卫等人。孙中山还通过共济会与工商办的联系认识了一些金融家,尤其是东方汇理银

行和鲁继埃所创办的法国工商银行。孙中山从他们那儿得到了大量的援款，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孙中山被外交部的雷奥两次接见。由此，孙中山广泛地接触了法国政界人物，为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走私人路线时，善于利用正义和自由的拨动韬美和共济会友人的心，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事业出点力。孙中山还善于利用他们欲维持在华利益的心思，使他们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日俄战争后，印度支那十分薄弱，孙中山见机提出一种想法说，法国如果援助他，就可以抵制日本的威胁；日本假如战胜，日后便会支配北京的政策；假如战败，便会在华南寻求补偿。孙中山这种说法，使得韬美等人考虑支持孙中山，答应贷款给他买武器。并形成了一个包括交趾支那（南圻）代表众议员德隆点尔、陆军部长贝尔托、殖民部长、雇主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克莱芒泰尔和部份商人在内的组织，支持孙中山，利用孙中山作为殖民扩张总署一分子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1905年3月底，中国情报处成立，7月，布加卑上尉被任命为处长。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交往面越来越宽，后来，由于布加卑事件，支持孙中山的法国政界人物的下台，使孙中山在法国寻求支持的可能性减少。

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共和工商界人士不再接见孙中山，孙中山开始寻求“激进社会主义”左派的支持和新闻舆论的支持。激进派对孙中山的好感是以思想和哲理上的信念为基础的，他们与商界联系少，本身反对对外干涉主义，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给孙中山什么很大的资助。1912年辞职后，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交往日益减少。

孙中山这一外交策略是根本可行的，他靠着自己的私人关系，利用法国的势力，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作了极大的贡献。

孙中山党建谋略

分子淘汰，去恶留良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能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得到根本转变。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胜利，而且还时而遭到打击和排斥。在他革命过程中，不但感受到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生活也越来越苦，还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一样，无法再有效地进行革命。孙中山欲起沉疴，却一筹莫展，对过去的战斗道路陷于了绝望。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了革命政党要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要广泛地联系和发动群众。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党性纯洁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因此，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领导的国民党。1922 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进国民党的会议，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首批共产党人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1923 年 1 月，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和考察；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南下广州领导改组工作；还召集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招收新党员、选举大会代表，起草新党章和党纲等活动，为改组国民党作准备。

1923 年 11 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孙中山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几经易名的 20 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改组宣言》的发表，说明孙中山认识到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开始探究改造中国国民党以挽救中国的办法。并强调了改组国民党时注意组织纪律和党性纯洁性，为此还突出地强调了“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方式方法。

两个月后，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不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还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

孙中山这些激进措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大时，《一大宣言》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他们对民生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款表示了极度地反对。孙中山这些条款正是衡量自己政党革命性的标准；对这些条款支持与否，正是衡量党员是否为合格党员的标准。他在后来发表的《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中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

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这一切表现了孙中山对其改组后的党人所作的严格要求，力图建立一个真正革命党的决心。

孙中山还多次提醒党人说：“同国民党吧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话表明了他为了组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坚持“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决心。例如在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右派进行毫无顾忌的反对活动，孙中山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如对邓泽如等，就多次严厉地批驳其反动的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场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了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措施；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以保证党内的团结和统一。

孙中山以“分子淘汰，去恶留良”为方针，纯洁了国民党组织，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提高了党性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孙中山后期革命所取得的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894年6月，孙中山通过盛宣怀以及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蛙上书求见李鸿章，力图走改良之路拯救中国。李鸿章非但没有接见他，而且也没有采纳他任何意见。上书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只有革命，才能换求中国的危亡。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再度去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并于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号召。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筹划起义，准备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察觉，结果这次起义没有正式举行就被扑灭了。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孙中山经香港流亡日本。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以流血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武装起义的道路。

从此，全国各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哥老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在大江南北，各影响一地，使革命之火烧遍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各自领导了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带领三合会600多人在惠州起义。起义一度发展到二万人，声势浩大。但由于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政府破坏而告吹，最终起义失败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流亡海外，从1901至1909年间，他为革命来回地奔流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发展状态，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党。于是，他努力去结识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的革命，一面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在美洲的会党，组织革命团体。为了进一步集中和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极力主张把各革命小组织联合起来。

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不返，途经越南西贡时致书新加坡爱国华侨陈楚楠说：此次赴日将洗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

七月下旬，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畅谈革命形势，并建议把兴中会和华兴会联合起来，黄兴当即表示赞同，不几天，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指出革命如“不相联合，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须有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并主张联络两广会党，以期“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余人，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许多革命团体和部分个人。全国除甘肃等省外，17省都有人参加。

会上，孙中山首先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强调必须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一个新的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会

上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关于联合的倡议，联合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建议谈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孙中山还亲自起草了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了同盟会的宗旨。会议决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会议还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为机关报。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黄兴为庶务部长，协助孙中山工作。

在孙中山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各革命小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建成了。它的成立，摆脱了昔日那种“各革命小团体”各自为政，力量薄弱的困境，把中国革命小团体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

同盟会成立以后，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

比如，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统一思想。后来的同盟改良派所展开大论战和日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成功举行，都得益于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党。

政党应注意道德建设

孙中山很注意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还能以革命家的姿态，把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和革命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革命的实践中来研究和阐述道德问题。他所提倡政党应该注意伦理道德就属于这个范畴。

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在对国民党一、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和现时的基本状况进行仔细分析后提出来的。他认为国民党自建设一来，就内容腐败，组织松懈，党员们或者消沉，或者背叛，还有许多人只是为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而来，毫无战斗力可信，而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缺乏伦理道德思想建设。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要靠革命党来发动领导，而革命党的强弱，则取决于全体党人道德精神智能的高下。他说：“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弱。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孙中山认为只有政党本身的道德是高尚的，作风是正派的，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和指挥力量，才能广得民心；才能推进革命、推进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样，他就把政党本身是否具备高尚的品德与能否建立群众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于辛亥革命后在上海所作一次演讲中所强调指出的：“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有他的道理的。归纳起来，不过于时代发展的潮流，革命党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伦理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要求必须加强政党的伦理道德建设。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革命不仅包括“军事上的奋斗”，还有“宣传的奋斗”。他说：“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心理改造”和“感化人群的奋斗”，就是提倡新道德，进行道德教育。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是当今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是当今国家削弱衰微的原因。要振兴中华，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这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发动者的革命党人，其所属道德范畴的所言所行应该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党人“必自己先觉，然后才能够觉人，决没有自己不觉，而能够觉人的。”因此，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而不应该沽名钓誉，他说：“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有了“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为公、为大众”的精神，革命政党不有力量，就能“以德服人”。他甚至认为一个政党的道德水准是决定一个政党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他说：“革命党之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构成。”“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孙中山把“主义、真理及道德”摆在革命政党建设本身的突出地位，在革命政党领导人民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奋力拼搏之际，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政党自身之道德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从革命政党的成员的思想道德观念上反映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对党员的道德思想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其一，孙中山要求革命者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他借助于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格言。说明一个革命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如果“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如果一人在世，“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裨！”

其二，孙中山认为道德和学问是革命者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但道德、政治思想应放在首要的位置。他告诫青年学生“宜先立志，否则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学问。他强调说革命者要有真才实学，空头政治家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学习要把握方向，一定要以革命精神努力学习，要“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这里，孙中山详细地阐述了学问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其三，孙中山认为，要树立一个好的道德思想，就要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也就是说要“修身”。他又认为革命者的修身不是教人闭门思过，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投身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通过刻苦的锻炼、改造和教育，“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从而确立新的道德概念。孙中山所强调的这种心理上的革命，实际上是自我道德陶冶，是道德问题上的破旧立新。

总之，不管是孙中山对政党道德重要性的阐述，还是他财政党道德建设所作的要求，都体现了他的论理道德思想所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他所强调的为四万万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要不惜“牺牲性命”和“牺牲权利”，批判自私自利，批判升官发财等等的思想，对他后来所进行党组织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成份要纯洁，组织要严密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让权于袁世凯之后，同盟会活动公开化，并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希望用政党来影响国会政治，以求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权。1913年春天，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国民党上下一片欢欣。但违背了掌握着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愿望，袁世凯亲手制造了宋案，把革命派又拉到与袁世凯政治对立的面。国民党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曾醉心于发展实业的孙中山，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觉醒过来，站到了领导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时，国民党已不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劲，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分而制之：党魁加以笼络，党员加以分化，激进分子镇压之，妥协分子收买之。国民党马上四分五裂，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更不用说来反袁倒袁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无一死于战事者”，怎么能战胜实力雄厚，早已具有狼子野心的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的结局，在它发动之初就注定了是一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

悲剧的主要角色——孙中山，在失败的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了，重新回头审视自己所依靠的力量——国民党，发现它早就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

其一，当初发展党员时，为了扩张声势，争取多数，不计品流之纯糅，鱼龙混杂，全都拉入国民党，“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和信仰孙中山及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是常常在关键时刻打乱党内的阵线和步调。

其二，国民党所执行的对袁本身就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一面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先让总统，继辞留守，把巩固共和、建设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施展才干，革命还竭力地缓和南北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千万个不放心，先订约法，接着又企图以政党控制内阁，钳制袁，以防他专制独裁。两种政策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在“大借款”、“俄库协定”等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以至坐失良机，招致大祸临头。

其三，是由于党内党员成份本来就不同，政见就更不一样了。领袖和党员之间，相互关系极不协调。许多党员不理解自己的领袖，认为领袖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了，而党员中一些较重实际的人，却认为“百万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枪”，而这种想法又不为党和领袖所支持。党员与领袖的不良关系直接影响了党的战斗力，以至于到反袁时，全党溃不成军，一击而败。

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为调整党内意见花了很多时日。尽管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黄兴、李烈钧，陈其美、陈炯明、柏文蔚等都先后举起了义旗，但时不待人，就在孙中山抓紧时间作调整工作时，袁世凯抓住了时机，布置好了屠杀革命的一切准备，导致了二次革命一败涂地。

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重振雄风，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归纳，他说：“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同党人心之涣”表现在“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

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因此，为了发动第三次革命，他决定从整顿组织入手，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自己被选为总理。他从改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组织涣散的教训入手，强调“中华革命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还吸取了原来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的教训，强调要使中华革命党的成份纯洁，他规定入党者必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并于誓章后加盖指模，以示忠诚不二”。他还把党员分成“首义”、“协助”、“普通”三种，三种不同的党员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利。还规定党的宗旨就是实现“民权民生两个主义”，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方式方法虽然是在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偏激的认识上进行的，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无疑在全体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反袁大旗，促进了护国起义的爆发；另一方面，从革命党的建设而言，孙中山主张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即“以革命精神图主义的实现”，又强调了组织上的统一和集中，要“正本清源”，坚决淘汰官僚和假革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它的某些精神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再次加以强调。

革命时要秘密，建设时要公开

一个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以地下状态的形式，秘密活动，以便颠覆活动；革命成功之后，此政治派别就可能成为一个“政党”，通过参政议政，来影响和把握国家的政权。这是近现代政治生活的规律，无可违背。除却孙中山没能看清袁世凯的真目原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改组为“政党”——国民党，是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党建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

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中间经过了同盟会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进渡性过程。

1911年12月30日，同盟会本部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革命胜利后革命党的出路问题，孙中山主持发表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宣布：“俊民国成立，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

孙中山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将革命党改组为政党，参政议政，是革命党的出路所在，也是自己这一政治派别谋求影响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方法所在。

南北和议之后，袁世凯信誓旦旦，“当守宪法，从舆论”。在这样的政局之下，革命党“保存从来秘密工作”的理由已不存在了，公开化的时机已成熟了，适时地公开和改组，才能保证党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公开和改组也是给仇视者一个最好的回答。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国内已日渐趋于公开化了，而此时素来对革命派抱有仇视观点的立宪派张春和宣布脱离同盟会的章太炎等人，大肆叫嚣说革命党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革命成功后，就应当立即“销去党名”。张、章这一言论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风浪，对革命党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和发展都极为不利，使得革命党内部许多人都产生了猜疑。要回答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秘密的革命党必须转化为公开的政党，才是革命党的真正出路所在。正如他所说：昔为密秘团体，一言一行，虽理由充足，然以干犯专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而“自去岁民国成立，吾党竟堂堂正正开大会于国内，研究建设民国诸问题，一言一行，均足以为轻重于现在之民国。”

公开和改组革命党，并不是解散革命党。宋教仁曾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组织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遭到了孙中山的反对。孙中山认识改组不是用“分离”和“解散”的方法，而谋合并、改组的途径。在孙中山、黄兴的指导下，通过宋教仁等在北京的努力活动，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实行了六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中人，“分道扬镳而去”者有之，“由同盟会分出，而又与同盟会为劲敌者”有之，蜕化变质，堕落成新权贵者亦有之。民国初年的同盟会已不适应党派林立、政争日烈，袁氏专制倾向日趋明朗的新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派要避免“独裁之弊”，立于执政党地位，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就必须集结队伍，重新组合，坚持与反动势力作正面的抗争。这种需要也要求革命党由同盟会的秘密状态，赶紧公开活动，成为执政党，以便联合其他几个有一定反袁倾向的小党，共同奋斗。把进步力量集合在自己这一党派的旗帜下，形成国民党的主流派，便于进一步革命。

孙中山为了更好促使革命党的秘密转变为公开的政党，在1912年秋至

1913年春，他就与政党政治有关的种种问题，诸如政党的起源、性质、任务，以及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必要性和实际地位、政党应具备的条件和党争的策略、方法等，都一一加以了讨论，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作了贡献。

中国资产阶级，从早期维新思想家“设立议院”的要求，到康有为的“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建议，再到革命派的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使资产阶级得以参政或掌权。孙中山所主张的“由革命前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党，在革命后转化为从事议会斗争的‘政党’，也是一般资产阶级政党演变的趋势和规律。”

孙中山人事谋略

既讲主义，又讲人情

康有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力图把我们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解救出来这段历史中的两颗巨星，都是我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潮，体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且他们还都是广东人，年龄也只相差八岁。然而，他们中间一个由维新领袖逐步蜕化，一个由民主革命的先驱不断前进，因此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同处那个时代，同是广东人，同样怀着拯救中国的政治目的，他们是怎样相处的呢？

孙中山在处理这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时，体现一个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他在处理与康有为的关系，不计小嫌，又力图互相联合，体现出一种“既讲主义，又讲人情”的原则。

孙中山与康有为大约都是在甲申中法战争后，开始探讨西学的。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分会，思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而此时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已趋于成熟，康有为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授学徒时，孙中山正在附近的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离很近。孙中山很乐意去结识康有为，而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孙中山试图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是孙中山含羞而终的。

1895年，陈少白因事至上海，与同棧而寓的赴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晤面，谈得很欢。这一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之后，革命派中的杨衢云、谢缙泰试图与势头正旺的维新派接触，谋求两派联合救国。在这种形势下，华桥汝磐与冯镜如欲组织学校，教育华桥子弟，请孙中山推荐教员，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康有为因为梁启超忙于《时务报》的事务，改荐徐勤担任，校名按康有为这意改为大同学校。大同学校应该可以说是孙、康早期联合的结果。

但他们交往的“蜜月”时期终未来到，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使他们各自心存疙瘩，即康有为替御史王鹏运草拟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奏折时，不惜将孙中山牵连于内，说孙中山与刘学贸易密谋广东起义。

百日维新期间，古老的中华大地如春雷惊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维新派这一举动深为敬佩。但康有为等人担心与革命党牵连有碍于仕途，有意与革命党人士疏远，就是日本的徐勤也尽量减少与孙中山、陈少白的接触。两党门户之见，日益分明了。

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李提摩太和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有的避于香港，有的藏匿于日本使馆。远在日本的孙中山闻讯后焦灼万分，乃找日本志士官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人商量，请他们营救。于是，官崎寅藏亲自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往东京；平山周也亲自到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易服到天津乘轮赴日本。

此时的孙中山不计前嫌，真诚相助，表现出他与康有为联合的真诚愿望和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不久后，孙中山托官崎寅藏、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没有到会，孙中山派陈少白前去拜访，又被拒绝。1900年夏，官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再谈“抛弃革命”、“联合革命”，康有为竟指控官崎和清滕为刺客。王照事件后，康有为竟在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里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

孙中山对康有为这些举动进行了批评，却仍没有放弃对康有为的争取。他说：“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

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中山因为章太炎、唐才常等人的转变而认为有争取康有为的希望。

而康有为不但无视孙中山的争取，坚持保皇不变，还把斗争的矛头由清政府当权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拼命地叫嚷革命要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之类的话。

就这样，孙中山在部署武装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对清政府的吠门之犬康有为进行斗争。孙中山一方面指出，只有“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另一方面，又揭露康有为“施诈术以愚人”，应该“破其戾谬”，“清除康毒”。孙中山又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号召大家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此后，康有为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呐喊与革命为敌的面目，天天地清楚了；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引导着中国一步步向前进。

孙中山对康有为的态度可谓是仁义尽至，在讲人情的时候，不忘真正的主义，在关键的时候不惜进行直接的斗争。这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不免为一种最佳的人事策略。

不忘旧功，不计前嫌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旗手，是一个具有世界声望的伟人；黄兴作为孙中山最主要战友，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也作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使得在创立民国的奋斗岁月中及民国创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革命中“孙黄”并称，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黄等革命党人逃亡日本，就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具体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使得孙、黄之间产生了裂痕，几十年的战友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孙中山此时在处理这个在革命队伍带有普遍意义的革命领袖间的关系问题时，起初免不了有点偏激，但纵观黄兴离开革命又回归革命的历史全过程，孙中山在处理这种人事关系上，采取了“既要批评，又要团结”的策略。

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前，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可以说是革命领袖间精诚合作的典范。孙中山以他长期坚持反清斗争的革命实践以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创造，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众望所归的领袖。而黄兴从同盟会建立之日起，就始终战斗在国内武装起义的第一线，发挥了出色的发动组织群众的能力和天才的军事才干。不管是亲自主持的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四次武装起义，还是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领导的汉口汉阳保卫战，都有力地阻止了敌人扑灭南方革命的图谋，为南方各省的独立争取了时间。黄兴总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到实处，因而获得“实干家”的称号，他的优点与孙中山的优点刚好能够相辅相成，各显其长，由此在革命队伍有着“孙氏思想，黄氏实行”的说法。

黄兴作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还能处处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同盟会内一部分原光复会成员章太炎、陶成章等煽起一股反孙浪潮，企图拥黄倒孙。黄兴能在调解无效之后，以磊落的胸怀揭露章、陶的用心，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成了革命派的核心，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坚辞大元帅职务，使得孙中山一回国就能顺利地组织政府，当上临时大总统。

黄兴还能随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保持与孙中山一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一回国就表明“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矛盾直指袁世凯。黄兴立即跟上了孙中山，放弃了妥协的政治态度，积极投入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并出任了陆军总长，与孙中山并肩一起，继续战斗。

但是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就如何处理此事的态度不同，造成了孙黄关系蜜月期的中断，并开始走向对立。孙中山此后在处理与黄兴的战友关系时，又是批评又是团结。

宋案发动后，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并想依靠外力立即进行“二次革命”，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并注意到了南北双方军事实力的悬殊，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直到袁世凯下令革除南方四督，并借来巨款用来镇压革命时，黄兴才深悔待时留决之作，匆匆赶到南京发动讨袁战事。而且黄兴虽代替孙中山去了南京，却背着一个指挥一场不得已而无希望取胜的战争的包袱。当李烈钧、陈其美失利的消息一传来，南京有孤立的危险而第八师又有不稳的迹象时，黄兴打招呼都役打，便抛下了士兵，离开了南京，经赴日本而去。黄兴的出走，影响了整个战局，整个战局顷刻之间全部瓦解。

二次革命的惨败，使革命派从功臣变成了被通缉的要犯，政权、兵权丧失殆尽，当孙、黄逃亡到日本时，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特别是互相指责的气氛。其中以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指责最为激烈，孙中山对黄兴的指责由战争责任上升到了不尊重领袖，不服从领袖指挥、调动的高度。使得二人由具体问题上的对立发展成“感情上的对立”。

然而，尽管孙、黄两人在重大原则上有分歧，但他们毕竟是多年在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友，两人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在处理与黄兴的人事关系时，在毫不客气地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应该团结。他在无法劝阻黄兴赴美 的情况下，为黄兴在美国介绍友人，帮助黄的生活；还在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中为黄兴留下了协理的位置，期望着黄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来，一起为革命奋斗。

后来，国内反袁运动之势继续高涨，两位领袖之间又产生了合作的愿望。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黄兴于 1916 年 7 月，经日本重新回到阔别了三年之久的祖国，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可惜的是不久后黄兴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孙中山亲自发布了发丧通告和撰写了挽联，悼念他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

孙中山对黄兴所采取的既批评又团结的人事谋略，不忘旧功，不讲前嫌，既是当时认真总结革命失败原因的需要，也是团结最有效的力量共同革命的需要，孙中山这一策略，体现了他优秀的领导才能和宽广胸怀。

要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

早在几千年前的刘邦起事，就把握了用骨干力量来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事谋略，刘邦用张良来处理国事，用韩信来用兵打仗，用萧何来搞后勤，几种分力合一种力量，让项羽一败涂地。几千年来的领导者似乎都掌握了这一规律，孙中山也不例外。孙中山在革命中注意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推动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培养和重用了以陆皓东、郑弼臣等为骨干力量；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以黄兴为骨干；黄兴远走他乡之后，以陈其美为骨干；1912—1922年间，廖仲恺开始成为孙中山在革命党中的得力助手。

这些骨干力量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发展。其中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最能体现孙中山的这一人事谋略。

1903年，廖仲恺与孙中山在日本首次会见面。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廖仲恺成为了“孙中山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在“为数不多的同志中”，廖仲恺是“最忠诚、最亲密、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人，”“他的革命活动和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密切相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廖仲恺“为推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最后并以身相殉，他无愧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

就孙中山与廖仲恺的关系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时间段，我们不妨就分为三个时期，来探讨孙中山实施这一人事谋略的过程。

第一时期应该是1903年至1911年之间，1903年春天，在神户神保町的一个留学生的聚会中，廖仲恺初次认识了孙中山。此后，廖仲恺就常去小石川拜访孙中山。该年，廖仲恺夫妇和黎仲实等人协助孙中山成立了一个“义勇队”。1905年，为了筹备同盟会，廖仲恺搬到了神田居住，常与孙中山来往，这时他们相处得象一家人。1909年，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营口及吉林做秘密的策反工作。这一段日子可以算是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阶段。

1912年至1922年是第二个时期。1912年初，廖仲恺和他那在清廷做官的亲兄廖恩焘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的会议，两兄弟因立场不同，谈判时互相对峙，一时传为新闻。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香港，廖仲恺和胡汉民一起去迎他来广州。第二年，廖仲恺在广州试行“单税法”，并向广东临时议会提出了改良地租的法案。该年6月，孙中山招待报界和数十名议员，发表谈话，支持廖仲恺的换契案。1918年，广州军政府改组，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

从1912年后，廖仲恺开始在革命党里担任重要职务。多年担任负责党内一切财务的财务副部长。1919年10月，中华革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廖仲恺担任了财政主任。1916年9月，曾被派往北京，与黎元洪总统商量国事。1921年，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并从1920年开始，就让他周旋于蒋介石和陈炯明之间，调解粤军内部的纠纷。此时，廖仲恺已在革命党内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

1922年6月，廖仲恺曾被陈炯明囚于石龙，脱险后，益感革命之需要，遂协助孙中山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政策，进而改变了中国国民党的命运。

1922年至1925年间，孙中山对廖仲恺更加倚重了。1922年秋，孙中山授意廖仲恺借口去日本参加廖承麓和许崇清的婚礼，在热海与越飞进行了会

谈，为 1923 年 1 月的孙文越飞会见打好了前站。

1922 年 6 月，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囚禁廖仲恺。使孙中山和廖仲恺拟订了以反帝和反军阀为目标为“三大政策”。“三大政策”遭到右派反革命的坚决反对。孙中山依赖廖仲恺的协助和支持，改组了国民党，创立了黄埔军校来推动国民革命。此时期廖仲恺身兼之职达 13 个之多，每天都要工作十六、十六个小时可见孙中山对其倚重之情。

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完全是着眼于革命骨干而言的。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的实施，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廖仲恺在国民革命的巨大作用说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武昌起义是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暴发时，其领导权没能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武昌首义后，各省宣布独立，但由于政治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未能防止立宪派和旧势力从内部夺权的阴谋，使独立各省的大权先后落在他们手中。一时之间，各派势力都试图在新组建的政权中占住优势。起义三个月后，匆匆从国外赶回的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他将怎样来处理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呢？既要团结立宪派和旧势力，又要保证革命党人在政权中绝对优势，孙中山和黄兴在组建临时政府时采取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妥协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海外，认为这样小敲小打不起作用，应积蓄力量，以图一举成功。

1911年9月14日——24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原定10月6日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日期。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配置炸药不慎爆炸，清政府在武汉大肆搜捕，领导起义被破坏。湖广总督瑞征杀害三烈士后，全城戒严，四出搜捕。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中下层官员，异常悲愤。10月9日7时许，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一排长在巡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北龙正在准备起义，问：“哼！你们要造反吗？”下令士兵捆绑熊、金二人。金一跃而起，大呼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先攻占了楚望台机械库，然后又占领了凤凰山、蛇山，第二天又攻克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因黄兴、宋教仁还未赶到，蒋翊武和孙武也不在武昌，革命党人就强推清军协领黎元洪出任武汉军政府都督。

武汉首义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大地。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50天内，全国就有15个省区宣布独立或起义，脱离了清朝统治。但由于革命党人政治经验不足，独立各省的大权都落在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势力手中。

立宪派与旧势力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钻进革命内部与反动力量结成联盟，对抗革命派，争夺权力，企图控制革命局势的发展。革命派和立宪派为中心的南方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争夺各省政权的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起义的湖北和上海几乎同时发出筹建临时政府的通电，都企图控制和掌握临时政府。双方争斗的结果，上海方面让步，各省代表会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代表会中，革命派和立宪派占相等的多数，另有少数的旧官僚，封建士绅，甚至还有清方的密探在内。

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由汉口移至南京开会。南京代表会已由23人增至45人，同盟会员占二分之一，其余是光复会员以及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南京代表会要选举黄兴为临时总统，又要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坚辞不受，主张等待孙中山回国。

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祖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有独立的17省代表45人出席，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每省一票共17张票中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早大孙中山就职前，革命派、立宪派、光复会领袖章炳麟以及湘桂等省都督都在酝酿，纷纷提出自己理想的国务员名单，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在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和宝昌路孙中山住宅进行紧张的密议。立宪派通过汤寿潜提出的名单，只将军事、司法两部交给同盟会，露骨地表示出他们要控制政权的企图。宋教仁等少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全用革命派的建议。孙中山、黄兴等不但拒绝立宪派所提出的名单，也不愿采用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方案。他们认为既要掌握政权，又要团结立宪派。旧官僚，决定采用“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黄兴提出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总长名单，几经磋商之后，1月3日代表会正式通过，各部次长及其他要职，由孙中山直接任命。

临时政权的组成由形式上来看，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江浙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和革命党人有过历史的联系，也曾在清政府任过要职。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旧官僚，是为了借重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席，极力在形式上造成各派联名的局面。而各部全都是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除汤芑铭外，其余次长蒋作宾、魏宸组、吕志伊、景耀日，马君武、王鸿猷、居正、于右任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除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外，各部部长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就职或不愿做空头总长，实际并未登合。因此，临时政府有“次长内阁”之称。

临时政府还接孙中山的要求采取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部三局，孙中山以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而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胡汉民、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焘以及其他要职，都是革命党人。

从汉口代表会、南京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立宪派代表锐减，革命派代表激增。临时参议院43名参议员中有33名是同盟会会员。参议院里成立革命派的天下。

在孙中山“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安排下，既联合了立宪派和旧官僚，又在临时政府中保住革命派力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同盟会在建立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孙中山宣传谋略

极力鼓吹，不避劳苦

宣传可以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宣传工作做到精妙之处，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黑漆漆的铁屋子里呐喊”的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就认识到了宣传的巨大作用和威力，一个好的宣传活动，足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他要革命党对邹容的《革命军》所作了的大量宣传工作，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表现。

邹容，1885年生于四川省巴县，当他1902年游海外，留学期间时，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邹容很快就接受了他的革命思想。1902年至1903年，邹容往返于上海与东京之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了留日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朝封建腐朽统治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1903年2月留日学生的新年团拜会，邹容响应了孙中山亲自确定的“革命排满”的主导思想，作了议论新颖，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一演讲标志着邹容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1903年5月，邹容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国，一个年仅17岁的学生撰书，首次明确宣称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为这个共和国提出了具体方案，制定了25条建国纲领，详尽而清晰地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景，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一直对邹容十分敬重，对邹那本卓越的宣传反满革命的著作《革命军》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充分肯定了它对鼓舞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并推波助澜，把宣传工作做到了极致。

《革命军》出版之后，孙中山就积极推动它的宣传工作。1903年10月，孙中山赴檀香山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就特别携带《革命军》作为同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他赞誉《革命军》说：“此书感支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并指出：“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篋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斗罢檀香山的保皇派之后，翌年春，孙中山到旧金山等地与保皇派继续斗争，因美国大陆的华侨未曾受过革命的影响，就以《革命军》作为打开工作门路不可少的宣传品，极力进行推荐和散发工作。他在致公堂黄三德及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翻印该书1.1万册，分寄美洲各地广为散发。全美华侨得到有力宣传品的启导，“不及半载，观念大变”。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为扩大革命宣传，还亲自组织了《革命军》的翻印和发行工作。他在1906年10月写信给新加坡的张永福说：“海外各地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册印费340元，二千册印费90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工，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并要求他们“竭力鼓吹，不避劳苦。”

正是孙中山这种在宣传上坚持“极力鼓吹，不辞劳苦”的策略，使得《革命军》一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在海外，该书“为排满最激烈的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国内，它也以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高昂激越的战斗格调，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使革命的呼声迅速蔓延于全国，在它出版八年之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华民国。在孙中山的促进下，《革命军》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鲁迅在《杂忆》中所指出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宣传上所作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

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

孙中山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功不可没的。他除了用自己的爱国革命行动作了模范带头作用外，还积极地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宣传和鼓动，把海内外的爱国志士对祖国的感情凝聚起来，动员全中国人民起来“合力救国”，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新国家。

孙中山以爱国主义为武器，煽起国民的觉醒，其主要宣传手段有四种。

其一，宣传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文明发达的伟大国家，激起人们的爱国爱乡之情。孙中山说：中国为世界最老之文明国，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为全球所无，它不仅有着“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而且又是东方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但因为“清虜人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现在只有“除虜”，打倒清朝统治者，才能“救民”。因此要振奋起民众的爱国心，就必须使“吾国人果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总之，孙中山以中国人眷恋国上乡邦的情怀为着手点，唤醒中国民众的强烈民族观念，将酣睡中的中国人引进现代进步时代，并以此为精神力量，去发动中华民族保家卫国。

其二，在领导反清斗争中，宣传和启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孙中山所坚持的认识论中，有着“行易知难”的认识，虽然“不知亦能行”，然而他认为只有正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行动。因此，孙中山在领导人民进行反清斗争过程中，注意以“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让爱国志士自觉地实行革命。他告诉国人：“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然而“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蛇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是因为中国民众并未真正认识到“使吾侪至贫极弱，日沦于九幽十八狱者”是“朝秦暮楚之政府，迎新送旧之官场。”所以，要“发达吾民之爱国心”，“与异族抗”，先要号召国民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然后“竖旗起义”，“驱逐满州皇帝”，才能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而要如此，就需在反清斗争中做好宣传，使中国民众与“文明进步，忧国思潮与时俱长”，做到全国人民“协力联合”，“披坚执锐，血战千里”，同清政府决战。

其三，宣传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中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如果“中国人再不觉悟，”长此以往，“不到十年便要亡国。”孙中山认定只有“大倡革命，”打倒国际上的“势力强权，”才能指望中国“复兴”。而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要靠“自强”，只要全国“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列强国家“方欲敬我之不暇，”也只有“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除其今日同帝国主义“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的惨况。因此，他坚定地指出：要争取民族独立，就必须立下决心，用爱国思想去激荡人们奋起革命。

其四，通过宣传发扬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传统和学习“各国种种文明”结合起来，加速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孙中山一生都在考虑着如何把中国的悠久文明发扬光大与学习世界各国的文明结合起来，以便加速中华民族的发展。

总之，孙中山善于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宣传发动国民来进行革命活动。

理不相容，势不两立

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海外。他们在海外依靠的也是华侨。这就与孙中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康、梁在海外举起了“保皇救中国”的旗帜，在各地华侨社会中普遍设立了保皇会组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皇活动。由于华侨本身就具有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又因为维新派较革命派更早地造成政治影响，使得革命派在华侨中的影响越来越小，甚至许多本已参加了革命派人最终都倒向了保皇派。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认识到革命派“向来专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并决力挽狂澜，拯救革命于危亡之即。他在试图谋求与保皇派联合反清失败之后，决定与保皇派作一次彻底的较量。

1900年，康、孙两派都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大好时机，先后在国内发动了自立军勤王起义和反清王朝的惠州起义。

康、梁企图以暴力手段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向各地华侨四处投书。各地华侨捐资甚丰，对保皇派寄予了极高的希望。但由于保皇会组织涣散，康、梁本人对起义的不负责任，特别是康有为不但拒绝回内地领导起义，而且还私吞华侨捐款60余万，对领导这次起义的唐才常不加接济，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保皇党人本身所具的局限性，使曾寄予厚望的华侨倍感失望。

而1900年孙中山所领导的惠州起义，虽未得到华侨很多的资助，起义军却一度占领了好几个县城，队伍发展到20000多人，声势浩大，起义虽失败，却造成了极大的优势。

两次起义的结果迥然不同地摆在华侨们面前，华侨中的激进分子纷纷投向了孙中山的革命方面。为了挽回这一颓势，保皇会开始正面向革命发起了进攻。1902年，康有为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辨革命书》，接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连续刊登康有为的《辨革命书》、黄遵宪的《驳革命书》等文。

保皇和革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保皇派利用他们宣传媒体向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而在1900年之前，革命派在海外尚无一一份报刊来鼓吹革命，宣传上显然处于劣势，政治影响也迅速缩小。檀香山不但“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使得“会员多以变节。厚者寥寥可数”，而且，保皇会的机会报《新中国报》还在大张毒焰，不遗余力地攻击革命。

孙中山意识到不将《新中国报》这一毒焰铲除，断不能做事。只有与保皇派人打一场“理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宣传战，才能争取国内外同胞的支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1899年末，孙中山首先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以宣传革命。1903年，孙中山赴檀香山，改组《隆民报》为《檀山新报》作为革命报刊。并亲自撰写了《驳保皇报书》、《敬告同乡书》等文，拉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前革命与保皇论战的序幕。在《敬告同乡书》中，孙中山严正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误也。”“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号召人们“划清界限”。孙中山还在檀香山华侨作革命演讲。从而使华侨“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

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经过革命宣传，并利用自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的身份，将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实行彻底改组，使之成为革命的喉舌，“旗垒为之一新。”从此“革命言论，鼓荡全美，华侨慕义者日众。”孙中山还通过《中西日报》刊印邹容《革命军》11000千册，广为散布。此外，在日本，孙中山还发动留日学生的先进分子，先后创办了《游学译报》、《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宣传爱国和革命的刊物，反抗保皇会的舆论攻势，促使了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的形成。

在孙中山领导下，与保皇派进行了“理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宣传反击战后，曾经风行一时的保皇思想日益没有市场了，而反击战后的革命派迅速壮大，并在1905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要发挥党报的喉舌作用

在与保皇派初期论战后，孙中山认识到了宣传在革命活动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1905年8月成立同盟会的时候，孙中山就促使了会议通过了以《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民报》）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寄希望此一刊物有成为党的喉舌，成为宣传和鼓动革命的园地，成为党批评和反驳敌对势力的宣传舆论攻势。

1901年冬天，保皇派的主要刊物《清议报》报馆失业停开。保皇派所从事的抵制和反对革命思想传播反革命行动和舆论攻势，立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1902年2月，保皇派代表梁启超在横滨山下町152号创办《新民丛报》，企图以之为中心，摆出一副新的姿态，对革命派进行攻击，梁启超的这一次反扑，很快就把保皇与革命的论战推向全面，提到日程上来了。

孙中山因为深知宣传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未雨绸缪，为与梁启超进行论战作好了准备。1903年孙中山首先发动，亲自撰写《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派》等文章，对梁启超的欺骗宣传进行揭露和反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亲自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并欲以此报为党的喉舌，作为反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的主要基地和阵地。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初版发刊词中指出，《民报》发刊的目的，在于“将非常革新之学说之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要成为同盟会的喉舌，发挥喉舌的作用。在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进一步阐发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孙中山提出的三大主义随即被同盟会宣传家们概括为“三民主义”。孙中山利用《民报》这一园地，充分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真正涵义。使这“真正伟大的思想”，不久后就传遍了全国。

1905—1907年间，《民报》在孙中山所规定“党的喉舌”的方针指导下，阐述了同盟会纲领，传布民主革命思想，动员华侨和国内人民投身革命斗争，影响日益广泛。其所阐述的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由此，爱国救亡，革命排满成为了海外留学生和爱国华侨中最有影响力的口号。这一革命气势，不但让清政府胆战心惊，也让保皇派哀叹不已。清政府官僚端方在给清政府的奏章里惊呼：“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人会之人，日以百计。”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哀鸣，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卡走卒，莫不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摄，而口为所箝。”梁启超对《民报》的兴旺，甚至抱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1906年，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就咬牙切齿他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死第二义，与革命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民报》作为党的喉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它的影响下，散布在各地的革命报刊以及倾向革命的爱国华侨，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报刊一面数十种纷纷投入了战斗，形成思想战线上的强大舆论攻势。

但《新民丛报》并不甘心，曾与《民报》进行了三次大辩论。1908年光绪暴毙使保皇派想经过光绪的复权而重新上台的梦想幻灭了。1907年，梁启

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被迫停刊。而革命派的《民报》在发挥孙中山谋定的“要发挥喉舌作用”，使得《民报》在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统战谋略

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孙中山长期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实践中，他十分注意和倚重海外华侨，把华侨也组织和宣传到祖国革命和建设这条战线上来。

孙中山出生于华侨之家，深悉侨情，正所谓“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我国人民移居海外有着很悠久的历史。19世纪之后，因为各种不幸的原因，移居海外的人就更多了，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的总数已达600多万人。不管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巨大的财力，他们在海外，由于身处异域，寄人篱下，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歧视而投诉无门，他们都因此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使他们摆脱“海外弃儿”的困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愿为祖国富强繁荣的事业尽自己的菲薄之力。这就给孙中山发动华侨共同参加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条件和基础。

但孙中山早期在华侨中的活动受到康、梁保皇党的阻挠。由于维新变法运动首先实行，其口号很适合于爱国华侨们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迫切要求，致使许多爱国华侨心向着维新派。还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忠君”传统观念，以及亡国灭种的威胁，民族的欺视与压迫，是海外华侨自觉参与和支持康、梁保皇救中国的动因。而对孙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活动很是反感。

当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华侨建立兴中会时，华侨多掩耳却走，“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被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其交游。

1900年，康、梁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时机，在国内发动了自立军勤王起义。由于康、梁的责任，起义失败了。保皇会组织松散，梁启超对此次起义的计划和准备情况一无所知。梁无法脱身，建议康有为回内地领导，被康有为拒绝。而且康有为私吞华侨捐款60余万，对领导此次起义的唐才常不加接济，使计划一再延期，最后被张之洞所侦悉而镇压，唐才常等六位领导人被杀害。生存者事败后宣布与康绝交，并亡命到东京找梁启超算帐。康、梁的保皇会从此后每况愈下。

而同年孙中山所领导的惠州起义，虽未得到华侨很多资助，却一度占领了好一些县城，队伍发展到二万多人，声势浩大，给了清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反响。

两次起义的结果，使华侨日益觉醒并转向革命。

孙中山为了争取国内外同胞的支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加紧了宣传工作。1899年，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1903年，又把檀香山的《隆记报》改为《檀山新报》，并亲自撰写了《驳保皇报书》和《敬合同乡书》两篇文章，揭开了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序幕。孙中山还多次亲自作演讲，鼓吹革命，不久后，留日学生也创办了一大批的报刊，孙中山还通过《中西日报》刊印邹容《革命军》1.1万册，广为散布。

这些宣传使形势大变，不言革命的人反而成了少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向海内外同胞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开始形成了海外华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线。

1907年，利用华侨的资助，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又筹款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

起义。1909年，孙中山又在新加坡南洋各埠筹募起义经费。1910年，孙中山又在檳榔嶼召开会议，决定筹款重谋大举。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又赴美筹集起义资金。

总之，在孙中山的侨力思想影响下，海外华侨或出钱、或亲自赶赴大陆参加革命活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死难的七十二烈士，就大都是华侨。

民国建立后，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便致力于发展实业，在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孙中山也采取了一种“与海外华侨共建祖国”的战略。

建设自然离不开资金，为了筹集资金，首先倡议在上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以振兴中国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孙中山的挚友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积极响应，认股十万元。孙中山委派上海银行家沈缦云和爱国归侨庄希泉，前往南洋各埠劝募中华实业银行股份，共得华侨投资300多万元。1913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正式在上海开幕，孙中山任名誉总董事长，沈缦云任总经理，吴世荣任协理，成为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华侨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尽管后来因为政局变化，中华实业银行被迫宣告解散。但是孙中山鼓励和保障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思路，对后来人有着启示作用。

军事上讲联合，政治上不放弃原则

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胜利之后，由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广州政权和大元帅府。此前，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

1923年10月5日，直系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后，又花钱买通议员，贿选曹锟为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就职，颁布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严重践踏了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的精神，使孙中山认识到“法律效力，悉被蹂躏于暴力之下。而且直系军阀仗着自己的实力，试图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这又使孙中山提出的和平统一之梦幻灭了。孙中山认识到要统一中华，改造民国，一定要北伐。

北伐的主要目标就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的直系军阀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权，拥兵40万，还具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力量。如果单单依靠南方革命力量来讨伐的话，作用很小。

孙中山仔细地分析全国的形势，发现曹锟、吴佩孚企图以“武力统一”的政策来建立直系军阀的一统天下，不仅与自己领导的南方革命力量不共戴天，还与其他各派军阀产生了矛盾。因此，在全国建立一个反直统一战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在建立反直统一战线时，如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为一派危害人民的军阀。这样，孙中山在既要利用军事合力来反直，又要保持革命军的纯洁性。孙中山提出了“军事上要合作，政治上绝不放弃原则”的统战谋略。

他这一策略最主要体现在他与奉系、皖系结成三角同盟时的互相团结和互相斗争之中。

1919年秋，段祺瑞虽然仍在执政，却深感日益崛起的直系吴佩孚对自己的威胁。吴佩孚还与桂系军阀勾结起来，对付段祺瑞。段祺瑞在这种情势之下，欲与桂系军阀的对头孙中山联合起来，上海和议时，段祺瑞派安福与孙中山联系，孙中山托王揖唐带书给段祺瑞，段表示自己也同意孙中山的观点，双方开始商洽合作事宜，慢慢形成二角关系。1920年下半年段系卢永祥支持陈炯明自漳州进军粤省，和1921年孙中山接见了徐树铮，表明了孙、段合作的开始。

孙中山还认识到奉直两集团不会长久共处，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直系，1919年末，派东北籍人宁武以同乡身份去与张作霖联络，双方开始了正式接洽。1921年下半年，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合作。

1922年以后，孙中山及奉、皖系均受到直系的巨大压力。孙中山由于陈炯明勾结直系搞兵变而避居上海，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奉系失败，直系开始独揽北京政权，准备武力统一中国。段祺瑞开始活跃起来，与孙中山、张作霖频频联系。

1922年3月，孙中山正式代表伍朝枢在奉天与张作霖密谈。张作霖“在事实上承认了广东政府”，并“与孙中山采取一致步调，双方同时以南北统一为急务”。5月1日，张作霖因为直奉战争的失败，首先将三角同盟之事公布于世。同年9月和12月，孙中山两次派汪精卫使奉，加强同盟关系，并争取其经济援助。应孙中山的要求，张作霖先后数次将几十万银元和一批军火送至广东，皖系卢永祥也援助广东方面10万银元和200万发子弹。

此时，孙中山考虑的这事上粤、奉、皖三方合作，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

令讨伐曹、吴，并出兵北伐，然后奉军出兵关内，直捣北京；政治上，坚持在打倒曹、吴之后，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问题。

1923年，孙中山与奉皖两系联盟极为频繁，穗、奉、津、杭之间的使者、电函往返不绝。10月，曹锟贿选成功，刺激了三角联盟。孙中山致电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祥，相张四方共举讨伐曹、吴。

为了进一步巩固反直统一战线，孙中山亲自或派代表与奉系、皖系进行军事和政治方案上的研究。军事上，通过粤方便于明枢、汪精卫、叶恭绰等与皖系吴光新、卢小嘉、邓汉祥等与奉系多方协商，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对直作战计划。政治上，由于各派政治见解，最终目的不同，在政治方案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孙中山只好坚持“军事上联合，政治上绝不放弃自己原则”的策略，以求结成稳固的反直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参谋部长李烈钧访日，照会日本政府，希求他们援助或站在中立地位。

1924年8月，直奉战争爆发。9月4日，卢永祥致电孙中山请其出师北伐。9月5日，孙中山复电同意出兵，奉张也给予浙卢以声援物质援助。8月底，三方经过有磋商布置，在孙中山力促和卢永祥强烈求援的情况下，奉军先发制人，发难朝阳。9月20日，孙中山不顾自己困难重重，毅然出师，分兵两路进攻湘赣。粤、奉、皖三方军事上的协调，声势上的互援，使直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孙中山与奉皖系的协作还体现在共同联系作内部分化工作。孙中山先后派徐谦、纽永建去作冯玉祥的工作，派于佑任、焦易堂、刘允丞等赴胡景翼处，派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做工作，促使他们从内部反对曹、吴。

在三方积极配合之下，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彻底失败，并在冯玉祥发动战时倒戈——北京政变后，使其政权垮台。

三角联盟中，孙中山始终起着一个导演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孙中山一贯主张联合各方势力以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当时，孙中山在内受到地方军阀的排挤，外有直系曹、吴的威胁和压迫。这使孙中山试图借助外力配合其北伐，打开一个新局面，他力求分化北方军阀，利用奉、皖与直系的利害冲突，三方合作，先击垮直系这个当头大敌，然后再扫除整个北洋军阀。正因为巧妙地导演了这个三角联盟，使他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处境，并把国民革命势力深入北方，为日后清除得到吴佩孚支持的陈炯明残部及进行北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孙中山在结盟之始，就提出了“战略因于政略”的统战谋略。他在与皖、奉系的政治谈判中，孙中山从未放弃原则，他再向皖、奉强调要坚持召开国民会议，铲除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主权等。他这些主张因不合奉、皖口味未能达成政治方案的一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孙中山北上又与奉、皖两作尖锐的斗争，直至病逝。可以说，孙中山在搞“三角同盟”时，运用了“军事上讲联合，政治上绝不放弃原则”的统战策略。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运用，利用同盟的力量，打垮了直系军阀，使北方军阀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打击下，使盘据中国政治舞台19年的北洋军阀消失了。因此，可以说孙中山这一统战策略的运用，是加速北洋军阀覆灭的重要因素。

为了团结，缓建政府

怀着早日拯救祖国的希望，孙中山毕生都在寻求能够实践自己建国方案的政治力量，很多时候，他为了化敌为友，不惜以牺牲自己许多利益和暂缓自己的政治追求，来迁就盟友。

1922年初，孙中山与昔日政敌奉系军阀建立了反直系政治军事同盟。尽管孙中山从一革命开始，就欲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但奉系张作霖有着不同的政见，不愿意受制于孙中山之下，反对孙中山组织政府。为了争取和团结反直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奉系，孙中山以退为进，也主张推迟建立政府，以便在反直统一战线中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敌。

1918年至1919年南北议和中，直系军阀与桂系军阀暗中勾结，北抗皖系，南压国民党。迫于这种形势，国民党决定谋求与奉系联盟。耿此，孙中山电召宁武到上海，指令宁武利用东北籍贯的身份，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宁武利用张作霖计划吸收华侨资本开发葫芦港为题，以华侨投资者代表的名义，向张作霖发出联盟的试探信号。其后，又在张作霖到天津出席“巡阅使会议”之机，向张游说。张作霖作出反应，派遣一名低级使节到粤致意。

但是，孙、张政见的分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1921年4月的“巡阅使会议”上，张作霖与曹锟共同通电，反对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继续指责张为“胡匪头子”、“东京的工具。”

1922年初，由于直奉双方战云日密。奉、皖、粤三方商谈合作之事走上日程，孙、段、张三角联盟。但是，在联盟格局的设想上，彼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孙中山试图与奉方建立政治、军事一体同盟，便致力于寻求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方案。孙中山派遣伍朝枢使奉，与张作霖就国会的召集、总统的推举、内阁的组建等政治议题，进行了协商，希望达成以约法为根据而统一中国的协议。但张作霖只对军事合作感兴趣，不愿意作粤方政治后盾。当他从报刊上看到李梦庚代表奉方，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时，勃然大怒，准备撤回李梦庚的使命。

1923年2月，孙、段、张三角恋继续发展，特别是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信使往返，不绝于途，使奉粤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他们就军事问题、战略方针达成了共识。孙中山希望在建立政治联盟上有所突破，他派汪精卫使奉时，向张作霖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希望逐步获得奉方的赞同。并提出了“倒直成功后，如何召开国民议会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奉方其实早已与皖系约定，“打倒曹吴，就拥段上台”，此话当然不便明说，只是约定：“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第三次在广东振起，这一年是孙中山一生中军事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并继续得到了奉系军阀的实力军援。

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登上了总统宝座。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各地纷纷通电声讨贿选。第二天，以三角同盟为主干的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立即集会，商议对策。粤方代表汪精卫急电孙中山，请示方略。

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召集要员会议。会议认为时局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曹、吴毁法祸国，全国应一致声罪诛讨，故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建设政府。”但是孙中山很清楚地知道，建立政府势必伤害反直联盟中的实力派奉系。为了团结奉系，也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孙中山决定

信守“不遽设政府”的诺言，没有回任非常大总统，而改称大元帅。尽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制，仍具有政府的性质，但它的名称终究是一个单纯军事指挥机构。

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特派叶恭绰为专使北上，多次与张氏父子及奉方主要谋臣杨宇霆、王永江会谈。张作霖对孙、段合作，分工负责的提案未置一词，杨宇霆则从根本上怀疑孙、段合作的可能性，认为粤方的提案“目下无从解决”。

张作霖的态度使叶恭绰认为没必要去天津见段祺瑞了，而是写了一份措词极为审慎的报告，托廖仲恺回到广州。

一场风波在廖仲恺向孙中山递交叶恭绰的报告之前发生了。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正式政府问题”。会上，经常在粤奉间奔走游说的路孝忱，擅自代表奉方发言：“张作霖总司令主张由此间从速组织正式政府，东省首先服从，解决时局。”报纸披露此情之后，杨宇霆马上致电叶恭绰，否认路孝忱有代表奉系的资格，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叶恭绰一面将此意转告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要求他们从长计议；一面又直接致电孙中山。

孙中山为了稳固反直统一战线，在国民党一大开幕那天，就当众强调粤方最终还是决定暂缓组建政府。并致电叶恭绰说：“此间目前并未组织政府，仅将《建国大纲》提出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现已通过，拟发往各省宣传，征求全国国民同意。此正欲与各方合作之诚意也。”就这样，为了表明与奉皖合作的诚意，孙中山放弃了立即成立正式革命的计划。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并于5日发布北伐的命令。同期，奉方覆行“攻浙无异攻奉”的诺言，通电向直系宣战。这样，战争由东部一隅的局部之急演变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全局决战。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发动了北京政变。反直联盟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作为反直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导演者的孙中山，尽管有着和平统一、建立民主政府的革命愿望，但为了争取反直的主力军——奉系的力量，他一再缓建时局所急需的政府。他这样一着妙棋，全盘皆活。使反直联盟能够团结一致，最终打败直系军阀。南方革命力量也因此把革命力量扩大到了北方，并为日后平定陈炯明打下了基础。

说服为主，斗争为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能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以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领导了“二次革命”，反袁战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进行维护民主政治、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结果全都失败了，甚至遭受打击和排斥。特别是二次护法运动时，新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和欲置他于死地，使他彻底清醒了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生活越来越疾苦，革命之需要越来越迫切，可孙中山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竟陷于瘫痪，党员们或堕落或消沉。这种情况使得孙中山迫切希望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力量，以求摆脱现时的困境。推进中国的革命。此时，他把希望的视线转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与列宁之间开始了函电来往，商讨中国革命问题和中苏关系的问题，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给了他鼓舞和启示。

他接受了列宁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个世界的划分学说。并认识到了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的破坏，和苏俄的援助。

他认识到俄国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代表，回头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发现中国共产党不但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还表现出一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并觉察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因为中共与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是一致的，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种联合是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的途径来实现，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阐述了反帝反封建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大会还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大会还选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廖仲恺为中央执委会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

孙中山所领导的国共合作导致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招致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的反对。国民党的左右派就国共合作问题打开了日趋激烈的暗战或明战。他们有的已经公开站了出来；有的还较为隐蔽，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企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力量，利用工农的力量，利用苏俄的援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得势，他们就或迟或早要举起反共的旗帜，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这个联盟，进一步推进革命，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维护国共团结而进行有力的工作。他试图从理论上说服他的党人，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并再三强

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指出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以邓泽如为首的11人就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政策。邓泽如原是南洋华侨，长期捐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关系极为密切。孙中山并不因此而迁就他，亲自写信驳斥他的谬论，并从理论上论述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告诫他们不要疑神疑鬼。不久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全体党员书》，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严肃批评那些散布澜言的人。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左右派进入了尖锐的斗争。孙中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促使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

大会之后，右派又不断兴风作浪。6月1日，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案；6月18日，邓泽如伙同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8月1日，上海一批国民党致电孙中山，纷纷要求“制裁”共产党。右派分子不但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同性质的《护党特刊》，甚至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及北京《民生周报》等报刊，纷纷出现“清党”文章。中监委1924年提交中执委的10件议案中，竟有4件是反国共合作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单单只是行政命令上进行反对是不行的，还应该从理论上进行疏导。1924年7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重申联共主张。8月15日，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端错误的。

孙中山一再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他除了理论上一再重申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外，还针对右派的复杂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团结和分化。如批驳邓泽如、囚禁张继、开除冯自由。

正是孙中山采取这种对反对派进行理论上疏导，行动上毫不宽容的策略，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一些斗争暂勿激化，遏止了右派势力的进攻，保证了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追求真理，坚持革命，“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随着时代的演变勇于前进。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领导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进行了维护民主政治、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结果，大都未能真正取得胜利，甚至遭受排斥、打击。二次护法运动以惨败告终，他自己培植的陈炯明背叛了他，还欲置他于死地。而此时的社会更加黑暗了，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又日益瘫痪。孙中山忧心如焚，迫切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通过与列宁的函电往来，与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马林、少共国际代表 C·A·达林及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的晤面和会谈。接受了殖民地附属国内各派革命的、爱国的力量应该结成联盟，共同奋斗的思想，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基于对国际及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的分析，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现实的观察，孙中山认识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结成盟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在建立国共合作这一反帝反封建的战线时，他积极的适应历史发展的新形势，虚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抛弃某些过时的观念，采取重大决策，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决心“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

由于俄国为中国树立了典范并给予了真诚的援助，孙中山提出了联俄的思想。他说：“我党以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对兼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代表双重身份的鲍罗廷来华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两件工作，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党员重新办理了登记、招收了新党员、选举了大会代表、起草了新党章和党纲。党章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许多建议。为了更好地组织统一战线，孙中山还接受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一个亲信助手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为他提供政治问题的建议。7月11日，孙中山组成了这个带有政治局性质的小型委员会。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改为瞿秋白）、伍朝枢和邵元冲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孙中山自任主席，鲍罗廷为顾问。

可以说，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这一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组建的，而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多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去做的。孙中山对建立这一统一战线，表现出极为虚心的态度。

另一方面，孙中山认为自己手创多年的“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液。”孙中山因此把目光移向共产党人，特别是象李大钊一样的植根于工农运动中的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英勇无私的战士，希望与他们建立新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实现统一建国大业。

1922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与李大钊“畅谈不倦，几乎忘食”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向李大钊学习新东西，以便更好地建设国共合作，他迫切要求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说明自己不能脱去共产党党籍时，孙中山诚恳地说：“这

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这迫切要求充分表明了他竭诚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

孙中山还在共产党的劝说和帮助下，接受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进而将这些主张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比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还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 23 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并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毫无疑问，这些政纲和政策都体现了孙中山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虚心学习的精神。

孙中山还注意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才吸收到统一战线的领导队伍中来，帮助领导革命。从李大钊南下参加国民党改组开始，到瞿秋白参与草拟国民党史上的划时代文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谭平山、林祖涵分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到共产党人担任各部日常秘书（实际领导）工作等等，都体现了孙中山向中共虚心学习的决心。

孙中山把共产党人的帮助，作为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前进的重要因素。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行前进的重大问题时，孙中山总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

正因为孙中山这种崇高风格，促使了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不仅完成了北伐大业，还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树立了一面两党并肩战斗的旗帜。

大清官员也是发展对象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了统战工作实质上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反对派，以完成革命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任务。孙中山在为完成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进行的“反满”斗争中，也着重进行了“挖清政府的墙脚”的工作。不但发动了清政府的“杀手锏”——新军为革命而倒戈，还认为大清官员也是发展对象，注意发展在清王朝很有地位和影响的官员来为革命服务。孙中山不计前嫌，动员和接受清政府二品大员伍廷芳参加革命的事件，可谓是他统战工作中的一个代表作。

伍廷芳 1842 年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读书，准备应试。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中止应试作官的生活道路，到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32 岁到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取得法学学位和律师资格的人。

后由于清政府对懂外交的人才的需要，伍廷芳被发现，但他拒绝去当领事。后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荐，伍廷芳放弃了在香港所享有的“殊荣”和丰厚的收入，走上了报效君国的道路。在国内，他先后从事翻译泰西律例，参与办学堂、修铁路。对外交涉订约、修订大清刑律、制订民事诉讼法等工作。职务也从洋务局委员，逐步上升为公使、外务部右侍郎、商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等职务。

伍廷芳也是一个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人，也抱有救国救民的宏愿，但他企图走改良的道路。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要武力革命。而这年前后，伍廷芳因与日外交，两次受尽侮辱，后来回国修订法律，又遭到了守旧官僚的横加反对。作为改革者的伍廷芳在清政府内部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仍然坚持走改良的道路，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颇有非议。

1895 冬，伍廷芳第一次出使美洲期间，通过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以高官厚禄相说，劝孙中山放弃武装革命的想法，回国任职。孙中山不但不为所动，还看到了伍廷芳有着救国救民的宏愿，劝伍廷芳看清清政府的反动面目，要救国救民唯有武装革命一条路可走。两人不欢而散。

1909 年，伍廷芳第二次使美，仍然无法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起见，他还向清廷呈报过孙中山的革命党从美国购买军火，图谋造反的消息。此时他与孙中山还各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

可在伍廷芳极力想维护清朝统治的同时，清廷却一次次地让他失望至极。除了代表清廷去与外国签定条约时，受尽了种种侮辱和折磨外，他以法治国的宏愿却一步步地幻灭了。1905 年，清廷标榜预备立宪，到了 1908 年只颁布了一个旨在维护“君上大权”的《宪法大纲》。尽管吁请召开国会、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却竟在 1911 年成立了进一步集权于满洲贵族的皇族内阁，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虐。这一切促使了伍廷芳政治立场的转变。他清醒地认识到指望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来富民强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惟有推翻君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才是救国救民的可行之路。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11 月上海起义，江浙响应，攻克了南京，从此决定了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曾系统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伍廷芳在革命胜利的感召下与革命党真诚合作。应陈其美、李平书之邀，在上海起义后出任沪军都督署外交长，代表军政府做了许多工作。1911 年 12 月，伍廷芳被中央军政府任命为外务总长和民军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

议。第一阶段的五次会议，前两次由黄兴作决断，后 3 次由孙、黄共同决断。

1911 年 12 月 25 日，上海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欢迎人群的前列就有老者伍廷芳。当晚，孙中山就下榻在伍廷芳的寓所。孙中山对伍廷芳来参加革命阵营表示热烈的欢迎，说伍廷芳这样的人参加了革命，清朝岂有不覆灭之理，伍廷芳的归来正是革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策略运用的结果，革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力量，哪怕是清政府的大员高官，仍然都是团结的对象。孙中山与伍廷芳还就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议和革命形势进行了研究，并交换了看法。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并不因为伍廷芳曾是满清的二品大员，曾反对过自己的活动，唯才是举，推举了伍廷芳为司法部长，并继续主持南北会议。

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民国建成。尽管两人在和议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分歧，但伍廷芳终究协助孙中山实现了推翻清朝、建立报国的目的。孙中山对伍有高度评价。说：“公等为国民议和事，鞠躬尽瘁，不避嫌怨，卒能于樽俎之间，使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不流血而贯彻共和之目的，厥功甚懋。”

尽管后来两人因为陈其美的事而互相疏远了一段日子。但在袁世凯暴露本来面目之后，伍廷芳又与孙中山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之中，并成为了孙中山的重要政治支柱，1922 年 6 月 23 日，80 高龄的伍廷芳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代理财政部长、兼广东省省长的任内与世长辞。

孙中山所采取的清府官员也要发展的统战策略，争取到了伍廷芳这样的人才，对推翻专制和继续革命立下了功勋。

孙中山人生谋略

不要妄自菲薄

旧中国沿袭封建制度，从秦朝到清朝，一成不变就是几千年，特别是满清帝国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封建锁国，与外界不通往来，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起初是妄自尊大，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堂堂“天朝”，天下第一，把欧美国家当成“狄夷”看，不知海外涛声如何；鸦片战争后，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被欧美人的“坚船利炮”打得焦头烂额，又是赔款，又是割地，使立即惊慌失措，妄自菲薄起来了。当有人提出要向外国人学习、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时，有人又妄自菲薄起来，认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中国贫弱的形势，中国没有条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洋人，学不了，更赶不上。

这种消极的思想显然将影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如果人人都因此而缺少改变历史的现实信心，中国永远只能处于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针对这一点，孙中山阐述了人生的信心问题。

他不但自己一辈子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40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还著书立说和发表演讲来鼓励起中国人民的信心。他从1894年上李鸿章书失败起，并没有因中国无法进行改良而绝望，而是勇敢地提出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的策略；辛亥革命前，无数次地失败也没能挫抑住他的革命之心；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革命党内部产生了妥协和分裂的趋势，孙中山仍高扬起革命的旗帜，继续奋斗，他亲手培养和扶植起的陈炯明，背叛了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从总统一朝沦为了朝不保夕的流亡者。他并没有绝望，而是马上就在兵舰上发表革命的宣言，继续革命，奋斗了40年，因劳累过度，在59岁时就因患肝癌而英年早夭，毕一生之精力仍然未能完成革命事业，他至死仍不灰心，而是在《遗嘱》中充满信心地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就支持黄兴等开发大西北的计划；辞去大总统之职后，先后倡导组织了华实银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还有他穷心尽力所制订的一系列建国文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均由于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的限制，未能付诸实现，孙中山却总是充满信心地为中国的发展和富强而呕心沥血。

能够让孙中山40年绝不中断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不已的驱动力，就是他人生谋略中的“不要妄自菲薄，一切事都充满信心”的原则，作为受人民敬仰的“国父”，孙中山不只是自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他还以自己的政治感召力，激励着全国人民对革命的建设的信心。

孙中山首先批判了那种妄自菲薄的思潮，他说这是由于“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而造成的。他认为想学习外国，必先了解外国；欲自强，必先自知自信。他先后驳了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的观点，说：“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某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的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的程度，他说：“又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低，……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美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

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只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振兴中华。正如他所说：“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 960 万平方公里之土地，为世界独一无二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还具体比较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充满信心地预言：“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

孙中山所勾勒出的富强之梦吸引了无数革命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革命也给了那些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而丧失了信心或感到非常迷茫的人最后的必然胜利的信心和巨大的革命热情。例如他在早年革命失败之后，总能一次次地鼓励着战友们继续奋斗，在反袁斗争和反段祺瑞军阀政府中孙中山多次倡导北伐，提出了直捣黄龙府的战略，其对革命的信心鼓舞了极多的革命者；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孙中山对唤醒民众后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工人和农民所发表的演讲，也深深鼓舞了革命人民。

总之，孙中山这条“不妄自菲薄，以求自信”的人生谋略，不只是促使了他自己为革命奋斗了一生，也同样鼓舞了那时在黑暗中探索中国前途的中国人民，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勇气。

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

一谈起孙中山这个一代伟人的名字，我们也许最无法忘记的是他那持40年之久，而从没停止过的在革命中不断地探索、总结 and 创新的顽强毅力。他不但毕其一生遵行那条“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而且还将它从理论上加以了阐述。

一切知识都源于行，又巨大作用于行。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知卓识”，这需要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他还在另一个讲演中指出“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

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起来不过于三层意思：（1）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行”、“试验”，才能得到检验；（2）主观的认识只有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时，才是正确的；（3）行，是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孙中山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孙中山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宇宙万物，而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将变成“老朽颓唐，灵明日辄。”他以电学的发明为例，说明许多科学知识是世代人们反复实践的结果。他说：“自指南针发明以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磁针之指针，磁石之引铁，经早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才获得电气之理。”他意思也就是人获得真理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实践活动。

孙中山还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东行，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就这样，人的认识才能“由浅而深，自简而繁，故人之灵明日郭，智慧日积也。”概括而言，孙中山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行之，知之，再行之，再知之，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不息。

正因为孙中山对人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度，在他的革命事业中，在他的建国设想中，总能不拘于一时一事，而能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得到认识，然后付诸实践去检验，又不断认识，不断检验。这就使得他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以其远大的政治目光和超凡的政治素养，来领导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就立即认识到了中国走改良和立宪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便确定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在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几次边境中，发现清军营中的“新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就确定了发展新军作为打击清王朝的致命力量的策略；在反袁斗争失败之后，就认识到必须由政党来领导军队，并且还发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紧密团结的政党，他就立即组织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和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革命不能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便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他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知道不可能利用外国力量来完成革命，就表明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坚决态度，并领导了收回租界的运动；在革命过程中，他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便决定发动工人和农民，

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等等，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不断从失败中提高认识，并总结出新的策略并为之付诸实践而奋斗。

就是在他那极富空想色彩的国家建设方针中，他也贯注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最富典型意义的就是他写作《建国方略》一书过程中，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查询资料，亲自向专家们请教，一个数据，一幅草图，都经过反复斟酌，运思独苦，从不轻易确定。并且在许多处附上说明，以备专家学者来做进一步的修改和订正。这一例子就充分地说明他探索真理认识的客观过程。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不但使他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能够在思想上产生一次次大的转变，还能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破旧迎新

作为一个革命家，对待“旧”和“新”的关系处理态度，往往直接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策略，也很容易影响他的政治性格和政治模式。与袁世凯努力地想去维护和复辟已腐朽的帝制相比较，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死抱着改良维新这一不中用的法宝相比较，孙中山在对待“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上，更具有革命的内容，在其人生态度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破旧迎新”的远识。

孙中山从他 1883 年毁坏翠亨村北“北极帝君”庙的神像开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法令，甚至他后期革命活动中所提倡和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服从着“破旧迎新”这一策略，他提倡一种与“物质文明”相并列、相对应的“心性文明”把破除旧习惯、旧风俗，建立新风俗、新习惯作为其主要内容。可见他在致力于经济建国、政治建国的同时，还把破除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新立新道德、新风俗、新习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1911 年 8 月中旬，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成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机构——军事指挥部，经过几个月的宣传与发动，革命种子遍布了南北军界，已有 14 省的满洲军队投到了革命营垒中，孙中山对这些旧式军队有着深刻的认识，知道他“受经济的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国内军阀官僚之剥削，遂致失业日多，饥寒所迫，或行劫掠，以图苟全，或入行伍，以求幸存。”孙中山所持“破旧迎新”的人生态度促使他主张对一切旧军队，加强政治教育和革命主义宣传，把他们改造为真正革命的新式军队。而且，孙中山不但注意了旧军队的政治立场改造，还注意在战略战术上进行训练，使旧军队渗入新血液，树立起新军队的精神。

1912 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先后颁布了 30 余条法律来打破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风尚，比如 3 月 2 日，下令严禁鸦片。他在命令中先列举了鸦片的危害，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行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损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他接着申明严禁措施，通过立法、行政、军事及社会团体、各界舆论等多种渠道来保证禁烟禁令的贯彻执行。3 月 5 日，孙中山又下令号召全体国民一律剪除那条作为清王朝名胜象征的辫子。这一法令里他从满清入关到清廷倾覆辫子给人带来许多灾祸的事实，限定人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剪去辫子。这一剪辫令对于破去“虏俗”，推进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

孙中山还从建立新的政府行政机关体系，确定新的“主民仆官”模式出发，主张废除旧封建官场的等级制度，他提介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人则称为“先生”、“君”之类的，不要再象以前那样称什么“老爷”、“大人”、“奴才”之类的，也不要进行叩头、跪拜之类的恶习。

孙中山认为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也有着新旧之分。旧新年是君主时代的新年，是专制国家的新年，新新年才是民国的新年，是共和国的新年。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进入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是人类逐步文明发展的过程。所以人民要把“过年”的习惯也进行改革，不要过阴历新年，要过阳历新年。孙中山这一主张是试图从上层建筑领域，人的意识形态角度入手，进行变革，使人们建立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

除了社会风尚的破旧迎新外，孙中山还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入手进行变

革。他首先进行行动的就是要打破“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妇女的解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不但与何香凝、秋瑾等女革命干部非常重视，还在临时政府成立后5天，提出男女一律平等参政的观点。1912年3月12日，又努力把“女子参政权”列入了《临时约法》之中。后来还拨款资助妇女办机关报和举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妇女师资与干部。孙中山还认为男女平等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把这一思想纳入到三民主义之中。还认为妇女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孙中山这些观点和主张，给了忽视和歧视妇女的旧传统观念一个有力冲击，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树立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新道德观念和风尚的建成。

此外，孙中山还注意了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破旧迎新”，他要求人们掌握基础的科学知识，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甚至还力主科学方法的烹调和进餐。他还注意了服装上的改革，亲自设计了举世闻名的“中山装”来替换旧官场的礼服。他还就房间的卫生、摆设和装潢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而新颖的观点。

孙中山所提出的“破旧迎新”的人士谋略，以及他所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革新措施，不但使他一步步走向革命的成熟，也给了全国人民一个革命和革新的新概念。

打倒一切偶像

1878年，孙中山随母前往檀香山哥哥孙眉那儿去生活，做了一年的事之后，他在意奥兰尼学校和圣路易学校学习。此时，他不仅学到了欧美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也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又从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萌生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思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志向，希望能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1883年秋，年仅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回翠亨村。他一面帮助家里做些农活，自修中西学，一方面试图在村里进行政治改革宣传和一些改良乡政的尝试。但他发现乡里所受封建君权和神权的毒害太深了，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听不进任何别的什么先进的宣传，他还发现老百姓对村庙北极殿的“北极帝君”极为崇拜，而村里的地主阶级正好利用这种盲目的崇拜，让老百姓捐粮捐款，乘机剥夺劳动人民。孙中山深知，要使村里的人民觉醒，必从他们盲目崇拜的这个木偶土埂开始，同时他也明白，打这些东西的主意，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就会引祸烧身。孙中山思来想去，要革命就得有献身精神，如果谁都不愿作出牺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就准备奋不顾身地毁坏这些偶像，以求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

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到村庙里去玩，正好碰着几个老人在那儿跪拜神像，一副很为虔诚的样子。孙中山和陆皓东看到这种情况，好不心痛，马上冲到老人们前面，当场指出这些木偶土埂是无知的，是村里的地主豪绅欺骗和敲诈老百姓的手段，并劝告大家不要信迷信。孙中山为了证实他的见解，不顾一切地跳上正殿，折断了“北极帝君”的手，又刮破了左廊“金花夫人”的脸皮，毁掉了它的一只耳朵。当场的群众见了，不知所措，有的吓得慌忙逃开而去，有的老人还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口中不停地念着：“罪过！罪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几个勇敢的年轻人，乘机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道理。

不容置疑，孙中山破坏神像的勇敢行为，遭到了本村豪绅地主的恶毒攻击，说他“亵渎神灵”、“有悖礼教”、“罪同大逆不道”。豪绅们一面责成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修复“北极帝君”和“金花夫人”的偶像，一面就把孙中山驱逐出村。

这一年秋天，孙中山被迫离开前往香港。但他认为他的斗争是有成效的，不但激起了许多勇敢的年轻人走向了反封建的革命之路，也给了村里封建势力重重一击，使许多人明白了神究竟是什么了，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他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为了推翻封建满清王朝，他举起民权的旗帜，依靠自然科学，对准天命论和“君权神授”，奋不顾身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无情地揭露中国历代帝王把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说成是“天所授与”，只不过“假造天意”，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他说，什么“天意”、“天所授与”都是帝王假造的，其目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证明皇帝之至尊无上，二是要人民绝对地服从他们的统治，不要反抗。他还指出反对君权和神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了解民间疾苦，着手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主动地劝说

胞兄孙眉不要去任广东省省长之职，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体现了“平民大总统”的作风和气度。

他还从人民生计的角度出发，对浪费大量财物的“祭神飨鬼”的迷信活动，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这是国家的一大祸害，必须禁止。

在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对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演出的“祭天祀孔”的丑剧，予以了揭露。斥之为“事事要复古，还是想恢复专制，还是想做皇帝。”

总之，孙中山以为打破封建专制下的君权和神权，必以粉碎偶像出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由自己奋不顾身去完成。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中，有一个“知易行难”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是艰难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许多人面对着稍有困难的事情都望而却步。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工具。

孙中山经过了一系列的失败，特别是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之后，他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彷徨，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发现自己“奔走于国事30多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好不容易，推翻了专制统治的创建了共和。如早交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完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建设宏模，却不料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国情。

孙中山痛心疾首，百思不得其解。他午夜思维，好不容易才醒悟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错误思想而懈志。而其中以中国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为革命和建设的“最大敌”。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闭门为述，悉心研究“知易行难”迷说的是非。

发生“知易行难”这个命题，历来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解释，从积极方面看，尽管这个命题割裂了知行的辩证关系，但即揭示了知行之间的矛盾，即可能产生的知行脱节，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反对知而不行，只说不做，强调行的艰难和重要。从消极方面而言，反映了“礼崩乐坏”时代奴隶主对知行脱节行为的哀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奴隶主卑劣行径作辩护，正是这样，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这个命题又被一些卑怯的人们当作安于现状、反对革命以及既不肯下功夫求知，以畏难不敢行的人的一种借口。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遍举事例，控诉“知易行难”的罪行，并指出了它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妨碍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害。正如他所说的：“吾三十年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者此敌！可恨哉此敌！”他还把日本与中国作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列强，就在于不怕一个“难”字，而中国之所以弱小，就是一个“难”字害的。

因而，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心理大敌，他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理论的正确性。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个思路。1918年冬，他撰写了一部专门讨论知行问题的哲学专著《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在他这本哲学专著中，孙中山认为人们对任何客观事物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中，“知”和“行”都有“难、易”的问题。但把“难”的“易”看成知和行的根本对立关系的两方面，是极端错误的。“知”和“行”的基本关系，只能是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孙中山这仲命题正好与王夫之的“知难行易”相反，但他们都主张“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行先知后”是“知难行易”的基础。总之，他这一思想可概括为两句话，“行之非艰，知之为艰”。

孙中山这一学说，是在对当时社会状况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各国由于忙于战争，除日本外，都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民族工业乘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渴望建立一个制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秩序。可辛亥革命之后，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实行反动军事专政等事件，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又连遭失败。此时，一部分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有的甚至走到了革命的敌对阵营。在革命充满迷茫之时，孙中山从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回答了革命前途的问题，并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在当时为振奋革命党人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要求他们继续坚持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天下为公

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的是实行民权的大同世界。但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去争取，“天下为公”在他身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革命中，为求全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40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奋斗不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认为政府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主张“主民仆官”一切为实行“主权在民”而奋斗。

孙中山1881年在意大利尼学校读书时，就产生了改造祖国的愿望。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望之后，重返檀香山，宣传革命，并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895年10月，他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9年，孙中山发动了粤、湘、鄂地区的武装起义；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订了《革命方略》，1907年至1908年，领导了潮州、惠州等多次起义，1911年，发动了黄花岗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在国外作外交上的努力，12月25日，抵达上海，29日，被17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制订《临时约法》及其他30几条法律；4月1日，正式辞职，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实业建设之中，1913年3月，他又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号；1918年4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他又积极投身于反袁的斗争之中；1917年进行护法战争；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年底，积极准备北伐战争；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1923年1月1—2日，他召集会议，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4日，决定成立建国政府并出师北伐，1月20日，孙中山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31日，扶病人京，发表《人京宣言》，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揭露段祺瑞“善后会议”，2月24日，孙中山口授家事遗嘱，用英语口语致苏联遗书，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孙中山的一生，不管是就任举国拥戴的临时大总统、大元帅，还是做一个不名一文的流亡者，他都为了实现“民主共和”这一为天下人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而奋斗不息。不管他是被袁世凯欺骗夺取了革命果实，还是他花了极大心血亲手培养扶植的陈炯明最后也背叛了他，让他痛心疾首；还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要与袁世凯作坚决的斗争，而被人怀疑欲占据总统之位，还是反袁斗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并造成革命党内部分裂时，孙中山都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国家和民族，为普天之下的国民的解放和幸福而不懈奋斗。

就是1925年元月，他病重住入医院之后，仍与炮制“善后会议”的段祺瑞政府作坚决地斗争。1月26日，孙中山病势加重，入协和医院，并确诊为肝癌，1月31日，仍指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他的遗嘱中，仍不忘革命救国，3月10日，病势危殆，获悉东征军克服潮汕后，又指示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两天后，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由这些事实我们足可以明白孙中山先生一辈子奉行“天下为公”

这一人生策略的彻底性和伟大性。

孙中山所坚持“天下为公”的行动原则，还主要表现在他主张“主权在民”和“主权为民”，特别是他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当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当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工具，他特别喜欢用“家天下”与“公天下”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他的胞兄孙眉，曾经为革命捐赠大批财产，也十分热心革命活动，在广东父老和华侨中有相当高的声望。革命胜利之后，广东各界人士都力荐孙眉任广东省省长。但是，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行为准则，力排众议，坚持不任用自己的兄长为高官，而且还亲自写信给胞兄，做解释说服工作。

正是孙中山这一“天下为公”的人生策略，使“民主共和”这一概念在中国一出现，就深入人心；也正是他终身坚守着这一人生策略，使他获得了国人的普遍爱戴，并被尊为“国父”。

人格救国

政治家的政治业绩并不一定与其伦理人格成正比，然而真正伟大并为人民长久崇敬的杰出历史人物，都具有伟大的人格。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但自修出伟大的人格，还采取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依靠其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信徒和追随者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人格这一观念，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养料，在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就说过：“中国有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么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的这段话，高度赞美了《大学》中所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或者可以说是人格。

由此，孙中山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如何才能“修身”呢？孙中山对这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就会丧失人心。正如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所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在这里，孙中山把“人格”的观念升华到人的价值观念。并深刻地认识到人格对于人类或国家的改造进步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把人类的人格改造好，社会当然就会向前推进许多；这一点具体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就可以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就必须先要人人都有好的人格，如果我们四万万人都变成了好人格，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

他这一“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主要体现在他希望人格所显示出的价值，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熔铸成为一种“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体现成为谋求天下人解放和幸福，而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意识。

正如他所说：“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的‘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

孙中山人格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他力图在传统的“人格”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民族之魂，并以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

孙中山把从政与理想人格培养高度统一起来，“天下为公”，为政清廉，

绝不以权谋私。为了实现“求吾民真正之幸福”，孙中山不惜失“谋生之地址”，去“固有之资财”，弄得倾家荡产，长期亡命异国他乡。在个人生活上，孙中山也一贯以淡泊自持，简单朴素。他在他的《家事遗嘱》中所说“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八个字，既是对他自己政治人格的公正评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丰厚的遗产。

孙中山内在人格追求向外延伸为“君子政治”的理想作风，即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不滥杀无辜。

孙中山这种“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促使他伟大政治形象的形成。正因为他政治眼界、理论素养和人生修养，使他也只有他才能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主要体现在对理想信仰的狂热与执着和策略上的实用主义两个方面。其政治性格策略上实用主义的方面直接影响了他对于人生的观点和所采取的策略。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些花俚胡俏的东西，刻板过时的东西不那么实用，发展国家，促成革命，难有双手是万能的。所以他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青年学生指明人生之路时，都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谋略：“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孙中山对这一人生谋略的使用首先表现在他的革命活动上。早在孙中山“倾履清廷”的思想确立之前，因为当时国内的改良主义思潮盛极一时，满腹经纶的孙中山也产生了改良的思想倾向。1890年，他就致函退职的香山县籍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了兴农桑、禁鸦片和兴教育三点改良意见。1894年春天，又写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工商业。该年6月，又通过盛宣怀以及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在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李鸿章能够“玉成其志”、“采择施行”，可结果不但没能见到李鸿章，而且自己的任何意见都未被采纳。

上书希望的破灭，接下来中日战争的惨败，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他“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观点对他的下一步行动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他没有象章太炎、梁启超等立宪派或改良派一样，死守着改良的政治目的不放，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的远大抱负，并于该年10月，再度远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开创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他这一人生谋略还体现在他对教官制度所采取的观点上，也就是说他对其他青年，人生之路的选择的参考方面，也渗透了他的人生观。

他对年青人有着殷切的希望，正如他所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他对青年的前途极为关注，例如北京军政府逮捕爱国学生之后，他便打电报给军阀段祺瑞，要求无条件释放爱国学生，还因为他对青年的关注之情，他在塑造青年人生道路的教育制度上，渗透了自己“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人生策略。在智育方面，他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内容，注入西方物质文明的有关知识对于旧学校那些尊孔的教育，他说：“坏透了的孔学是一文不值的。”主张废除那些无用的教条，在他任临时大总统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下令取消普通中学的文科与实科的分科制，教育部明文反对“忠君”、“尊孔”、“读经”这一套，指示各校把大学的经科合并到文科中去，使经科丧失了其传统的重要地位，让学生腾出精力与时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加理工、农、经等实科的比重，使学行增长真才实学。

孙中山还反对学生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读死书。他说：“要是就高深的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等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需注重自修的功夫。”他还提倡学生注意实践，重视“实地考察。”总之就是重视学生“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人生思想。

孙中山这种教育思想，打破了几千年的培养所谓“仕子”的教条和八股，提高了以前被贬低为“淫技奇巧”的科学技术的地位，突出了教育要适用于

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孙中山人生策略中的“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思想，决定了他在政治性格中极为重要的一面——策略上的实用主义，其一生都为了谋求全体国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伟大目标，多次地多方面地采用实用主义政策，也因为他伟大的政治感召力，他这一人生谋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让许多人都试图用实际行动来完成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孙中山教育谋略

砸碎“孔家店”

孙中山一向关心重视教育事业，1890年，他首次上书其同乡大臣郑藻如，提出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及构想。1894年，他再次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四项颇为重要的建议，而第一条就是关于教育的。

作为一个接受过旧教育并亲身体会到封建教育的弊端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对封建教育认识非常的深刻，他在不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也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有利的批判。

首先，他批判了封建教育的不平等性。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地主阶级的子女垄断了受教育权，而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教育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状况未改变。孙中山对此类情况耳闻目睹，并对这种不平等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其次，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孙中山对封建的科举制度并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应完全废除考试制度，因为科学而废考试是“因噎废食。”

再次，是对封建教学内容的批判。孙中山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绝大多数是喜欢封建专制的合理性，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

第四，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主义恶劣的社会作用及其造成的危害。认为他阻碍了中国文化进步和企图消灭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思想，锢蔽人民之聪明。”

第五，孙中山批判了封建教育的目的及其产生的恶劣后果。他指出，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士子求取学问指以利权为目的，其后果是必然“纳贿当道”、“贪污之风盛行”，封建政治更加黑暗。

基于对封建教育的深刻认识，孙中山主张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于国于民真正有用的人才，去“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的中华民国。”因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

第一，扩大受教育面。孙中山认为，人与人之间虽存在着知识程度、身体强弱等各方面差异，但那种由富贵和贫贱而形成的阶级的不平等却不是从来就有的。教育亦是如此，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应平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能让富贵者独享，贫者不应该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只有有了教育的平等，才谈得上教育的普及，而没有教育的普及，就谈不上什么教育的平等。因此，孙中山认为，只有全体国民都觉醒起来，支持革命，甚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推翻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才能谈得上教育的普及，扩大受教育面，也只有这样，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富强。

第二，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的封建士大夫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后，左宗棠、奕沂、张之洞也提出了比较积极的看法。在这点上，孙中山就吸取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他透彻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内容的空洞陈腐的不切实用，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认为，西方物质文化的发达，国家的强盛，都是建立在科学昌明的基础上的。中国之所以挨打、受列强欺侮，其

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力衰微、科学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只有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进步，而这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向欧洲学习，学中国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不能继续埋头于那些故纸堆里面。

第三，孙中山认为应改革教学和治学的方法，在各种封建教育机构中，私塾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由于它是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受到基础教育的地方，因而它对教育影响也较大。孙中山对私塾的教育方法有着亲自经历，且从小就对这种教育方法有着强烈的反感。孙中山认为，那种“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硬背”而“不求其解”是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才的。同时，孙中山提倡要把学问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果求得学问之后却不敢去运用、去实践，学到的知识便毫无用处，毋宁不学，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也会受到影响。最值得推崇的是，孙中山一反中国传统教学中的“师承不易”观点，认为它是非常荒谬的，他指出，如果认为“先贤之教”都是绝对正确合理的而不敢质疑和反对，学问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第四，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和方法。孙中山指出，以前的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新的教育制度应让受教育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能是“中举、点翰林、做大官”，不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养无数的娇妻美妾”，而是要在学业成功之后，献身于国家，替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倡“牺牲、献身精神”，去建造新的中华民国。

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孙中山把学校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他通过对欧美各国学校教育的考察，得出要培养众多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须得学校教育不可的结论。因此，要获得众多的人才，就必须广设学校，大办教育事业。这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06年秋冬之间，在日本东京孙中山主持拟订的《军政府宣言》中，也特地规定了施教育的内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唯恐因社会骤变而影响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他以急迫的心情亲自下令教育部，令其通告学校“从速开学”，同年，作为初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他亲自提名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并指示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在后来孙中山的言论和行为中，亦不乏对学校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那么，孙中山在学校教育这方面到底有哪些积极具体的观点举措呢？

首先，孙中山把中小学校的兴办，尤其是小学的兴办，视为发展教育的根本，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在各地广设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蒙馆的主张。辛亥革命后，他的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12年5月，他在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注重教育要从根本上入手，先使每乡皆有蒙学校，由蒙学校而高等，由高等而大学堂，”而这里所指的所谓“蒙学校”，已不是指以前的旧的蒙馆，而是指新式小学校，即就是说大力兴办小学校，普及小学教育，是振兴和发展教育的根本。在孙中山看来，只有从大办小学入手，才可能实现教育的普及，才能够完成培养人才的教育任务。

其次，在强调注重中小学校教育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忽视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即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和巩固，都需要这方面的大量人才，而这就得依靠有一定数量的好大学。1920年，孙中山组建军政府时就把“振兴高等教育”作为其内政方针之一，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重点强调了必须多多地建立一系列的好大学。

正因为大学是造就种种专门人才的地方，孙中山才对大学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他认为，办好大学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好的老师和合格的学生。没有好的老师，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没有合格的学生，造就人才就更无从谈起。另外，孙中山还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在1924年8月他下令公布的《大学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关于大学的任务，《大学条例》作了三方面的规定。

首先是向受教育者灌输世界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

其次是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知识和新学问，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从这点可以看出，在大学中，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且还应当为社会服务。

最后是大学应根据国情的需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即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因而在孙中山看来，大学里研究和灌输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得以推广和应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三，对于各种专门学校教育，孙中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孙中山指出，没有大量的合格的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校的普遍兴办绝不可能，而中小学教员的产生则依赖于师范学校的培养。因此，兴办师范学校

是大量兴办中小学校的前提，由于他对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联系有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非常注意各类师范学校的发展。同时，关于师范学校的设置，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见解，即分为两级，一是初级师范属中等教育，侧重培养小学教员；一是优级师范，属高等教育，侧重培养中学教员。

对于女子学校教育，孙中山也很重视。他指出：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子的教育一向就受到忽视，“直至清末，女子识字者百中无一”，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注重解决女子的教育问题，必须重视女子教育。与此同时，他极力赞成和支持兴办各级各类女子学校。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就复函女界共同协济会，对她们筹办女子法政学校的举措深表赞许，并拨款 5000 元予以支持。同年 5 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演说，亦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充分肯定。

孙中山对职业教育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要取得继续巩固和进步变化，就非得兴办各级专门学校，培养出大量的专门的建设人才不可，早在 1912 年 11 月，他就提出了建立铁路专门学校的建议。另外，孙中山认为职业教育也应当分两级，即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这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孙中山认识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西方列强不敢侵犯，就非得有一支精强的军队不可。因此，早在 1912 年，孙中山就赞成设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初级军官，到了晚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培养一批优秀军官的重要性迫切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除了上述各种专门学校外，孙中山还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创办各类学校，如自治学校、宣传学校、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学校的学校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学校。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多次挫折与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胜利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即通过宣传来争取和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认为要在宣传上下功夫。为此，他主张办一个专门培养宣传人才的宣传学校。他这个愿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即得以实现，即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推动下成立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教育要遍及所有国民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都不能得到必要的教育，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清楚，并且认为这是国弱民贫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反复强调普及国民教育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不能掉以轻心，要加以扶持和重视。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他就倡议办普及的教育，1923年1月，孙中山亦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规定要励行教育普及。

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青少年普及学校教育；二是广泛进行对成年国民的社会教育。

对于普及学校教育，孙中山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平等，即不分贵贱贫富，广大青少年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孙中山指出普及教育要增进全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不单纯增进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说，凡是适龄的青少年都有受教育权利，而没有民族的界限，不能在教育上搞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孙中山另一个普及学校教育的思想是实现男女教育上的平等。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女子是绝无任何权利可言，孙中山对这一点深恶痛绝，他大声疾呼，要给女子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极力提倡发展女子教育的数量和规模。1924年，孙中山把男女在教育上享有均等权利的原则写进了国民党的政治纲领，由此可见他对男女教育均等这方面的重视。

总而言之就孙中山看来，全国的少年儿童不分贫富、民族、性别，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普及学校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普及学校教育。

孙中山关于普及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义务免费教育。在1912年、1920年和1922年，孙中山曾分别提出了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3种构想。

初次提出义务免费教育的构想是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当时他就学校教育提出了由国家向受教育者提供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即就是说对于适龄的少年儿童，国家不但向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不收学费，与此同时，还为受教育者免费提供书籍、衣食、学习用品等，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得以实行。但是，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这种普及学校教育的境界，就非得有强大的国家经济不可，要国家经济大大发展，国库收入“岁用有余”，因此，他的这种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因为当时的中国非但不富强，而且还非常地贫弱，并不是什么“岁用而大有余裕”。

第二次提出义务免费教育主张是在1920年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再次将义务免费教育的事宜提上议程。这次提出的主张与1912年的思想主张相比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学校教育仍免收学费且免费给学生提供书籍、衣食和学习用品，但分析其不同点，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孙中山关于义务免费教育的思想主张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成熟，下面就其不同点加以简单介绍。

首先，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主体也不再是国家，而是“公家”，即各地方自治团体，这样，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义务免费教育的主体。

其二，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经费来源也较以前不同。以前是主张由国家实行“国家社会政策”来获得经费得以实施义务免费教育，而现在则主张通过各地人民筹措资金或义务劳动来获取经费。

提出第三种实施义务教育的主张是在 1922 年 1 月,当时孙中山在向桂林学界人士演讲,这次主张的主要内容较前两次有了较大改变,即不再寄希望于国家或各级政府拨出经费来实行义务免费教育,因为他考虑到这个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他在演说中直接号召所有有知识的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兴办义务免费学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显而易见,这一主张较前两个主张现实多了。

对全体成年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呢?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后,全体国民中懂得革命道理的人少之又少,这正是民主共和制不能实行,革命不能彻底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广大人民进行革命道理的教育,使他们明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是为人民的国家。另外,孙中山又意识到国弱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太低,不可能运用科学知识去创造大量财富。中国同西方差距太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民尚不知道运用科学。他指出,中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基本上都处在用人力和手工进行生产的阶段,根本无法与西方的机器生产相比较。所以,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经济,就必须让人民接受科学知识的教育,学会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进行生产,以发展工业和农业。

接受广泛社会教育的除了工人、农民外,还有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孙中山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后者的教育作了大量的论述。

关于革命党人的教育,孙中山首先强调指出,要对他们进行革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对革命的主义有透彻的认识。因为只有透彻地了解了革命的主义,才能够去实行主义并为主义而奋斗,同时,他还要求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主义去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另外,除了主义的教育之外,还得进行求团结、守纪律等优秀革命品质的教育。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些优秀品质,党的力量才能凝聚在一起而强大,才谈得上去对抗敌人。

对于革命军人的教育是孙中山教育思想中一个尤其重要的部分。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对全体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的。孙中山指出,对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主要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而“主义”的教育则要通过全体革命党人的广泛宣传才能得以实现。具体做法有 3 个:

一是设置宣传讲习所,即宣传学校,让革命党人先在这里学习革命的理论,接受“主义”的教育,然后再去向广大国民宣传。

二是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来宣传革命的道理。

三是设“讲演所”即集中一定数量的群众,进行革命主义的宣传。至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孙中山指出,社会应尽可能设置各种专门场地和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得以实施,这些专门场所,包括各种图书馆、书库、夜校、讲演班、研究所等。

不能忘记道德

孙中山认为，道德对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党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这个政党所属成员的道德和智能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则一定不能长久存在，革命政党只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才能够“坚持社会之信仰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从而使革命事业获得成功。

其次，孙中山还指出，要创造一个好的国家，也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品德，为什么如此呢？第一，孙中山认为，国民个人道德的修养，是国家政治进步的条件。现在的国民要使国家不再受外国的压迫，就首先得加强个人修养，从而使整个国家民族的修养得以提高；第二，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和长治久安，与这个国家的民族道德是不是很好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国要恢复独立自主的地位，就必须得先恢复固有的好道德；第三，孙中山还指出，中国在推翻帝制之后，能不能真正地实行共和制度，也决定于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

最后，孙中山还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世界的实现，也都需要高尚的道德。

可见，在孙中山看来，提高道德水准不仅是关系到革命政党能否得到发展，革命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大事，甚至还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能否不断进步、能否实现大同世界的大事。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道德水平呢？

孙中山认为，首先要发展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发展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基础。他指出，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不进步，导致了心性文明的发展也非常迟缓，甚至停滞，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吸取的教训。

孙中山又指出，国家政治的进步也能够促进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政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是提高水平的重要前提和途径。

另一个重要途径则是道德教育。孙中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好国家，最首要的问题便是改良四万万国民的人格，而要改良人格，第一步便从教育开始，孙中山在许多场合中，都发自肺腑地教育社会各界，必须重视道德的教育，失去了道德的教育，其它各方面都无从谈起。

孙中山所提倡的提高道德情操水平，其具体内容又包括哪些方面呢？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与《中法新汇报》总编谈话时曾指出“所有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共同利益。”这里讲的“共同利益”，是指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非某个团体或党派的利益，可见，孙中山提倡人人都应以“大家之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存在于大家的利益之中，求得了大家的利益，也就求得了个人的利益；大家都享有幸福，个人无疑也享有幸福，就是说个人利益与大家利益即共同利益是统一的。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教育广大群众铲除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树立“公共心”的新思想。

除了强调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外，孙中山还大力提倡“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这与他要求人人“须求大家之利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举黄花岗72烈士的例子说，他们之所以舍身报国，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具有“替众

人服务”的道德情操，他们的视死如归，是要唤醒中国全体国民起来斗争“为自己谋幸福。”孙中山教育大家，纪念 72 烈士，不应空空地来纪念，而是要学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他们的道德观念，他希望从此以后，人人都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树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思想，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恢复固有的道德”也是孙中山着力提倡培养新的道德情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这里的“固有道德”，并不是原封不动的中国旧道德，它的恢复是对旧道德的有选择、有改造的承袭和发展，他认为，只有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才能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民族地位。固有的道德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仁爱、忠孝、信义、和平，孙中山认为，对这些我们应当保存其好的部分，而对固有的“特别好的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孙中山在“恢复固有道德”的口号下，赋予旧形式下新的道德内容，以此来教育和帮助人们树立崭新的道德观念，以适应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这种做法，在中国近现代伦理史上无疑是一种创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还非常重视坚持团结、勇于奋斗、坚韧不拔和敢于牺牲的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这些道德品质是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国家实现独立富强和人民能够幸福生活的前提和保证。

孙中山认为，“欲求成功，必须团结。”以前的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内部的不团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他指出要“坚持团结，只有人民能够互相团结，国家的根基才能够得到稳固，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求得中国的进步。”

孙中山还提倡勇于奋斗。他联系当时革命事业的需要，教育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要改造好国家，使人民能够幸福生活，首先得要勇于奋斗，他指出，人类奋斗的宗旨，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以求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要取得成功，先要有奋斗的精神，才能在战斗中以一当十，获得胜利。

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也得到孙中山的充分重视。他指出，革命事业往往不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的，要经过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遭受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才能得以成功，这就要求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要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不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只有这样，革命的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怎样才能做到坚韧不拔呢，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一，得有乐观的精神，孙中山认为，中国国民性质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过于悲观，要有坚韧的毅力，首先就得批判悲观；其二，是要正面分清“义”与“利”的界限，“义”即革命大义，“利”即个人私利，只有明了革命的大义，认清“义”与“利”的关系，才可能具有坚忍的精神，从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百折不挠。

要敢于牺牲。孙中山指出，要革命，就要奋斗，要奋斗，就要牺牲，因此，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去革命，去为天下人谋幸福，才能够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亦是这样，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中，如果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建设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功和胜利，这样下去，连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也会丢掉。

三大板块，智育第一

孙中山认为，要改良中国，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体育、德育、智育的健全的人格不可，而智育，尤其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孙中山对智育如此重视呢？

首先，智育是造就一个好人格的必要条件，在孙中山看来，一个人要造就好的人格，德育体育固然不可缺少，智育却尤其重要。

其次，孙中山认为进行智育是提高人的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人类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反映着一定水平的人类总体“智慧”，个人实践能力的强弱，一般也反映着个人智慧程度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通过智育可以提高人的实践能力。

再次，智育是人们求知识，进而求得世界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除了在理论上论述了智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外，他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的振兴、建设和繁荣富强，都需要学问，因此，学问是立国的根本。

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基础，全在于提高中国全体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自人类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实业的进化，都以各科专门学说的发明和创造为前提，象西方欧美各国，都是如此，因此，欲求得中国自身文明的进步，非提高全体国民的知识水平、重视智育的发展不可。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使人感到忧虑。孙中山在 1916 年 8 月指出，由于人民的知识程度不足，加上当时国内外一些复杂的情况，结果导致国家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建设甚至连立国的基础都遭到动摇。因此，孙中山提出首先要提高整个民族的学问，巩固立国的基础，然后再去谈建设和发展，他说，要使中国成为最富之国、最强之国，能够与世界各国竞争，就必须搞好建设；而搞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建设的学问。总而言之，要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广大国民都有学问，就必须对广大国民和学生施以智育。

孙中山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四书》、《五经》等为教育内容非常痛恨并坚持反对，早在 1894 年他就提出，学问的内容应包罗万象，教育应传授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谈得上用所学的知识为革命和今后的建设服务。

孙中山认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达，依靠于文字的运用。没有文字的中介作用，人类的思想就无法传授和继承，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就无从得以发展，因此，孙中山把“读书、识字”作为学校智育任务的一个内容提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智育任务的最前面。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使受教育者获得“学问”是更加重要的，他曾经指出，受教育者之所以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然而，孙中山对“各种知识”，即数千年来人类产生和积累下来的思想见识，却并不是完全的赞扬和肯定。他认为，它们并不是都具有科学性，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知识，而有些却非真知识。他举例说，中国过去有科学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这种思想见识被人们“习为自然”，而直到数千年之后才被认为是错的。他说，象这样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缺乏科学性，同时，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卓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具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必须是对事物的正确认

识，即“真知卓识”。这一观点始终贯穿于孙中山关于智育的思想之中。

孙中山对“真知卓识”在智育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当他提出“要注重科学”的观点，便属理所当然了。

孙中山教育广大群众，要使中国进入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就一定要重视科学、学习科学。他举欧洲和日本的例子说明科学能够推进工商进步、学术发达和社会文明。现在中国的落后，就在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的缺乏，因此，我们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首要的问题便是像他们一样掌握科学。只有掌握了科学，然后才可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在各种科学知识中，孙中山特别注重与工农业发展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

首先他指出要重视“机器科学”和研究“机器科学”。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极其发达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机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要进步，要发达，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机器科学”的发展和运用，只有用机器代替人力，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中国的前途才有真正的希望，因此，要学习“机器科学”，研究“机器科学”，运用“机器科学”。

其次他认为，学习与运用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可以大大地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他举蚕丝的例子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养蚕并利用蚕丝的国家，以前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为其他各国所不及，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所养的蚕的成活率和蚕丝的质量却反而比中国的要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他们善于运用科学，他又举化肥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的运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总而言之，孙中山以中国和西方各国工农业的比较中找出了差距，并发现了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因此他极力提倡在工农业生产中也要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注意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他说，以前的石油和矿石等等不为人民所利用，往往被当作废料，直到近代才因科学的昌明而得以发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又举电的例子说，以前谁知道水居然能够发电呢？谁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电这种物质呢？直到新的科学产生了并被加以利用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它在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依赖于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与工业、农业紧密联系的科学知识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因而也非常重视这些科学知识的教育。他认为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科学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号召所有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各国。

注重培养智力与技能是孙中山关于智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固然有其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弥补和发展也不可忽视，一个人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己致力于教育而获得的学问，也是其智力的构成因素，而且，人可以通过学习将多数人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发展自己的智力，因此，他在论述学校的教育目的时明确地指出，学校教育的任务之一，准确他讲是智育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人的智力。另外，孙中山还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还要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培养和训练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

使学生能在“学成之后”自食其力。只有这样既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学生，才能够真正“独立为一国民。”孙中山又认为，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自己的国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不仅要求学校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各项技能，而且还要求采用多种教育手段，通过各种教育机构，来培养、训练和提高其他各类社会成员的智力技能，这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属难能可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孙中山对教师的素养和作用在教学中的地位论述有许多精辟、深刻之处。

对于教师的素养，孙中山认为，拥有深厚的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师必须具有的素养之一。他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学生在校学习，能否获得知识以及能获得多少知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因此，孙中山对担任教师的人员资格非常重视，他十分强调地指出：惟必有学识，方能提任教师。1924年8月孙中山签发公布《考试条例》及《考试条例暂行细则》对加考中等学校教员和小学教员资格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应考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和应考内容，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是如此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的。

注重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思想品德是孙中山关于教师素养的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教师要指导人民去谈政治，首先得自己谈政治，要教学生怎样爱国、报国，首先就要自己爱国、报国，要自己有改造旧中国建设强大新中国的远大志向。他甚至提出，教师如果没有这种志向，那就勿宁去干其他事，切不可当教师。他还提出，教师要教学生明白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民主革命的道理，第一要做的就是使自己懂得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先明白民主革命的道理，总而言之，孙中山认为所有先知先觉，必自觉才能觉人；未有自己未觉而能觉人者，强调教师应是处事先知先党的地位的人。

对于教师作用，孙中山认为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教授各方面的知识，使人学而后知。早在1891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此之后，孙中山又多次提到教师的这个作用。1919年8月，他在北京学界演说中就大声疾呼“学界为国民造成知识发达之源”；1920年，又在《地方自治法》中间接地强调了教师的这一作用；1921年他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更是明确地指出教育界者人知者也教育家乃引为人群理公者也，这于我们今天认为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的观点相差无几，表明了孙中山对于教师这个作用的关注和重视。

其二，是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孙中山认为，实现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既需要直接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和各种专门人才，也需要大批能够直接从事文化、思想建设、能够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专门人才。职记者、理论家、艺术家以及教育工作者等等，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具有较高文化和思想素质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多重的教育与专门训练培养出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成功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勤培育。1921年，他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就提出牢固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在于培养各方面的大量的专门人才。1924年他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演说时则更加明确提出了同一观点。诸君毕业之后，是去教人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培养人才则学师范者的任务。由此可见，孙中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中国教育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乃教师者在教育活动中的这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孙中山看来，教师不仅对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也负有责任。辛亥革命十年后，孙中山曾在说过的一段话中又认为教育工作者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正确的。孙中山还

认为，教育工作者对于中国建设事业也具有重大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孙中山的有关论述，他指的这个重大作用就是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教育呢？孙中山认为应从三方面去实施。首先，要提倡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民志，即教师要向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强精神的教育；第二，教师要教育学生“爱国”和“管国事”。要让学生对家庭和学校的责任比较起来更加重大。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第三，都是教师要使受教育者看明白三民主义，使学生明了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树立为国家奋斗不止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孙中山以上论述中涉及到的这三个方面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正是教师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

其四，是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培养新道德。孙中山认为，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花苦功去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并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教师对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的教育不仅应该全力以赴，而且应该用力最多，要不辞劳苦，持之以恒。这反映出孙中山不仅认识到教师帮助受教育者确立或改变人生观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此还非常重视。其次，孙中山还认为教师应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他说，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当然不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教师却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在教育活动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同时，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去爱国、爱人民、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品德。

与中国以往的教育家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孙中山关于教师的作用和素养的思想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之处。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中有不少是对以往的教育家的有关思想的继承。然而，他于1921年6月提出的教育工作者应对“国民程度不足”负责的观点，关于“教育家应为政治的教育家”，“指导人民谈政治”和“引导人民理政治”的观点，都是对现代中国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卓越贡献。

教育敢有规矩方圆

对具体的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等问题，孙中山论述较少，但就在有限的为数不多的论述中，我们亦不难发现其中的精辟之处。

就教学原则来说，孙中山提出的最显著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观点便是因材施教，众所周知，“因材施教”最初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后来又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显然也受到这种影响，但可贵的是他并没受其拘泥，而是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因材施教”的思想。

因材施教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和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性，孙中山也认为，各人的聪明才力确实存在着差异和区别。因此，他提出“随地随人而施”的观点，即根据学生的“聪明才力”，分别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美好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孙中山还十分强调要了解、研究具体的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教育方法上因人而异，而且，他还强调提出所教内容要为受教育者“能解”和“能受”，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更为难得的是孙中山还认识到，个体之间不仅“聪明才力”不同“性”有差异，而且志向也各各不同，因此，孙中山认为，对志向高远的，要给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达到目标，对志向不够远大的呢，必须以及及时、切实和恰如其分的鼓励，去推动他们不断地努力和发奋。关于学生的学习方法，孙中山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要注重实践。孙中山认为，实践是获得知识的源泉和基础，人们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知识。对此，一方面他肯定学生入校读书，就是通过“读书”这个实践而去获得前人的知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学校可以而且也应该让学生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1924年9月，孙中山写信给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信中他指出，黄埔军校要训练出一支能够担任革命任务的军队，就必得让学生进入战争，参加当时即将发生的北伐战争不可，这样就可以从实际的战斗中去获得直接的经验 and 知识。同时，孙中山又指出，学生还要通过实践，才能使自己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从书本上学得的知识。1919年，孙中山在谈到怎样解决发展中国实业所需专门人才时就提出，办法之一就是多派留学生到西方各国的专门学校去学习，学成归国后，再进入各种工厂实习几年，这样就能使所学的知识能发挥他的知识，那些仅仅从课堂和书本上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有可能使自己真正理解和掌握从书本上学得的知识，才可能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具有高深的造诣。孙中山最为强调指出的是，学生在获得某方面的知识之后一定要去参加实践，他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得单纯的知识，而在于在实践中运用，也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得到巩固和提高，否则将毫无用处。

二是注重基础和自修。孙中山认为，世界的进化是由野蛮到文明，人的知识水平则是从无知到有知。正因为是从“无知”开始，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因此，教学应该“由浅而深，由简而繁。”也就是说，学习要从“浅”开始，从“简”开始，以最低处为基础和根本。基于这个认识，孙中山极为重视学生在课堂上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他强调指出：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用处的。因此，孙中山在讲军人教育时，就十分强调要彻底掌握射击这一最基础的东西，要求革命军的官兵以能够命中敌人、弹无虚发作为射击的第一要件。

孙中山一方面强调学生要好好掌握教师所传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学校中传授的一般都是极为寻常的普通学问，一个真正有志于革命事业，有志于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青年，则非得有高深学问为根本不可，切不能以学到基础知识为满足，怎样求得高深学问呢？孙中山认为，课堂上教师所教学问固然不可忽视，但最重要的还是在课堂之外注重自修。

注重自修的方面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自修革命的道理；二是广泛地参阅和研究各种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三是努力实践，掌握关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实践等活的知识。

孙中山历来认为，学生是有知识的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自己的责任，在中国，学生的责任就是运用学到的知识来助革命的成功。他认为，知识只有服务于革命和国家的改革，才算是有真用处，因此，他把学习和研究革命的道理作为学生自修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把学习知识和培养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自修革命道理的同时，孙中山还要求学生在懂得革命道理之后，就要从自己做起。孙中山又进一步认识到，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他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一切有助于实现自己学习目的的知识都应该广泛地查阅和研究，他指出，学生除开应该学好自己专攻的那一门课程外，还一定要把其余关系于那一门的学科。仔细参考，借用他们的道理和方法，来帮助自己所修的那门学科的发展，彻底考察，以求得一个成功的结果。但是，孙中山又特地指出，他并不赞成无目的地泛而学之，势必使所学知识广而不精，掌握活的知识，即关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实情等方面的知识，是孙中山对自修的第三个要求，他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认识到，仅仅从课堂上和课外书籍中学到的知识远远是不够的，还要把它运用到实实在在的革命和生活中去，使“死”的“变活”。比如，孙中山将其民生主义理论的提出和三民主义理论的得以完成，归功于自己对西欧各国的考察，由此可见，他对知识的活用，对了解现实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实情是何等重视！

用教育来促进军事

为了推进革命战争事业，找到适合中国的具体作战方式，孙中山非常重视国外军事学，特别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时，就致力于军事的研究，除此之外，在各个不同时期，孙中山总是把发展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看作取得革命成功的一项重要保障，并为此而身体力行，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革命伊始，孙中山就注意到军事骨干的作用。为了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他在檀香山召集宋教仁、夏百子等20余人组织兵操队，并聘请一丹麦人作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1896年，他又在檀香山组织了一个“军事教育会”，着手训练40余名华侨青年。1903年，孙中山又在日本为留学生创办了青山军事学校，招收14名学员，邀请日本军官教练，他强调学生要努力学习军事，掌握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并经常亲率学员进行各项军事训练，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

但是，尽管孙中山早期的军事教育思想有其可取的地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为一则他的思想不系统，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论的高度，二则他并没有作出充分的实践，力量过于悬殊，所以在历次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总是屡战屡败。直到1925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成立，才标志着他的军事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看成是实践他的军事教育思想，组建革命军的重要步骤。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建设革命军，应先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年他重返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就付诸于实施，为组建革命军在干部问题上作必要的准备。

孙中山亲自组建了筹建军校的领导班子。他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很明确地提出，创建军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为组织革命军准备干部条件。为此，他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并组成了以他自己为首的校本部，直接领导了军校的建设，比较全面地实施了他的军事教育主张。

其一，确定培养革命军骨干，建设革命军作为建校宗旨。孙中山指出，我们的宗旨，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要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办的就是要使学生懂得革命主义，要在心理上革命，排除自私

自利的观念，把以前的不好思想、习惯和性质都一概革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是以有革命思想为前提，而这个革命思想，就是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为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因此，孙中山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是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和军校建设的根本，这个根本实际上就是以政治思想建校。

其二，是在军校内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的精神。军校的师生来自四面八方，不但在生活习惯上不同，还有党派的不同，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世界观与政治信仰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如何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建立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对这点非常重视，他亲自制定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要求全校教职员为了革命事业紧密团结起来。他多次教育军校学生“要同学同道生死共赴”，提倡这种同学之间亲爱精诚，

国共两党共同合作建立军队的精神。与此同时，他非常重视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宣传教育。经他批准，在军校大门上端高悬着“革命者来”的匾额，而两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的对联，勉励学生终身为救国救民的事业奋斗。在他的提倡下，军校运用多种形式，宣传为国为民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这种革命精神教育熏陶下，学生都以孙中山的教导互相勉励，形成了被誉之为“黄埔精神”的校风，使军校成为中国史无前例的革命军校。

其三是坚决贯彻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过去在军事教育上，是学习欧美、日本的方法，以军事训练为主。黄埔军校成立后，作出了重大改革，确定并坚决贯彻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政治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中，始终贯穿着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孙中山也曾亲自多次到军校演讲，并任命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等人担任政治教官，以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在军事训练方面，孙中山从当时革命实际需要发出，也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除《射击规范》、《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等一般军事课程外，他还要求学生须掌握以一当十、以寡敌众的过硬军事本领。在学制方面，则大大地缩短了教学时间。按照一般军校，培养一个低级军官大概需要三年，黄埔军校则讲究实用和速成，半年即可毕业。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人员重编了教材、教学方法也相应地作了改进，采用官教兵的方法，各种军事科目均由具有丰富经验的苏联顾问，给各级领导讲解和示范，然后再由各级领导教学生。这种方法，不但适应了当时学员少、任务紧、时间短的特殊情况，而且进一步发挥了各级领导在教学中的作用，提高了各级领导的军事技术水平。

管理方面，要求各级领导以身作战，对学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提倡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完全按士兵的待遇，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总之，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管理教育中，黄埔军校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注重实用和学用结合。政治课在讲授党的主义和政策，使学生确立革命观点的同时，也重视组织学生到群众中作宣传组织、发动的工作，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战时更是如此，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实际的战斗。这种做法，不但使学生学到了一般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学以致用品格，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而且培养了学生英勇杀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其四是重视从组织上建军。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军校，黄埔军校要求入校学生均须有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要不怕牺牲，矢志革命。在学生毕业前夕，还对学生进行仔细的考察和甄别，及时地对不合格学生予以退学或留校察看等处分。这种作法，有效地纯洁了革命队伍，从组织上把握了学生的政治质量。在军校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度是孙中山重视从组织上建军的又一重大措施，它为革命党人建军，提供了重要经验。

重视在军校中贯彻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实施他的军事教育主张的第五个方面。在联俄方面，孙中山多次明确表示在军事教育中要特别强调贯彻联俄政策和以俄为师的建军方针。黄埔军校聘请的苏联顾问得到了军校的充分尊重，双方合作得十分愉快，联共政策在军校中也得到较好贯彻。

孙中山非常重视发挥共产党在革命精神方面具有的优势，使政治课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并且取得了十分好的效果，在扶助农工方面，军校贯彻得也很好，军校认真贯彻扶助农工政策，不但使国民党一大提出的“为农夫、工人而奋斗”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受到工农欢迎，密切了军民关系，而且也使学生在实践中树立了“为农夫、工人而奋斗”的正确观点。

当然，孙中山关于军事教育的观点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建立黄埔军校和在军校中提倡开展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军事教育的重视和他对军事教育思想领域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无疑他的观点中也存在一些失之偏颇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他的观点将在军事教育史上永放光芒。

放脚的女子也要读书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强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严重地禁锢着妇女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封建女学所教育女子的最高准则“三从四德”给几千年中国妇女的身心健康以极大的毒害，使她们处于愚昧落后的境况和被奴役压迫的地位。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最早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播教义而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及维新运动时康梁等改良派从强国保种出发而建立的培养贤妻良母的女子学堂。

孙中山比维新派更早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女子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早在1890年他上书郑藻如时，他就提出了他对女子教育现状的忧虑和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妇孺皆皆亦晓诗书”则“人才安得不罢，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良哉！”由此可见，他对女子教育是多么重视，他还提出具体设想，即“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一所”，表现了他希望尽快发展女子教育的愿望。作为一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这种思想无疑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但他把妇女看作是国家强盛的人才，是振兴中华的重要力量，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以后在他的革命活动中，他又十分重视学校对于女子教育的重要作用，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的阵地，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成立了许多女子学堂，使大批没有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各个年龄层次、各个社会层次的妇女走出闺阁，接触社会，为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解放自己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开辟了新的道路，并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更加重视女子教育，他认为妇女只有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1912年5月他在广东女师二校所作的演讲，极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中国人民要真正享受自由民主权利，必须先以教育开始，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教育，妇女也不例外，他特别指出，女子教育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特别关注女子教育的发展。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孙中山称赞他们“志虑高远。”又一次当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以上海务本女塾经费拮据请求帮助时，他又慷慨解囊表示支持。至于南京的女子蚕桑学校、复心女校则也都是在孙中山的支持和批准下开办的。由于孙中山的重视和帮助，辛亥革命后几年之内女子教育就有了较大发展，一批女知识分子涌现，使中国妇女素质得到提高，也为“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准备了必需的人才。显然，这和孙中山对女子教育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北洋政府仍把“贤妻良母”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方针，女子学校和男校教授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抨击了这种“贤妻良母”教育，到处都是争取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大学开放女禁和允许中学男女同校等，孙中山对此表示热情赞扬和积极支持。1921年6月，孙中山倡议在广州创建了执信中学，他明确指示这所中学须招女生，实现了全省首创的男女同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为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广阔前景，但妇女能否有自我解放的意识和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还要有主观条件，即就是提高自身素质，大力发展女子教育，正是提高妇女素质的有效途径，孙中山主张女子教育的目的正是如此，他进一步提出，

妇女要获得自身的解放，还需要懂得“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这样才能成为革命和建国的力量，而这必须通过女子教育才能得以实现。

孙中山的反封建传统，十分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把发展女子教育提高到恢复人格的高度，并认为这是实现男女平等，获得妇女自身解放的重

主要参考文献

- 《孙中山全集》（第1——12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
- 《孙中山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中、下集）中华书局，1984年。
- 《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
- 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张磊著：《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 韦杰廷著：《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 韦杰廷、邓新华著《孙中山教育思想初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朱一智、隋启仁：《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肖万源著：《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李时岳、赵矢元著：《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1984年。
- 姜旭朝著：《孙中山经济改革论》

孙中山年谱简表

- 1866年（清同治五年） 诞生
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 1867年（清同治六年） 一岁
是年9月5日，早年赴美国当华工的叔父孙观成在国外病逝。
- 1869年（清同治八年） 三岁
10月9日，孙中山的祖母黄氏病故。
-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六岁
是年，开始参加劳动。孙中山后来自称“生而为贫困家之农家子”，“早知稼稻之艰难”。
- 1876年（清光绪二年） 十岁
是年，入村子里的私塾读书。课余时间参加打禾、插秧、除草等劳动。
- 1877年（清光绪三年） 十一岁
在村塾读书。
- 1878年（清光绪四年） 十二岁
6月，至其兄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所开设的商店里协助店务，学习记账、珠算等。后入盘罗河学校补学算术。
-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十三岁
9月下旬，入火奴鲁鲁（当时华侨又称作檀香山正埠）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学习西文、社会、政治演说、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英语、圣经等科目。
- 1882年（清光绪八年） 十六岁
7月27日，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
秋，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读书。
- 1884年（清光绪十年） 十八岁
4月15日，入香港英国当局所开办的中央书院（1894年改为皇仁书院）读书。
11月，接其兄孙眉函召，在香港停学，再赴檀香山。
-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十九岁
4月，自檀香山经日本回国。
5月26日，在翟亨村与卢慕贞结婚。
8月，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 二十岁
夏，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决定学医，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华南医学堂读书。
-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二十二岁
3月24日，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病逝。
-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二十四岁
是年，曾致书香山县退职官僚郑藻如，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改良，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办教育三项建议。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志趣相投，倾慕洪秀全，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二十五岁
10月20日，子孙科出生。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二十六岁

3月13日，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尽心爱国”为座右铭，以“开通民智”为宗旨。

7月，在香港西医书院应第五学年考试，在此之前，连续五年获全年级第一。

12月，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医术精湛，尤擅长外科和肺病专科。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二十六岁

春，改赴广州行医。

冬，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集会于抗风轩，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二十八岁

6月，上书李鸿章，全文达八千余字，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和培养人才的主张；认为建设国家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到是年冬天，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二十九岁

1月，由檀香山赴香港，回国策划武装起义。

3月16日，和杨衢云等在香港再次开会，讨论起义计划，打算以突击的方式占领广州。

10月26日至28日，广州起义被香港英国当局察知，乘轮船逃出广州至唐家湾，改乘轿子到澳门。

12月，截断发辫，改装赴檀香山。同年，长女孙姈出生。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三十岁

3月4日，香港英国当局发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

4月，在檀香山遇其老师康德黎，相约去英国，在伦敦相见。

6月，抵美国。

9月23日由美国纽约赴英国，30日到达英国利物浦。

10月11日，被清朝驻英国使馆人员绑架，囚禁于使馆中，准备偷运回国杀害。

10月18日，在英国老师康德黎及多人的营救下，终于获救，被释放。

12月以后，经常往大英国博物院图书室，研读书籍，探求救国真理。

冬天，撰写出《伦敦被难记》。是年，次女孙婉出生。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三十一岁

7月2日，离伦敦赴加拿大，11日到达蒙特利尔，又赴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三十二岁

春天，在日本东京进行革命活动，并在长崎、神户、马关等地吸收华侨参加兴中会。

秋天至冬天，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本，孙中山在日本与康、梁多次会谈。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三十三岁

春至夏，往返于日本的东京、长崎、横滨等地，宣传革命，再次策划武

装起义。

夏秋之间，在日本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交谈，一度有成立联合会的计划。

11月26日，清政府下令缉捕兴中会的重要成员及多名会党首领。

11月，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会首领在香港集会，议定三会结成一个团体，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

12月22日，孙中山为自己亲手编绘的《支那现势地图》作跋。该地图于第二年7月在东京正式发行。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三十四岁

春夏之交，孙中山鉴于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决定把握时机，加紧在广东策划起义。

8月22日，自日本横滨秘密乘轮船赴上海，计划先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响应，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10月6日，郑士良以会党为主力军，在惠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在台湾积极筹备饷械，并准备内渡亲自指挥。

10月22日，起义军转战多时，后遭清军围攻，加之粮饷不够，郑士良宣布起义军解散。

冬天，孙中山总结此次失败的教训，在日本苦心攻读军事著作。

190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三十五岁

春，赞助留日的粤籍学生郑贯一、冯自由、李自重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三十六岁

春，在日本横滨热情接待章炳麟，与章讨论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制定法律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设想。

是年，孙中山在东京嘱留日学生刘成禹撰《太平天国战史》，充作反清宣传品。该书于1904年在东京发行。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三十六岁

5月，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孙中山评价此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8月，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退役的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入学者约四十人，孙中山主持宣布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后孙中山离日本，该校不足半年因内部纠纷而停办。

是月，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廖仲恺、何香凝等，畅论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

9月26日，离日本赴檀香山。

12月上旬，至火奴鲁鲁岛，到各戏院发表演说，反对保皇理论。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三十八岁

1月11日，为与保皇党争夺群众，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受“洪棍”之职。

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长沙，黄兴被推为会长，入会者有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谭人凤等五百多人。

5月，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鼓吹反清革命。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三十九岁

春，在英国伦敦会见严复，与严复辩论，不同意严复关于“改革中国政

治应从教育入手”的主张，而坚持认为革命才是改革中国政治的良方。

夏，自英国转赴德国，在柏林向留德学生宣传民主革命的主张，吸收二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

7月下旬，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会晤于东京凤乐园，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于革命，黄兴表示赞同。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全国内地有十七省代表到会。孙中山主张各团体联合，大家表示无异议，最终将名称定为“中国同盟会”，后定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

9月1日，廖仲恺、胡汉民等六人加入同盟会。

11月29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

12月4日，留日学生八千余人，为抗议日本内阁文部省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实行总罢课，陈天华愤于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低毁，于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四十岁

6月，孙中山离日本到新加坡，命胡汉民为新加坡同盟会分会起草会章，扩充组织，人会者极多。

秋冬间，与黄兴、章炳麟等人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对同盟会纲领的解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四十一岁

4月，准备在广东的潮、惠、钦、廉四府同时起义，令胡汉民往香港做策应工作。

5月，潮、惠、钦、廉四府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均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于安庆，战败被捕，英勇就义。

7月13日，同盟会员（亦为光复会员）秋瑾准备响应徐锡麟的起义，被清政府逮捕，被杀于绍兴轩亭口。

9月1日，命王和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9月中旬，因给养问题，退至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四十二岁 2月，清政府议定，再加十万赏银，悬赏捉拿孙中山。4月1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在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按孙中山的要求，从镇南关将起义队伍带到云南，发动河口起义，起义军势力发展甚快。

5月5日，孙中山发电报，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命黄兴赴前线督师。后起义失败。

12月7日，赵声、朱执信等策划在广州起义，因秘密泄露而导致起义破产。

年底，同盟会河南分会在开封成立。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四十三岁

5月上旬，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由新加坡迁至槟榔屿，不久，胡汉民赴香港，支部事务由邓泽如主持。

8月7日，孙中山到伦敦。

10月30日，离伦敦赴美国。

12月16日，由美国纽约至波士顿，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和捐款。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四十四岁

1月21日，由纽约赴旧金山，途经芝加哥，出席欢迎大会，发表革命演说，并成立同盟分会。在华侨中募得款项港币八千多元，电汇至香港，供同盟会南方支部作起义经费。

1月29日，黄兴自日本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因事先准备不周，起义军孤立无援，起义失败。2月16日，建立旧金山同盟会分会，加盟者十余人，孙中山亲自主盟，将誓词中革命宗旨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加盟者签名自称“中华革命党党员”。

4月4日，出席在火奴鲁鲁荷梯里街戏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鼓吹再次起义。

7月19日，孙中山母杨氏病逝于香港。

1911年（清宣统三年） 四十五岁

1月18日，黄兴抵香港，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

4月8日，广州起义统筹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广州设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统筹部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动起义，拟定了十路进军的战斗计划，由赵声和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司令。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因实力悬殊大大而失败，事后收殓七十二名烈士遗体，合葬于黄花岗，此次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之役。

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总会，宋教仁被推为总务干事，发布了宣言和章程，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组织起义，南京、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继成立分会。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湖北革命党人同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

10月28日，黄兴自香港经上海到武汉，出任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汉口保卫战。

10月31日，孙中山致电荷马李，指出黎元洪的突然成功可能会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各地组织皆寄希望于我来领导，我若得到财力支持，绝对能控制大局，在我们抵达之前，不可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政府，所以，借款是必须的。

11月24日，由马赛乘船回国。

12月26日，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被商定为大总统人选。

12月29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致电各省代表和都督、军司令长的电文中表示接受，准备赴南京就职。

1912年（民国元年） 四十六岁

1月1日，由上海赴南京，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十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誓词为：“颠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另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

1月3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次长任命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伍廷

芳为司法总长，胡汉民为秘书长等，代表会议还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1月5日，发布《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表示革命军兴后，凡清政府对外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所借的外债和出让的权利，民国一律否认。

1月15日，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我立即宣布解职，让首功于袁氏（指袁世凯）。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推荐袁世凯代任。

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的辞职，讨论临时政府的设置地点，以多数通过设在北京。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任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4月2日，临时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4月4日，孙中山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认为：政治上的革命如今已如愿以偿，后当竭力从事社会上的革命。

9月11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权”，孙中山接受。

1913年（民国二年） 四十七岁

2月10日，乘轮船“山城丸”号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

3月6日，在国民党横滨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注重党纲党德。

3月20日，袁世凯指使暴徒枪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

3月22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本部，要求查明杀害宋教仁案真相。

3月24日，杀害宋教仁案查明，系袁世凯所指使。4月26日，与黄兴联名通电，呼吁各界人士负起责任来，要对杀害宋教仁的凶手予以严办。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开始。

7月15日，南京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914年（民国三年） 四十八岁

1月10日，派陈其美赴大连设机关，联络东北各省力量讨袁。

3月下旬，袁世凯派两名刺客由釜山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中山。

5月10日，《民国》杂志创刊于东京，各期内容均以反对袁世凯为宗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该刊即为该党的机关刊物。

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9月1日，中华革命党本部通知党员，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

9月20日，在东京主持召开关于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第二次讨论会，参加者有廖仲恺、胡汉民、居正、许崇智等人。

10月10日，朱执信由南洋抵香港，与邓铿策划在广东发动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民国四年） 四十九岁

2月5日，邓铿受孙中山派遣，由日本抵南洋宣传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

2月11日，孙中山之兄孙眉病逝于澳门。

3月10日，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与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

4月4日，袁世凯下令，严加通缉“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革命活动”。

夏末，召集廖仲恺等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等地筹设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北军军部。

10月25日，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

12月25日，唐继尧、蔡愕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以唐继尧为都督，以蔡愕、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护国战争开始。

年底，孙中山发函海外各埠洪门，促其各自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

1916年（民国五年） 五十岁

1月6日，袁世凯公开称帝。

2月24日，委派冯自由等前往南洋、澳洲等地，募集讨袁军饷。

5月9日，在上海发表二次讨袁宣言，追溯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和几年来的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指出这次反袁斗争不光是打倒袁世凯就完事，袁世凯破坏民国，是从破坏约法开始的，这次反袁斗争，就要维持民国，维持约法。

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杀死。

7月25日，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部，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就职，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各省革命军可以停止军事行动。

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

1917年（民国六年） 五十一岁

2月21日，在上海写成《会议通则》（又名《民权初步》），阐述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有关会议的各项细则。

3月30日，中华革命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称，向党员发出通告。

6月10日，再与章炳麟联名致电黎元洪、伍廷芳，希望他们清除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势力。

6月14日，派胡汉民赴粤联络讨逆护法力量，胡于是日到达广州，同广东督军陈炳焜等进行商讨，广东省长朱庆澜赞成出师讨逆。

6月23日，在上海积极运动海军护法，当晚在哈同花园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会商大计”。

6月，为日本政府扶持段祺瑞等北洋军阀，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提出了批评和劝告，希望日本政府有一个表示援助正义的态度。

7月3日，就张勋复辟事，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

7月6日，为进行护法活动，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到广州，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人同行。

7月19日，与陈炳焜、朱庆澜等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广东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

7月20日，在驻粤的滇军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再次揭露复辟真相。

8月5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抵黄埔，孙中山在全省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阐述护法的意义，号召讨伐段祺瑞，拥护国会。

8月10日，致函邓泽如及南洋革命党人，告诉他们护法运动进展良好，令其积极筹备军饷以备用。

10月6日，南北两军战于湘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

11月15日，命海军炮击广东督军驻地观音山，以驱逐陈炳昆。程璧光拒绝执行。

1918年（民国七年） 五十二岁

1月1日，发出大元帅令，勉励全国军民在新的一年里，奋发前进，勘定内乱，恢复和平。

1月3日，为惩罚桂系军阀莫荣新，令豫章、同安两舰炮击观音山督署。

2月22日，宴请广东商界人士，演讲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最富的国家，又是政治上最优良的国家，勉励大家积极参与建设的事业。

3月23日，通告各国驻华公使，痛斥北方政府的罪行，并郑重声明，北京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的一切契约借款及其他责任，本军政府一概不予承认。

4月2日，分别致电陈炯明和唐继尧，令其阻止桂系军阀及政客非法改组军政府。

4月17日，军政府向日、美、法、意、俄、英、葡等十六国发出通告，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之合法政府。

4月下旬，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积极策划迫孙中山去职。

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

5月12日，莫荣新诱捕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并将陆军次长崔文藻枪决。

6月26日，抵达上海，住法租界内，段祺瑞欲从租界引渡孙中山，来得逞。

夏天，电贺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使中俄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8月31日，陈炯明援闽粤军占领漳州、南靖、漳浦、同安等县。

12月30日，写成《孙文学说》自序。

1919年（民国八年） 五十三岁

1月6日，北洋政府自动取消通缉孙中山的命令。

1月9日，被军政府推选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

2月4日，覆函陈炯明，告诉他和议难成，要他整顿粤军内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2月7日，拒绝出任巴黎和会代表的职务，并给广州谢持去电报，告诉他拒绝出任和会代表的原因。

2月18日，覆函梅培，告诉他自己已经派杨仙逸（返粤的旅美飞机驾驶员）等赴汕头帮助粤军发展空军事业。

4月1日，覆函杨庶堪等，揭露北京政府图谋陕西、四川两省的阴谋。

4月6日，覆函许崇智，嘱其固守原防区，认真训练好军队。

5月28日，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指出要想和平救国，只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的一条路。

6月，在上海与戴季陶谈话，论及有关社会劳动问题和当时社会思潮状况，认为，另社会思想和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这种时代是思想动荡时代的共同特点。

6月29日，覆函湖南的廖湘云，指出护法各军不应为利益而争，而要团结一致。

8月1日，指派由廖仲恺、朱执信等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出版。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指出：创办该刊的目的是鼓吹建设思潮，广泛宣传国民党的主义，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识，万众一心地建设一个富强、发达的国家。

10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的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办法都是救国的途径之一，但不是救国的根本方法，今后要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就是革命，要彻底地挖掉旧社会的基础。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章，要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0年（民国九年） 五十四岁

2月17日，致电唐继尧，望其出师讨伐桂系军阀。

4月2日，召见蒋介石商谈福建、广东两省军事，命令蒋介石到漳州粤军总部去协助工作。

4月16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

5月16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讲，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假招牌，将来应有一番大的革命，并尖锐地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只有在全国人人都化为革命党的时候，才有真的中华民国。在革命未成功时，要用革命的党来维持。

6月2日，在上海与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及云南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办法，决定由四总裁发表联合声明，否认军政府在广州的国会。

6月3日，四总裁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声明为贯彻护法的主张，将军政府移往云南，主张恢复南北议和。

6月29日，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促陈炯明率军返粤讨桂，并声明经济援助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

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加粤讨桂，20日，占领汕头，21日，收复潮安。

9月16日，朱执信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回粤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对付桂军事行动。受朱执信的策动，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于当天宣布独立。

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居民的冲突，在虎门牺牲。

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军逃往广西，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要他不惜全力支持陈炯明所部粤军。

10月31日，四总裁再度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所谓南北统一的伪令，声明说春煊早已丧失地位和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

11月1日，致电陈炯明、许崇智等，指示他们速调全军进省，先安定广东省的大局，再处置后方的穷寇。

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作修改章程的报告。

11月9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上发表演说，为训政作解释，说明革命党人应担负起教育民众的任务的理由。

11月10日，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1月28日，经香港抵达广州，在广东省署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家统一的方法是实行民治。并大力赞许俄国的革命方法。

11月29日，重组军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各部人选，自兼

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等。

12月1日，四总裁再次发表声明，宣布军政府继续执行职务，将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发展实业，刷新吏治。

12月6日，四总裁第三次发表声明，谴责北京政府破坏和平。

1921年（民国十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在护法，但护法已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广东此时有建立正式政府的必要。

1月21日，外国使团将关税二百五十万余两银划归北洋政府，孙中山令军政府在28日通知沙面各国领事，声明决定收回海关主权。

2月1日，在广东省中国国民党支部成立会上讲话，阐述三民主义。

2月18日，改组广州市政府，由军政府直辖。

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讲，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认为目前中国只是个半独立国，希望建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

3月16日，与军政府各总裁联名通电，反对北方违法选举总统，指出徐世昌只是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无权召开国会。

4月2日致函康德黎，请其协助在英国出版自己的《实业计划》一书。

4月7日，国会非常议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数十万市民举行大会热烈庆祝，并结彩游行。孙中山发表就职演说。同日，致电徐世昌，指出徐世昌只是承平时一个俗吏，要他早日引退，不要当什么总统。

5月11日，陈炯明请辞去陆军。内政部长两职。

5月28日，命粤、赣、滇、黔各军准备讨伐陆荣廷，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

6月17日，致电美国政府总统哈定，促其承认广州新政府。

6月27日，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7月15日，粤军攻克平南，讨伐桂系战争顺利进行。

7月20日，派廖仲恺、何香凝等赴梧州劳军。

7月，在广东教育会上对中等以上学校职员和学生发表演讲，勉励他们立志救国，并阐述三民主义的要旨。

8月4日，粤军占领南宁，陆荣廷逃往龙州。

8月13日，滇、粤、赣各军攻克桂林。

8月28日，覆信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首先说明这是从苏俄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信，并向齐契林叙述了辛亥革命及具后的历程，认为自己过去辞职是一个大的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一样，袁世凯很快就恢复了帝制。并且提出了要和俄国保持通信联系的意见。9月3日，为援桂凯旋、准备北伐的将领举行宴会，发表演说，指出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可。

10月15日，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北伐军三万在当天开拔。

10月17日，到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州商谈北伐问题，陈炯明托词不

至。

11月8日，在梧州与陈炯明会晤。

11月上、中旬，在梧州国民党党员会上发表演讲，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要求大家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方向去努力。

11月15日，离开梧州前往桂林。

12月4日，到桂林，在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

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粤、赣三军军官作《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话。

12月21日，宋庆龄率红十字会会员到达桂林。

12月23日，在桂林会见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商谈多日，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项建议，一是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是要建立革命的武装中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成这些建议。

1922年（民国十一年） 五十六岁

1月9日，在桂林以大总统的名义宣布徐世昌罪状。

1月19日，吴佩孚派专使黄申芑到广东会晤陈炯明，陈炯明表示可以同吴合作。

2月3日，以大元帅名义发动员令，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

2月12日、20日，张作霖、段祺瑞分别派人到广东，与孙中山商讨合作讨伐直系军阀事。

3月16日，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湘，北伐计划受阻。

4月8日，大本营由桂林迁回广东，孙中山指令各军集中梧州待命。

4月12日，陈炯明调动军队，企图阻止北伐军回师广州。

4月16日，到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北伐军改道出师江西，将北伐军大本营设在韶州。

4月18日，廖仲恺由梧州会见陈炯明，劝陈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拒不同意前往。

4月21日，下令免除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长职务。陈炯明当晚召开会议，偕同粤军总部人员退居惠州。

5月4日，以大元帅名义声讨徐世昌，并下令北伐。

5月5日，广州各界举行集会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一周年。

5月8日，大本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同日，为争取陈炯明北伐，任命陈炯明的部将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

5月26日，叶举向孙中山提出元理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原职并撤销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职务。

6月1日，应廖仲恺的请求，从韶关返回广州。

6月2日，巡视白云山，发现陈炯明的部下谋反的意图。

6月6日，就徐世昌辞职发表对外宣言。

6月13日，北伐军占领赣州，查到陈炯明意图与吴佩孚夹击北伐军来往密电三件。

6月14日，廖仲恺应陈炯明邀请前往惠州，至石龙时被扣留，押到石井兵工厂囚禁。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四千多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出走，登海军的楚豫舰，移往永翔舰。同日，宋庆龄亦脱险。

6月17日，转登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在军舰上发炮攻击叛军。

6月20日，海军将领温树德率四艘军舰逃离黄埔，广州江海防司令魏邦平与叛军妥协。

6月27日，北伐军决定以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回粤讨伐陈炯明。梁鸿楷部中途抗命，反往惠州与陈炯明会合。

7月1日，拒绝陈炯明的假和解。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各部均进入广东，决定攻取韶关。

7月5日，陈炯明托人上永丰舰，意图使孙中山自动下野，然后自己也辞职，孙中山严辞拒绝。

7月8日，温树德为陈炯明收买，率永翔、海圻、海深、肇和四舰投降陈炯明。孙中山命其余各舰掩护长洲要塞。

7月10日，进泊白鹅潭。

7月19日，叛军用鱼雷攻击孙中山的永丰舰，不中。

7月29日，北伐军讨伐陈炯明的队伍在韶关失利，全线退却。

8月6日，北伐军连续失利，分别退至江西、湖南边境。

8月9日，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赴香港。

8月14日，到上海。

8月15日，在上海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乱经过。

8月23日，李大钊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

8月下旬，会见苏俄全权大使越飞。

9月4日，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

10月6日，北伐军许崇智部攻克古田。

10月10日，为蒋介石作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

10月25日，任命邹鲁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并派邹鲁赴广西联络滇桂各军讨陈。

12月16至18日，再次召开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宣言和党纲党章。12月26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第二路军总司令刘震寰等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即“白马会盟”，讨论讨伐陈炯明的事宜。

12月30日，义军黄明堂部攻克灵山，并向廉州进攻。滇、粤、桂联军会师梧州，誓师东下讨陈。

1923年（民国十二年） 五十六岁

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

1月2日，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次日又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

1月11日，派廖仲恺赴上海，与国民党各省支部代表商谈改组国民党问题。

1月14日，滇桂联军进入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

1月21日，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部长，23日，又任命廖仲恺等二十一人参为参议。其中均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

1月26日，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是日，驻广州的滇军将领沈鸿英图谋不轨，孙中山原订于27日启程赴广州，闻沈鸿英事后推迟行期。

1月31日，覆函刘震寰，命其进剿沈鸿英。

2月3日，设大本营于江门办事处，以便组织力量讨伐沈鸿英。

2月15日，离上海赴广州，到达香港时受到全市人民规模空前的欢迎。

2月21日，从香港抵广州，在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3月1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4月3日，迁大元帅府于河南士敏土厂。

4月16日，沈鸿英叛变，孙中山亲自督师，抵御沈军。

5月8日，沈鸿英部退出韶关，平定沈鸿英叛乱。同时，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在东江地区叛变。

7月18日，梧州沈鸿英部守军投降。

8月1日，豫军樊钟秀部从大庾（今江西大余）来降。

8月16日，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其为国民党特别顾问。

9月11日，东江前线连续获胜，克平山。

9月23日，总攻惠州，未克。

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揭露曹馄贿选总统。

10月19日，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请李大钊赴上海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

11月12日，由石滩返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滇军，增调援兵，抵御陈炯明叛军。

同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1月19日，陈炯明分四路猛攻广州，豫军樊钟秀部突至，攻击叛军，广州防卫战获得胜利，叛军自20日起撤退。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上书反对改组国民党。

12月3日，孙中山宣布将收回广州关税，北京外交使团致电广州政府表示反对。同时，外国军舰二十余艘驶进黄埔，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

12月5日，命外交部覆电北京外交团，指出中国海关是中国国家海关，广州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收回自己领土上的关税权，与外国人无关，北京的伪政府亦无权收受两广关税。

12月7日，接见《字林西报》的记者，表示决心截留两广关税，不怕外国人的威胁。

12月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决定积极筹备北伐。

12月9日，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有关改组问题。

12月21日，命令海关税务司，将提留的海关税妥为保管，供政府使用。

年底，李大钊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事宜。

1924年（民国十三年） 五十八岁

1月4日，在本营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到会代表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等，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1月22日，代表大会提出党章草案交付审查。大会授权主席团指定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十九人为审查委员。

1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1月25日，获悉列宁逝世，大会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1月28日，国民党右派人士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辩论，同意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1月3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最后，孙中山致闭幕词。

2月6日，设立黄埔军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

2月23日，蒋介石申请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处负责人职，孙中山在其辞职书上批示不同意。

2月29日，沈鸿英被迫投降。

4月6日，下令滇、粤、湘、桂各军分三路总攻惠州，未克。

5月2日，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6月13日，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

8月9日，命令黄埔军校当局，派军舰查缉商团走私的枪支。

8月13日，商团不顾政府的警告，公然举行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

8月18日，商团总长陈廉伯煽动银行业罢市，拒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

8月20日，命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

8月24日，调兵入省并宣布戒严，以对付商团的叛乱。

8月25日，商团罢市。

8月28日，英国军舰开进白鹅潭，将炮口对准中国军舰，威胁中国军舰。

8月30日，汪精卫、伍朝枢等坚持商团事件和平解决，并让范石生等人出面调停。

9月3日，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讨论北伐问题。

9月4日，江浙战争爆发，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代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抽调一部随行。将大本营移到韶关，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

9月14日，广东商团阴谋举行第二次罢市。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

9月20日，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9月22日，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

10月3日，胡汉民受任广东省长职，立即发还广东商团枪械。

10月10日，广东各界举行大会，纪念武昌起义，广东商团悍然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是为“双十惨案”。

10月12日，广州商团继续举行罢市，孙中山致电蒋介石，令其坚决镇压商团的叛乱。

10月13日，商团在沙面集会，阴谋扩大叛乱。

10月15日，商团首先向政府开枪，桂、湘、豫、粤军等分五路包围西关，令商团缴械。数小时战斗后，商团叛乱被平定。

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

11月2日，孙中山决定北上。命胡汉民留守。

11月3日，到黄埔军校辞别，并发表讲话论述北上的目的。

11月4日，分别覆电冯玉祥、张作霖，告诉他们安排好军事之后，即可北上。

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

11月13日，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

11月17日，到上海，受到上海群众数万人的欢迎。

11月19日，在上海寓所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北上，是去同全国人民谋求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11月21日，乘“上海丸”号轮船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11月30日，从日本神户乘“北岭丸”赴天津。

12月4日，到天津，受到天津群众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12月5日，带病在卧室内同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会晤。

12月18日，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等。是日，肝病加剧。

12月28日，由于北京各团体纷纷派代表到天津请求入京，决定赴北京。

12月31日，带病由天津入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十万人的欢迎，在北京车站发表书面讲话，声明此次自己来北京不是来争地位的，而是来做救国的大事的。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因肝病加重，请西医医治。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1月4日，继续请西医医治，并在病榻上考虑对付“善后会议”事。

1月7日，陈炯明再次阴谋进犯广州。

3月11日，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中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致苏联遗书一份，其中表明了他把三大政策实行到底的决心。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团结出版社，1989年。

要保证。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当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